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图例

- 市、县、区、镇
- 乡、镇、街道办事处
- 铁路
- 高速公路及国道
- 省道及县道
- 乡道
- 区、镇界
- 县、市、区界



2015 · 01, 1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陈光在山东敌后（上） 武清禄 04

【峥嵘岁月】

史庄打国民党军车 杜广建 10

地下医药采购站 郑海龙 13

我的抗战记忆 解玉峰 16

【名人素描】

英雄的伟大母亲——张恺 穆志全 19

金代状元张行简 在大地上 25

【文化掇英】

琅邪名士·竹林贤人·吝啬小人
——王戎的人生轨迹 含莹咀花 28

【探索发现】

抗战文物之——
中共一一五师教二旅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奖章
高 昂 34

【古城旧事】

1968：临沂城亲历欢迎济南知青 王宗富 35

【蒙山沂水】

俺村的地名轶事 邵明武 37

荆山与荆山寺 陈永杰 41

【史海撷萃】

百战将门
——五代名将符存审、符彦卿父子 高 雷 44

【典籍考辨】

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 梁 涛 49

【史料辑存】

王小古年谱(下) 刘瑞轩 54
英勇善战的沂蒙民兵 刘洪连 李西安 59

【影像沂蒙】

沂蒙革命根据地略影——巾幗铁流(二)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64

【诗画赏析】

居摄两坟坛 徐森玉 66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吴姓(中) 赵丹峰 67

【沂蒙名医】

一个人和一个叫“神经”的系统
——散记车峰远 惠东波 71

【沂蒙乡亲】

著名环境化学家王文兴院士访谈 康香阁 76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中共一一五师教二旅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奖章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中共一一五师教二旅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奖章》)

封底: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胡石 书



地 址: 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 276000

电 话: 0539-8727560

邮 箱: 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 <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 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陈光在山东敌后 (上)

武清禄



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光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1938年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在晋西被友军误伤回延安后，陈光奉命代理一一五师师长。1938年底，他与当时负责该师全面工作的罗荣桓（后不久被任命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率领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敌后，与山东地方党开辟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山东敌后四年多的战斗岁月里，他努力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坚持山东抗战，创建、扩大和坚持山东抗日根据地，参与组织、指挥了多次战役、战斗，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他为人民革命事业、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创建鲁南根据地

鲁南是指山东南部，包括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淄临公路以南等广大地区。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包括泗（水）、滕（县）、曲（阜）、邹（县）、峄（县）、费（县）、临（沂）等县，人口约500万。它不仅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重要枢纽，而且直接威逼日本侵略者兖州、徐州、临沂、连云港等战略据点。1938年8月，日军沿津浦路南下，占领滕县、峄县之后，鲁南地方党组织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等武装。同时，许多地主、豪绅也拉起武装，有的接受国民党委任，有的自称司令，割据一方，且多为国民党特务所控制，暗地与日军

相勾结，破坏抗战。也有一些地方武装，处于动摇状态。到1939年春，鲁南各种土顽武装共1万多人，占据着大部分山区，把我党组织的抗日义勇总队挤到了抱犊崮以东的大炉、车辆狭小地区。4月，东北军之一一师又进入鲁南，这就形成了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

1939年6月21日，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十八集团军总部：要乘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之际，将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9月，以“东进支队”的名义，进入大炉为中心的鲁南抱犊崮山区，先后拔除了白山、下石河等日伪据点。10月3日，师直特务营一部与边联县自卫武装配合，攻克了大炉西南10余里的反共顽固堡垒——孔庄，消灭了勾结敌伪的反共土顽，击毙了首领杜若堂。同时，也争取了一些地主武装保持中立或向我党靠拢，使鲁南的形势开始好转。

10月27日，师直属队在大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罗荣桓政委作《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当前总的方针是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陈光参加了会议，完全赞同罗荣桓的报告。会后，罗荣桓到湖西处理“肃托”错误，落实会议精神的任务便由陈光执行。陈光认为，以战斗消灭敌伪势力，站稳脚跟，打开新局面，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和关键。他了解、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敌情，组织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11月，他部署师直特务营、六八六团所属部队及师直属队挥师南下，组建了郟（城）、马（头）战役，解放了水陆交通要点——马头镇。之后，我军又一度攻克了郟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组建了抗日民主政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12月下旬，罗荣桓政委回到鲁南，他和陈光一起住在大炉民主人士万春圃家里。我党我军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首长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受到了万春圃一家人的赞赏。他们便利用这个机会，亲自做万春圃的工作，使他更加靠近我党我军。

1940年1月，罗荣桓政委总结了一一五师入鲁以来的斗争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创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并在师直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陈光在讲话中也强调：“我们要有阵地，才能坚持抗战。”罗荣桓和陈光分析了当时鲁南敌我斗争形势后一致认为：解放为恶霸地主孙鹤龄盘踞的白彦，是扩大和巩固鲁南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措施。于是，决定集中师直特务团、六八六团等部队发起白彦战役。2月11日，师直属队和作战部队，分别从驻地出发，迎着寒风，冒着雪花，隐蔽而迅速地向白彦进军。2月14日拂晓前，进攻白彦的部队已将敌四面包围，攻击部队已竖起云梯，冲破敌人的防守，功入围寨，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经过激烈的战斗，一举消灭了汉奸顽固武装，解放了白彦。尔后，又经过了三次反复，10多天的作战，共歼敌900余人，取得了白彦战役的胜利。

白彦战役后，我被分配到师司令部做机要秘书，来到陈光身边工作。一天早饭后，我跟着警卫员，带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走向陈光的住处。那是一个单独的小院，极普通的三间土坯房。我走到门口，喊了声“报告”，陈光一面回答“进来”，一面站起身来。我向他敬礼后，紧接着说：“首长，我来报到。”陈光同我握了手，并让我坐下。我虽然多次见过陈光，仍不免有些紧张。陈光打量了我一下，像长辈一样关怀地问：“你读了几年书？”我回答说：“上了10年学。”陈光微笑着说：“那你可算知识分子了。”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组织已经考查了。今天，我们就谈谈机要秘书工作。机要秘书工作很多，如管理文件、材料，作会议、谈话记录等等，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管理机要电报。你准备几个笔记本，今后，凡属党中央、中央军委、总部的电报指示、综合性敌情通报，要分类抄录在本子上，并很好保存，便于我们经常阅读，研究执行。对发出的重要电报，也要抄录在笔记本上，便于经常检查执行情况。这些，都属于绝密和机要，绝对不能遗失。工作要细致，不能粗枝大叶。”当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时，我说：“没有经验，怕做不好，以后请首长随时指示。”陈光的谈话，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他那清晰宏亮的声音，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1940年3月，师政治部新闻台收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未等印出来，罗荣桓政委就将抄稿看完了，还指示我交给陈光阅看。陈光一口气看完，连声说：

“很好，很好。”接着，他又重点地看了一遍，当看到一些精辟论述时就大声读起来。看完后，他要我把要点摘抄在一个本子上，以便反复地学习研究。从3月中旬开始，他利用敌人尚未对我军“扫荡”的空隙，抓紧对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等重要指示学习研究（这一时期，罗荣桓主要到驻地做调查研究），围绕对敌斗争、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我党我军力量、创建根据地等有决定意义的一些重大问题，一部分一部分的阅读。他阅读文件时精力很集中，对一些重要段落和论点，都是一边看一边读，以加深理解，直到弄通为止。陈光对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对顽固派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十分赞赏，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少数反共顽固派袭击我军、杀害我军政人员的罪行极为愤慨。有一次，他故意问我：“你怎样理解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我看到陈光情绪很好，就说：“我还得好好学习。”陈光高兴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贯穿和体现着又联合又斗争的精神。结合山东，特别是鲁南地区具体情况，坚决执行，就是贯彻这一原则，也就一定能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陈光对于党中央给予一一五师的任务，即：发动群众壮大主力，创建鲁南根据地，十分重视。他联系当时肩负的重任，经常思考，必须粉碎敌人的“扫荡”，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如果不能保存自己，则其他都是空谈。因此，他在阅读研究党中央指示时，经常关注敌人的动态，在他挂的地图上，敌人的据点、兵力部署、番号、人数及我军所处位置，都标的一清二楚。

对鲁南地区的许多地主武装，罗荣桓与陈光都作了妥善处置，对抗日爱国的分别争取，组编为地方抗日游击队，对反共投敌充当汉奸的则予以打击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些零散的地主武装已基本解决，只剩下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二二师及国民党第十军团暂编第六师。当时，这两支部队都还抗日。罗荣桓与陈光积极对他们开展团结争取工作。师部确定由陈光出面，宴请暂编第六师师长孔昭同，谈判联合抗日事宜。孔昭同是孔子的后裔，在当地上层人物中有一定影响。为准备这次谈判，陈光口授了谈话要点，我记录后整理成一份提纲。那天早饭后，约10点多钟，孔昭同带领随同副官、马弁等10来人到了师司令部驻地哨里村边。我军接待人员陪同孔昭同来到陈光房前，陈光在门口迎接了客人。进入简陋的屋内后，围方桌坐下，又互相致意。陈光代理师长说：“欢迎孔将军前来共商抗日大事。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只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生路，妥协投降只是死路一条。贵军愿与我军联合抗日，实为民族之大幸。我本人并代表我军表示竭诚欢迎。”孔昭同首先赞扬了我军坚决抗战及取得的多次胜利，尔后，又就交换情报、日军进攻时互相援助等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孔昭同不仅和我党我军共同抗日，在病危中还嘱咐其儿子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不兼并我们的部队，他们一定能胜利。你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八路军走。”孔昭同病故后，儿子接替他的职务，一直同我党我军保持着友好关系，致使邹（县）滕（县）边的工作得到顺利开展。以后该部队自愿编入我军。

1940年3月中旬，鲁南周围敌人各据点开始增兵，陈光判断可能是要向我根据地进攻，便指示所属部队做好战斗准备。3月19日拂晓，敌人分数路向我师直属队合击，向我警卫部队猛烈进攻。警卫部队立即还击，掩护师直属队向后转移。同时，六八六团在白彦附近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枪声一响，陈光便带一名作战参谋和几名警卫员到了前沿阵地，指挥整个战斗。经过一天的阻击，我军杀伤了大量敌人，胜利完成了任务，于黄昏前集结，安全转移到了白彦以东12里路的刘庄。陈光回到师司令部已是深夜了，他不顾一天的劳累，直到询问清楚战斗情况后才休息。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罗荣桓政委打来了电话，我立即拿了纸和笔，准备记录电话要点。只听罗政委说：“从周围敌情的变化看，敌

人不仅是进攻白彦，很可能要对鲁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陈光完全同意罗荣桓的分析和判断，并在电话里向他叙述了昨天战斗的情况，表示要立即在全师研究和部署反“扫荡”。两天后，罗荣桓回到了师政治部，陈、罗首长发出了反“扫荡”的作战指示，要求主力部队转移到敌人的后方活动，内线和外线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扫荡”。

4月下旬，敌人集中8000余人，开始对鲁南根据地大“扫荡”。针对敌人“分进合击”和“分区包围”的战术，我师直分了几个分队活动：司令部及所属通信营、特务营为一个梯队，由陈光率领与指挥；政治部及附属单位、警卫连为一个梯队，由罗荣桓率领与指挥；供给部、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单独活动。师主力部队分别转移到根据地外围机动位置，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伺机向敌伪据点和交通线进行破袭，配合内线，打破敌人的“扫荡”。到边缘区作战，我军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特别是给养的筹措，既要保证部队的吃饭，又要执行政策和群众纪律。有一次，为冲破敌人对师司令部及直属单位的合围，我部转移到了根据地外围东北军一一二师驻地。因供给困难，陈光便指示我带两名警卫员到附近区政府筹集粮食。我到后，恰遇东北军一一二师两名军需人员也在区政府商讨筹粮事宜。我说明来意后，一一二师一名军需稍加思考，便表示愿协助我们共同解决。经过协商，区政府下了通知，几个村的群众很快把粮食送到了我部。我回来向陈光汇报了这一情况，他高兴地说：“罗荣桓同志确定我们对一一二师以友军相待，并做了许多争取、团结工作，现在证明，都是完全必要和非常正确的。”

在我内线与外线密切配合下，经过七天的周旋和战斗，粉碎了敌人对抱犊崮山区的合围。26日，大部分敌人分路向各据点撤退。这时，司令部转移到了费县西北的常庄。陈光分析了敌情后，决定趁敌人撤退之际，歼灭其一路，以扩大反“扫荡”的胜利。这时，驻常庄东南松林的一股敌人，似要向平邑撤退，正是歼灭它的好机会。为此，陈光进行了具体部署：由特务团、六八六团、苏鲁支队分别从西、南、北三方面堵截敌人，并命令司令部的一名科长带一个连队进占常庄与松林间的要点，监视敌人行动。谁知，监视敌人的那个连队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这股敌人直奔常庄。当时，在东南方向担任警戒的又是一个缺乏战斗经验的新部队，他们的排哨设在山头上。当天夜晚，敌人绕过排哨，到了常庄村边。午夜，才被我哨兵发现，立即开枪射击，并投掷了三颗手榴弹。机关人员听到信号后，紧急集合在村西北角，待命转移。这时，敌人的前哨班已经展开，端着刺刀，向我警戒班发起攻击。掷弹筒已打到村子里，陈光仍站在电话机旁和警卫部队通话，命令警卫部队坚决阻击敌人。半小时后，少数敌人隐蔽地袭进村内，沿着大街前进。陈光还守在电话机旁指挥，参谋、电话员多次催他快走，最后，干脆拖着他走出小屋，恰与冲到街上的敌人相遇，陈光机灵地翻过一个小围墙，躲过敌人。接着，钻进一个小胡同，又翻墙从老百姓的院子里脱身出来。机关的同志们都十分关心陈光的安危，直到他回到机关才放了心。

在罗荣桓和陈光的领导下，我军又经过几次战斗，历经一个多月，终于粉碎了敌人对鲁南山区的春季大“扫荡”，共歼敌2000多人，不仅保卫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地区根据地，我军还得到了发展与壮大。

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后，师直属机关于6月中旬转移到了天宝山区。师司令部驻天宝山脚下的桃峪村。天宝山区是连接鲁南与鲁中的战略要地，是巩固鲁南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重要支撑点。而当时这个山区，被日伪特务的地主反动武装——廉德三民团统治着，解决这部分反动武装，就成为紧迫的任务。罗荣桓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决定采取“借路”抗日的政策，首先将战斗部队开进天宝山区中心村庄，然后再占领附近制高点。陈光完全同意罗荣桓的正确决策，派人与天宝山乡乡长兼民团团长廉德三谈判。廉德三虽然内心极端仇视我党我军，千方百计阻击我军入境，但对我们这一正义要求，却找不到言辞拒绝，只好答应。这一天，我军经过周密部署，特务营及一些直属部队，于午饭后从驻地出发，经过3个多钟头的行军，在4点左右分别到达了天宝山区中心的几个村庄。避难的



1943年，陈光（左二）、罗荣桓、萧华在滨海区临沭县朱樊村

群众看到八路军说话和气，纪律严明，纷纷回到村里，这样，我军控制了天宝山区，并将廉德三民团收编，改编为天宝山大队。

7月初，师部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了民运工作队，在天宝山区配合党委及县委工作团开展地方工作。这时，陈光与罗荣桓政委商量决定，由我和另外两名秘书徐明辉、张秋桥组成一个群众工作组，到由吾乡的大、小由吾村。开始，我不理解领导的意图，觉得工作这样多，怎么还派我们去做群众工作呢？陈光好象看透了我们的的心思，再三对我们交代：“你们要注意调查研究和发动基本群众。要调查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对抗日的政治态度，村政权、自卫队由谁掌握。不要只听上层人物嘴上讲的。工作要做扎实。”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为了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后，我们经常把调查的材料和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陈光很重视这些报告材料。

日伪特务极端仇视我军进驻天宝山区，经过密谋策划，于8月初发动天宝山民团叛变，将我控制天宝山区制高点的一排战士缴枪，捆绑后送给费县日军杀害。接着，民团又占领了天宝山的主要阵地，袭击和阻击我在天宝山周围活动的小队，杀害我军执勤人员。同时，对群众进行欺骗、威胁，并采取强制措施，将男女老幼一律赶上南大顶、天宝固等几个山寨与我对抗。民团叛变后，许多同志建议以武力解决，罗荣桓和陈光一再说：“那样做必然要伤害群众，政治上对我们不利。”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用“围困”办法，促其内部分化，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但是由于敌特严密控制，民团为反动地主所掌握，堵死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我军遂于9月中旬，发起了平息天宝山叛乱战役。在组织进攻前，陈、罗首长一再强调，要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杀害已缴枪的俘虏，绝对不许伤害群众。如发生火灾，要组织灭火，抢救群众生命财产。战役由陈光具体指挥。参战部队于黄昏前将九二步兵炮架设在南大顶东面的山梁上，对准叛匪的东寨门。随着“隆隆”的炮声，突击队冲开缺口，很快占领了围寨，胜利地结束了战斗。天宝山区的解放，扩大和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使鲁南和鲁中联结在一起。

建设模范党军

1940年9月，一一五师在师司令部驻地桃峪召开了旅和支队以上干部参加的高干会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一五师进入山东敌后以来，发动组织群

众，同日伪军、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经验，发出了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模范党军的条件是：（一）明确了解党的政策；（二）普遍深入地建立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三）高度的政治团结，无比的阶级友爱；（四）发扬灵活、机动、果敢、坚决的优良传统；（五）严肃、紧张、坚持、精细的工作作风；（六）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会后，各部队根据高干会议的决定开始有计划地整训。陈光很重视部队的整训工作，亲自到附近部队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对于部队的军风军纪、内务卫生、军人礼节、制式教练，以及射击、刺杀、投弹、迫近作业等四大技术训练，他都按照条例、教程、教范以及有关规定严格进行检查，为实现模范党军创造条件。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全师指战员无不愤慨万分。肩负军事指挥重任的陈光更是焦虑不安，不停地思考着形势的变化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他多次找罗荣桓政委交谈。他们一致的意见是：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做好出现最坏情况的准备。按陈光、罗荣桓的指示，师部发出了支援新四军的动员令。师司政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干部、战士纷纷表示：坚决服从命令，随时准备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作战。

一天上午，机要科收到一份毛泽东发给陈（光）、罗（荣桓）及一二〇师、一二九师首长的绝密加急电报。由于事关重大，时间紧急，我未来得及抄录在电报本上，即将底稿交给陈光。陈光看了两遍，要我送给罗政委阅。罗荣桓看后，就拿着电报来到了陈光的屋里。他们充分估计了形势逆转的危险、发生全面内战的可能性以及投降派的阴谋活动，同时也分析了克服投降、内战危机的有利条件。根据形势发展，他们充分考虑了一一五师南下华中的方案。经过几次讨论后，罗荣桓亲自起草了电报稿，以陈、罗名义上报毛泽东。电报表示：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部队南下华中虽有不少困难，但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命令。1941年2月，一一五师指挥机关移驻临沂以北的青驼寺，与山东纵队靠拢。3月，为了开辟与扩大滨海解放区，师直属队又转移至滨海区临沭县寨子村，师司令部驻寨子。

3月下旬，教导二旅、山纵二旅一部紧密配合，发起青口战役，陈光亲临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以迅猛动作，对青口周围的日伪军盘踞的据点发动了攻击。经三天激战，击退了增援之敌，连克青口外围据点10余处，扫清敌伪外围后，遂发起对青口守敌的总攻，迅速突破城墙，攻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毙俘敌大部，最后将敌人压缩在两个碉堡内。拂晓，新浦援敌赶到，我军遂撤出战斗。18名战士攻入敌人纵深，未来得及撤出，被敌人包围。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子弹打光了，就把枪支毁掉，用枪托、砖瓦与敌人搏斗，最后壮烈牺牲。

7月中旬，战士报社的同志找到我，想请陈光写一篇纪念“八一”的文章，对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把他们的要求立即转告了陈光。陈光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便要先找点材料给他看看。随后，他口述了文章要点和提纲。文章写好后定为《论武装斗争》，阐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及我军建军的重要经验，发表在师政治部出版社的《战士报》八一专刊上。

在“八一”建军节那天，天刚亮，接受检阅的部队已经全部集结在新修建的广场上，阅兵总指挥、师参谋长陈士榘，跑步向罗荣桓、陈光报告：“准备完毕，请首长检阅。”这时陈光骑上了他那匹枣红马，在陈士榘总指挥陪同下，开始对部队检阅。每走到一个方队前，威武雄壮的战士们立正敬礼，陈光等举手向战士们还礼并亲切地问候：“同志们好！”战士们以整齐宏亮地声音回答：“首长好！”之后，罗荣桓政委站在检阅台讲话。接着，进行分列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检阅台，接受首长们的检阅。阅兵仪式结束后，部队分别在各个场地举行刺杀、射击、投弹和田径、球类等项目的军体比赛，并进行了政治测验。这次阅兵，进一步推动了部队的整军热潮，加强了部队的军政建设。

史庄打国民党军车

杜广建

1947年4月，正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期。进驻苍山县（今兰陵县，下同）长城、磨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活动非常猖獗，坑害群众。群众见不到自己的武装打击国民党军，情绪很不稳定。为了宣传群众，稳定群众的情绪，增强胜利信心，苍山县十区（长城）、十一区（层山）武工队决定联合行动，利用其骄横气盛开始麻痹之机，插进敌后开展游击斗争，向群众宣传我军胜利的消息，增强群众革命胜利的信心。中共苍山县委宣传部长张兆涌，县武装部长赵永萼和十区武工



解放军活抓国民党兵

队长颜士先，区委书记、武工队指导员任继世，及十区、十一区的武工队一起行动，夜间插到长城以北的长屯、小卞庄，准备打击从长城、磨山出来的小股国民党军。

武工队在村里隐蔽等了一天，国民党军未到该村。第二天下午，武工队分别在村中活动，晚上召开了群众会议，宣传我主力部队在莱芜打了大胜仗、在泰安又消灭了国民党七十二师等胜利的消息，让群众相信我军是要打回来的；现在有困难，面临的形势好比爬山头，已快要爬到山顶，爬过了山顶就好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住，迎接将来的大反攻；国民党反动派干尽坏事，丢掉民心，他们的困难更大，最终将会一败涂地，我军将要一直打到蒋介石的老巢南京，进而解放全中国。通过形势的宣传教育，参加会议的干部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们说，听了县区同志的讲话，了解了形势，看到了前景，心里亮堂了。会上，群众纷纷控诉敌人的暴行，表示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跟共产党走，支持部队和武工队打击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夜间，武工队30多人随即转移到燕子河西的杨庄、前后宋庄、墩头一带开展群众工作。

国民党军占领我解放区后，实行“清剿”、“扫荡”，利用还乡团势力对未撤离的农村党员、民兵进行拉拢策反，个别意志薄弱者经不起他们的威胁、利诱，交出枪支弹药，有的甚至叛变投敌，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和隐蔽的民兵武装造成严重破坏。沙埠村地主出身的王兆钧，抗战时期曾参加革命，原任我军连长，在国民党军进攻时投敌叛变，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沙埠乡乡长。为了解王兆钧叛变的有关情况，4月8日，县武装部长赵永萼决定派两名武工队员侦察情况。接受任务的是因战斗负伤回地方养伤尚未归队的沈廷贵（负伤前系八路军连长）、杜景顺（笔者的父亲，负伤前系八路军排长）二人。他俩曾是八路军的干部，又都是磨山区宋庄村人，因宋庄和沙埠两村相邻，人地都熟，便于行动。

二人于黑夜潜回宋庄村，向乡亲们了解了周围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的有关情况。他们得知，敌军在这里从南到北修了简易公路，通行的是汽车、大炮和坦克；公路在村前分道，一条向西北到磨山，另一条向东北通往碑柱村。二人又找到本村刚被敌军任命为保长的徐凤领，争取他为武工队干事。徐凤领很高兴见到共产党的人，讲了他所知道的沙埠王兆钧的武装配备及布防情况，表示自己可以给武工队带路，并要求发给一支枪。当夜二人又返回了武工队。第二天，指挥部在墩头村研究了打沙埠的作战方案，并同意送给徐凤领一支中正式步枪和五发子弹，要求他继续侦察并报告沙埠方面的情况。

4月10日晚，武工队在队长颜士先、指导员任继世的带领下准备按原计划去打沙埠伪乡公所。沈廷贵、杜景顺二人为此提前赶到宋庄，找到徐凤领，了解了当天去沙埠侦察的情况。徐凤领另外报告：从沙埠赶回时，发现在宋庄村东、史庄村前的临时公路上停有一辆国民党军卡车，装了满满一车货，装的是什么不清楚。汽车像是出了故障，开开停停，还叫他们过路的帮着推车，现在开不动了，车上人员不超过10人。沈廷贵、杜景顺听到这一情况就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先去侦察这个情况。二人趁夜色赶到宋庄村东，匍匐侦察，借着刚升起的月光，看到了停在史庄村前汽车的大灯，立即返回宋庄北门汇报情况。颜士先、任继世带领武工队已从墩头赶到，还有周宗志、王家秀、张步亭、周景里、吴广起、高金财、王洪奎、李沛刚、梁玉喜和区公安员张文兴等13人。针对这一情报，武工队当即决定，先打国民党军的汽车，以后再打王兆钧。

武工队随即搜索前进，在史庄村南的公路边上接近了卡车，立即从三面包围上去。队员正要上前去查看车上的东西时，忽然从路边场院屋里响起枪声，霎时武

工队的十几支枪立即开火还击。这时，已贴近场院屋的沈廷贵高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给我冲！”这话实际是喊给敌军听的。随即，他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和杜景顺一起率先冲到场屋门两边。沈廷贵把住门口，端起步枪往里一指喝道：“你们被包围了，都给我出来，缴枪不杀，顽抗只有死路一条！”杜景顺也同时靠近门东，用手榴弹捅开窗户里塞着的柴草，接着喊道：“再不出来，我就炸死你们！”场屋的敌人顿时慌了，忙叫道“可别炸啊，我们投降，投降！”先是从屋里扔出一支步枪，接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往外爬，爬出门口就向沈廷贵磕头，有的还把帽沿转到脑后以表示投降。

这次战斗，共俘虏了4人，分别是科长、副官、参谋、司机各1人。汽车上的货物大都用蒲包包装，计缴获八二迫击炮1门，九二式重机枪1挺，三八大盖枪13支，火箭炮架6个，文件1箱，还有金镯6副和手表等物品。因处在敌占区，时间紧迫，又是黑夜，无法细查，汽车及车上的剩余物品随后被武工队用柴草堆上点燃烧掉。事后，据被俘虏的副官交待，汽车里面还有几袋国民党中央银行钞票装在蒲包里，是发给敌八十三师的三个月的军饷；还有些首饰是该师师长准备的与姨太太结婚的礼品。当听到汽车和军饷被烧掉后，该副官连叹：“可惜！可惜！”

这是一次夜间袭击战，缴获颇丰。烧了军车后，武工队及宋庄村的部分参战民兵随即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迅速向西转移，连夜急行30多里，到了吴坦河西的顾庄、杜家圩子。缴获的武器、首饰、手表等物资，除大盖枪由武工队留用外，其它物品随后都由苍山县委如数上缴鲁南三军分区。后来得知，缴获的文件中还有军用地图。陈毅司令员还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过：“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败的，我们鲁南的民兵不就打了他们的汽车并放火烧掉了吗！再看这挂着的军用地图，里面有他们的作战部署，不也是这次蒋介石给送来的吗！”这次战斗武工队利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掉了国民党军汽车，对武工队和群众坚持敌后斗争都是一个鼓舞，为此，鲁南三军分区还发出嘉奖令，表彰了苍山县武工队打军车的战绩。“史庄打汽车”的战斗故事由此在当地广为流传。

据说，敌八十三师因这次军车被袭击而发不出军饷，还引起部分士兵哗变。可见，这次战斗在国民党军方面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地下医药采购站

郑海龙

1943年深秋，我被派往鲁南军区设在三孔桥的一个伤病员隐蔽所当卫生员，住在王记粮栈后院孙立堂医生家里，协助他工作。伤病员隐蔽在三孔桥附近的几个村庄里，生活由群众照顾，我们负责治疗。三孔桥北二三里处是夏镇，那里盘踞着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伪军尹瘸子的一个团。

1943年入冬后的一天下午，我在隐蔽点给伤员换完药回到孙医生家。一进门，见一个商人打扮的陌生人正和孙医生小声地商量着什么。孙医生发现我站在门口，连忙说：“小郑，这是李启悦同志，他在夏镇伪军那里做地下工作，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叫刘家廉的医生。以后，你就要经常到他们那里去，把他们搞到的药品转运到我们这里来。”李启悦走上来对我说：“小郑同志，一会儿跟我走，到我们那里认认门。”来到夏镇，我们走进一位姓乔的商人家里。我们一进屋，见有两个伪军官坐在桌边谈得正来劲。李启悦小声说：“你先在这等一下。”就向里屋走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伪军出去送另一个伪军。这时，换上一身黄军装的李启悦从里屋走出来说：“小兄弟，别站在那出神了，快到屋里坐。”我还没坐下，那个伪军官已经回到屋里。他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小郑同志吧？”

李启悦忙过来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刘家廉同志，我们采购站的负责人。”从此，我和他们建立起联系，每隔三五天就去那里取一次药。

后来我才知道，刘家廉和李启悦同志是在1942年冬天打入伪军的。他们取得了尹瘸子的信任，刘家廉当上了少校医官，李启悦当上了上士卫生员。表面上两人在姓乔的商人家里开诊所，为伪军看病。实际上，这里是鲁南军区的一个地下医药采购站。

一天下午，孙医生告诉我，夏镇来了通知，让我马上去取药。我来到刘家廉的诊所。进了里屋，见李启悦正在等我。他早已准备好了两篓子药品，叫我赶快担走。我担起担子出了诊所，没走几步，就觉得这次担子比以往的沉。这时，从对面走过来一个伪军，他拎着皮带，戴着墨镜，冲着我喊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放大嗓门，有意让李启悦听见：“赶集的！”

那家伙两脚一叉，挡住我的去路，又伸出手来抓我的担子。我猛地向后退了一步，闪了他一个趔趄。他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他娘的，我看你不是赶集的，是给八路送东西的。”

“什么八路九路的，我不知道。我就是来赶集的，不信你就看看。”

“哟，张班长啊，今天咋来晚了？”我一听是李启悦的声音，顿时松了口气。李启悦来到伪军跟前，从裤兜里掏出一支小药瓶，在伪军眼前晃了晃说：“这‘六〇六’是我特意给你留的，咱对你够交情吧？走，进屋打针去吧。”



日伪时期，微山夏镇一代的民房建筑

伪军点头笑了笑，还是不想放我走，指着我对李启悦说：“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赶集的，可能是给八路送东西的。”

李启悦满脸不高兴地说：“你没看到他是从我们的门里出来的吗？实话跟你说，这位小兄弟帮我们做点小生意。”

这时，刘家廉走过来。伪军满脸堆笑地迎上去，“叭”的一个立正，行了个举手礼，说：“刘医官，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我正在盘问这个小伙计，没想到是您府上的人。”

刘家廉绷着脸说：“没什么，以后见了我们的小伙计给点方便就行了。”

“那一定！那一定！”伪军边说边跟着李启悦向屋里走去。

刘家廉向我摆了摆手，示意我快走。我担起担子快步向镇外走去。

我出了夏镇来到护城河桥，放下担子靠着桥栏杆休息。看着两个沉甸甸的篮子，好奇心促使我打开了一个篮子。我把上面的脱脂棉、纱布卷等一件件拿出来，把装药的玻璃瓶往两边一扒，猛地把手抽了回来。我赶快把东西重新装好，挑起担子就走，恨不得一步就迈进孙医生家。原来，篮子下面有两支手枪、四枚手榴弹和几十发驳壳枪子弹。

我回到孙医生家里，又惊又喜地向孙医生说：“我今天担的有‘硬家伙’可偏偏遇到伪军盘查，多亏刘医生他们解了围。”我一边把药品、枪弹往外拿，一边带有埋怨的口气说：“以后再担‘硬家伙’，事先给我交个底，好有个思想准备。”孙医生说：“好吧，我向刘家廉同志说一下。这次也是为安全着想，怕告诉了你，你会精神紧张。”

后来，我从刘家廉的诊所里担出许多药品、枪支、弹药和钢笔、手表、纸张等部队急需的用品。每当孙医生或李启悦对我说“路上多加小心”时，我便知道一定又有“硬家伙”了。

鲁南军区不断扩大，战斗更加频繁，部队需要的药品数量日渐增多。

1944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孙医生去支队开会回来，领着一个人来到我的房间。孙医生向我介绍说：“这是军区派来买药的范惠民同志。”

然后又对范惠民说：“这就是小郑同志，到刘家廉那里担药的就是他。明天他带你去夏镇和刘家廉接头。”

次日清晨，我和范惠民来到夏镇街上。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我们没有遇到敌人的盘查，顺利地来到刘家廉的诊所。

范惠民和刘家廉见面后，说明了来意。军区派范惠民出山，是让他和刘家廉一起到天津去购买药品。他们在一起研究商定了具体行动方案和起程的日期。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俩一个是伪军军官的装束，一个是商人的打扮，动身去了天津。

刘家廉和范惠民一去十几天，杳无音信。军区首长几次派人到三孔桥打听消息，孙医生和我也急得寝食不安，担心他们遇到了危险。

20多天后，李启悦兴冲冲地来到孙医生家，激动地说：“货已到手，按预定的方案接货。”

一辆马车满载着货物从临城城里朝关卡走过来，刘家廉和范惠民坐在车里。车上装的是药品和器材。一些零散药品都装在十几名民工的担子里，担子上面放着蔬菜、粮食、柴草、禽蛋等。这些民工分散地跟在马车后面。马车和十几副担子已经顺利通过了城内的几个关卡，只剩下出城的最后一道关卡了。刘家廉心里明白，敌人对这道关卡把守得最严。

马车来到关卡前停下。刘家廉从马车上跳下来，傲慢地拿出买药的证件，递给带班的伪军。这家伙看看刘家廉的打扮，又看看盖着官印的证件，“叭”的一个立正：“长官，请。”

刘家廉招呼正在帮着车把式紧绳套的范惠民说：“范掌柜，走吧。”

范惠民头也没抬地说：“刘医官，别着急。这车上的绳子松了，不紧一紧，马车跑起来摔坏了东西，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刘家廉转过头来向那个伪军说：“和这些商人做买卖真伤脑筋，他们就认识钱。”说完，刘家廉掏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递给他。其他的伪军都站在一边看着，刘家廉朝他们哈哈一笑：“弟兄们，拿去抽吧。”把一盒烟扔给了伪军。

这时，挑担子的民工陆续来到关卡。他们拿出良民证，伪军们看了看，就放行了。眼看十几副担子就要过完了，一个伪军走到带班的跟前说：“今天的小贩怎么比哪天都多，我看这些人有点可疑。”

带班的伪军把烟头往地上一摔，说：“对！把后面的那几个拦住，严格检查。”说完，就拦住一个民工。

“哪里的？”

“夏镇的。”

“挑的什么东西？”

“老总，你们不是看见了吗？做点小生意。我有良民证，请老总高抬贵手吧。”

“他奶奶的，有良民证也不行。给我搜！”

站在一旁的两个日本兵也过来叫嚷着：“顶好！顶好！”

几个伪军一拥而上，把篓子上的东西扔了满地，篓子里的鸡蛋露了出来。两个日本兵高兴地嚷着：“顶好，顶好，咪西咪西。”抓起鸡蛋就往怀里揣。

刘家廉走过来拍了拍那个带班伪军的肩膀，小声地说：“实话告诉你，这几个做小生意的都是我雇来的，给我们尹团长做一笔买卖。你要是给点方便，事成之后，我在尹团长面前美言几句，不然的话……”说着，刘家廉掏出一个纸包塞到他手里。这家伙眼珠转了转，立刻就明白了。他把纸包塞进兜里，冲着伪军们喊：“弟兄们，这都是夏镇尹团长手下的挑夫，是自己人。”

挑担子的民工都出了城，刘家廉和范惠民这才上了马车。车把式的鞭子“啪”的一声响，马车通过了城门。

东西送到三孔桥，下一步就该往山里送了。我非常向往主力部队的战斗生活，就把想法告诉了范惠民，要求完成任务后留在山上。范惠民和孙医生商量后，满足了我的愿望。

这天天黑后，由20多名民工组成的送药队，在铁道游击队两个短枪班的护送下，离开三孔桥，向鲁南军区机关所在地进发。我和范惠民走在民工的前头，过了津浦铁路，前面就是根据地了。这时，我情不自禁地回头望去，三孔桥早已消失在迷茫的夜色之中。

我的抗战记忆

解玉峰

参加八路军

我原籍山东省临沭县白旄乡朱雀村，靠近沭河。我1924年农历正月初四出生，祖辈几代都是农民。我小的时候由于人多地少，生活很困难，地里产的粮食不够吃，加上农村土匪猖獗，再要遇上灾荒，日子就十分难过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华北，我的家乡沂蒙山区是革命根据地，经常遭受日本人杀、抢、烧“三光政策”的扫荡，而国民党的军队不但不抗战，而是日军来了就逃跑，还欺压老百姓。这时亲眼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虽然武器装备差，但能打日本侵略军，很受老百姓拥护。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接连不断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实行扫荡蚕食。我们村子西边是沭河，河的西边是敌占区，敌人在曹庄、黄庄、于屋等地都设立了据点，最近的距离我们村子只有4华里。日军经常来抢东西，老百姓过着兵荒马乱的日子。

一次日本人扫荡以后，村子里一片狼藉，乡亲们都说这日子没法过了，特别是一些青年聚在一起议论，都说只有起来抗日别无出路。有一次，我的远门哥哥叫解玉先和一个叫王贵的青年说，你们如果同意，咱们组织起来配合八路军保卫家乡，大家一致赞同，当时报名的有二三十人，我也报了名。人是组织起来了，叫什么名字呢？有人说叫抗日自卫队，又有人说叫沭河抗日自卫队，大家一致同意。自卫队建立后没有枪怎么办呢，正为难时就来了三个人，说是八路军派来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临沭县独立营的。他们先是对我们讲了一些抗日的道理，最后说我们要接受临沭县独立营的领导，并能发给我们枪支，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1943年3月，在柳庄召开大会，我们正式编入临沭县独立营，我被编入一连一排三班当战士，连长叫李跃德，指导员叫白连，营长叫陈士法，政委是钱英。我们每人都发了一支枪，但子弹很少，有四颗手榴弹。从此我们活跃在沭河和沂河两岸，同敌人开展游击斗争，在多次的反扫荡和作战中，我们缴获了不少武器，不断壮大，步枪也好了，还有机枪、小炮等。到了1944年春天，我们营被编入滨海军区特务营，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保卫麦收

1942年6月，这年鲁南地区小麦长势特别好，眼看就要成熟了，上级指示要发动群众保卫麦收，防止日本人来扫荡抢粮。滨海军区政治部决定从



作者简介：

解玉峰，1943年2月在沂蒙山区参加八路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1947年转业，历任吉林省图们银行行长，延边银行行长，延边州委财贸部部长，中共延边州委常委，延边州委副书记，延边州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中共吉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离休后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



左为解玉峰（摄于1946年）

部队抽调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农村宣传抢收小麦。当时从我们连抽调15个人，其中有我，由指导员白连带队。下去之前连长作了动员，内容是如何帮助群众收割、藏粮以及遵守群众纪律等。我记得，为了便于发动群众我们还学了一首民歌：坡（地）里麦子黄了梢，鬼子扫荡要来了，咱们大家准备好，快打快扬快藏好，鬼子来了找不到。

我们去的是临沭县曹庄、南古等三个乡，一边帮助老乡割麦，一边宣传抗日。白天和老乡收割小麦，晚上在村头树底下和青救会还有民兵开联欢会，讲解宣传抗日道理。我们一共去了一个多星期，回到部队后召开了总结会，我们还受到了军区政治部的表扬。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2月，滨海军区特务营召开大会，军区领导讲了冬季反扫荡以来取得的胜利，分析了抗战形势，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标。会后指导员白连和排长马如彪找我谈话，大意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不断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主要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又讲到抗战胜利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说愿意参加。他们还讲了些鼓励我的话，说我们连大多数干部战士不识字，我还有些文化，最后说道共产党员战时不怕流血牺牲，平时要能吃苦、团结同志。谈完话后白指导员给了我一本叫《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的老家》的小册子。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次谈话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受到的最深刻的一次教育。我把小册子当宝贝一样放在行军包里，有时间就拿出来看。从那以后，我每次打仗都更勇敢，平时还经常到营部拿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读给大家听。

1945年二三月份，我们连奉命到临沂周围的敌占区打游击。一天，驻临沂的日伪军出来抢东西，去的地方是平原，离我们连的驻地有20余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连里选出20多战士作为先遣突击队，连长要我带队先出发，他在后面指挥。我带着这些人经过急行军，很快就到了一个叫黑屯的村庄，在西边松树林里埋伏下来。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抢东西的敌人路过这里，看到敌人越来越近了，我说了声“打”！步枪和轻机枪一起射击，我们紧接着也冲了上去。这时我们连的队伍也上来了，很快便结束了战斗。除了少数敌人跑掉外，其余20多名伪军全部被俘



1981年9月，万里副总理视察延边（右三为万里，左一为解玉峰）。

虏，缴获步枪15支，还有一支手枪。回到根据地后受到军区的表扬，我还被选为战斗模范。过了两天，指导员白连和已经成为副连长的马如彪找我谈话说：你已经被营党委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员，候补期为一个月。当天下午，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举行了入党仪式，共有六七名新党员参加。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马如彪，一个月后转为正式党员。

漂亮的追击战

1944年夏天，我们部队到临沂附近的敌战区和游击区，打击日伪军，发动群众，半个多月后，按照上级指示回到根据地整训。我们驻临沭夏庄，七月中旬的一天，刚吃过中午饭还没休息，就听见吹集合号。部队集合后连长讲话说，有一股扫荡的日伪军正从韩家村经卢官庄向临沂逃窜，上级命令我们连去追击这股敌人。当时部队战士们刚从敌战区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回到根据地，刚松了一口气。大家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因为战争的生活环境都习惯了，也不感到意外，于是迅速集合就出发了。我们计划在敌人没过沭河之前追上他们，所以一开始就是急行军，按照距离从夏庄到卢官庄以西，最快也需要四个小时，因此部队是跑步行军。中间要经过几条小河，都是不解绑腿直接从水里过去的。有的病号跟不上部队，只好丢下，终于按预定时间下午一点多钟到达沭河东岸。刚埋伏下来，敌人就从右边沭河的上游开始渡河了。连长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起射击，打得敌人乱了套，不顾命地往西逃跑。有的将抢来的牲口、粮食和衣物都丢在了河里。因为相距几百米，我们追上去时，敌人已经跑掉了。打扫战场时，突然听到后面又有枪声，原来扫荡的日伪军在各村抢东西时，有一小部分掉了队。我们回过头来又把他们包围并消灭了一部分，剩下的两个日本人和一些汉奸被我们俘虏了，还缴获了两挺机关枪、十多支步枪和其他军用物资。为庆祝反扫荡的胜利，部队在韩家村召开庆功大会，老百姓还慰问我们好几头猪。



英雄的伟大母亲——张恺

穆志全



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的一天，我回家看望母亲张恺。91岁高龄的母亲独自坐在院中，眼睛凝视着前方，嘴唇微微在动，好像在深思，又在沉吟。我悄悄走近母亲身旁，呀，原来母亲在唱歌，在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在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刹时，我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望着显得宽大的圈椅中母亲瘦削的身躯，我想，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曾经的男兵战斗连队的“女党代表”，一个曾经握着仅有的两颗手榴弹就勇敢地冲向敌阵的女战士，一个在国共合作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中面对国民党军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坚定不移的女革命者，一个新婚之夜未进洞房先赴战场、敌人用机关枪小钢炮为她的战场婚礼燃放“鞭炮礼花”的八路军新娘，一个曾深入敌后开展秘密工作的女地下党，一个长期担任一级党组织和一个部门“主官”的大胆泼辣而又成绩卓著的女领导干部。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张恺同志则是不平凡的，堪称英雄的伟大母亲。

—

1918年夏，母亲张恺（原名王世荣）出生于辽宁省营口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不久，全家就搬到了外祖父就职的河北省山海关。自母亲记事时，外祖母就开始教母亲识字算术，以致吟诵古代诗词。母亲天资聪颖，没几年就学完了外祖母从外祖父那里学到的文化知识。外祖父听说后大喜过望，尽管那时还不兴女孩上学，外祖父还是决定送母亲上学读书。家里经济拮据，拿不起学费，好在当地还有不用交学费的学校。母亲的大姑夫田中玉民国初年曾在吉林、山东当过督军，有些积蓄，在家乡山海关办了一所中学、几所小学，免费招收当地适龄儿童上学。

母亲学习成绩很好，每每受到老师的表扬，外祖父就觉得脸上很是有光，对母亲就愈加疼爱。后来，外祖父在山东枣庄中兴煤矿谋到了职业，全家人又搬到枣庄。外祖父认定母亲是读书的料，不惜全家人节衣缩食，又东挪西借，送母亲到大城市天津河北女子师范附中读书。

1937年6月底，母亲放暑假回到枣庄家中。几天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继续读书已是不可能的了，母亲多年来通过读书以求自立的理想破灭了。经过几天的焦虑、思索，母亲决心投入抗日斗争。她和当地的爱国学生自发地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引起了当地党组织的注意。10月的一天，母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母亲的行动引起了外祖父的不安，他说：“国家几百万军队打不赢日本人，你一个女娃子瞎嚷嚷抗日，还不是白送死？”母亲说：“只要全国人民都起来抗日，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人。”外祖父说不过母亲，就把母亲锁到家里，不准出门。僵持了十几天后，外祖父拿了一把菜刀搁在母亲面前，老泪纵横地说：“我们一家人磕磕绊绊几十年过到今天容易吗？你要走，就先把我杀了，我两眼一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母亲也哭了，说：“爸，我不杀你，我要杀日本人。我走了，你们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就当白养了、白疼了我这十几年。”

从此以后，家里就不再管束母亲的行动了。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干部

二

1938年3月，枣庄沦陷前，母亲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撤出枣庄，到山里打游击。临行那天，家里没有一个人给母亲送行。母亲身上没有一分钱，甚至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就这样离开了家。母亲这一走就是十年与家人音讯全无，直到1948年才与家人取得联系。母亲走后，有人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说母亲参加了八路。日本人把外祖父抓去，外祖父一口咬定母亲病死他乡。敌人没有证据，又有同事作保，外祖父才得回家。

从各地撤到山里的人们聚齐后，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当时不到20周岁的母亲任三大队四中队指导员。全连只有母亲一个女同志，母亲就剪短了头发，换上了男式军装。当时装备极差，全连只有几十条老式步枪，大多是大刀长矛。母亲作为中队指导员，也只分到了两颗手榴弹。不久部队奉命袭击日军一个运输车队，母亲握着仅有的两颗手榴弹和全连同志一道参加了战斗。这一仗，打死打伤鬼子多人，还抓了一俘虏，缴获了几卡车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母亲从战利品中分到了一支手枪。这是母亲的第一支枪，是她亲自参加战斗从敌人手中缴获的。

1938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派出五名同志到国民党保安二旅开展统战工作。刘其人同志以公开的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任保安二旅政治处长，母亲等三名女同志以爱国青年的身份出任训练队教员，被授予国民党军队中尉军衔。

年底，日军逼近保安二旅驻扎的费县城。一直信誓旦旦不惜与日军血战到底的保安二旅一枪未放，连日本人的影都没见就撤出了费县城。部队转移后，旅长召开旅部人员会议，宣布他要与三名女同志中的王某结婚。王某表态说她与旅长是真诚相爱，愿意做旅长的小老婆。并说她是喝过几年墨水的人，不会上当受骗，还诽谤党代表刘其人对她有意并纠缠她。随后旅长宣布刘其人为不受欢迎的人，让其限期离开该部。至此，保安二旅与我党的统战关系破裂。

母亲和另一名女同志是以爱国青年的身份到二旅工作的，不经二旅批准擅自离开，人家可以开小差军法论处。所以一时还不便离开。刘其人走后，保安二旅开始对母亲和另一名女同志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使尽各种手段企图把她们“统”过去。母亲她们坚定不移，不为所动。十几天后，也就是到了1939年的春天，母亲她们终于经山东分局的安排，脱离该部，回到我方。

三

1939年6月，日军集中数万兵力对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战时服务团由时任服务团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带队到沂水县二区由当地党委安置。二区委书记召集服务团、鲁艺学校、医院、报社、青委会、妇联等赶到此地的七八个单位的负责人会议，说情况紧急，每人发两块大洋，各自回家暂避，待形势好转后再重新集中。母亲想，服务团大多数同志没有战场经验，家又多在敌占区，能不能独自走出这方圆几百里的战场都不好说，就是回到家中，也很容易被敌人抓了去。如果分成几个小组，由有经验的同志带队，在根据地里跟敌人打转转，倒是更安全些。母亲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全团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由支部委员带队，换上便衣，女同志一律女扮男装，每个人配发了武器，就上路了，目的地是敌人扫荡前服务团住过的四区夏蔚村一带。

母亲带的这一个小组昼夜兼程。一天看到大路上有个日本兵，附近没有其他日军，估计是掉队的。母亲她们二话不说，上去就把他活捉了。语言不通，问不出什么，母亲就打算把他交给大部队或者领导机关。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母亲她们还在村外宿营地，就听

到不远处大路上传来大队人马急促的脚步声，还夹杂有日本人的说话声。情况紧急，当地村里的民兵搬起大石头砸下去，那个日本兵吭都没吭一声，脑袋就被砸开了花。几天后，母亲这一组迂回到了目的地。又过了几天，其他几个小组的同志也都赶来了。全团人员一个没少，许多小同志激动地哭起来。

母亲被临时任命兼任四区区委组织宣传委员，就地开展的工作。当地的情况很复杂，区委书记李松在母亲活动过的一个村庄被敌人抓住杀害了。

1939年秋至1941年初，母亲先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党校、鲁南区党委党校组织科长。1940年3月的一天，党校驻在莒县的孟家西楼村。夜半时分，母亲突然被枪声惊醒，起来仔细听听，又没有动静了。刚停了一会儿，一颗手榴弹在院子里爆炸了，房顶的土震得哗哗直往下落。母亲赶紧跑到队部，这时队伍已经集合，开始往村外撤。当时党校和军区教导队住一个村。这次鬼子从村东头进村，先与教导队接火了，党校才有集合撤退的时间。母亲是组织科长，行动时要走在队伍的最后边，担负收容、警戒的职责。队伍撤出三四里路，到了孟家中楼区党委机关的驻地。区党委立即组织军区特务团阻击敌人。激战近一天，击溃了敌人。特务团战士伤30余人，牺牲20余人。

自1941年初至1950年夏，母亲先后担任鲁南区党委、鲁中南区党委妇委书记、妇联主任，在长达九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着沂蒙老区妇女工作部门的最高领导职务。由于当时的环境，母亲大多数时间在下面县、区委兼任职务，负责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敌人来了，母亲就带领地方部队和民兵与敌战斗。母亲能用双枪，练就了骑马射击、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的好本领。母亲喜欢打仗，也善于打仗。一位老同志曾说：张恺同志当年是名副其实的双枪老太婆。

四

在根据地大刀阔斧工作惯了的母亲，1943年春被下派至敌占区兼任沛滕县委委员兼夏镇特别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母亲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梳上假发髻，把钢笔插到长筒袜里，手枪放到随身带的包袱里，就跟交通员越过敌人的封锁沟、封锁墙，混过鬼子把守的层层哨卡，到了夏镇靠近微山湖边的一个堡垒户家中。去了以后才知道，夏镇鬼子据点里的伪军大队长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三大队的大队长。那家伙原是土匪头子，抗战初期被我军收编，后来又叛变投敌当上了伪军大队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伪军小队长曾是我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母亲曾带他打过仗。这意外的情况，无疑给母亲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一次母亲外出接党的关系，到了野外，迎面来了一队伪军。母亲看着领头的那个家伙有点像从我方根据地叛逃过去的那个民兵，想躲过去，就拐上了一条岔道。可能是步子急了点，引起敌人的怀疑，那一小队伪军一下子包围过来。伪军小队长打量着母亲：“干什么的，你跑什么？”母亲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对付他们，同去作掩护的房东家小妹抢先说：“这庄里的老百姓，这是俺嫂子。俺哥叫俺们来看看地里种的豆子旱不旱，要不要浇水。”“那你们跑什么？”伪军小头目又问。还是小妹回答：“俺两个妇道人家，你们一群大男人，还带着枪，俺能不害怕吗？”这时母亲也确认这个伪军小头目不是从我方根据地叛逃的那个民兵，就完全镇定下来。小妹说完，母亲跟着点点头。伪军没看出什么破绽，一招手走了。

麦收时的一天，房东一家人在大门外打场。母亲掩上门，一个人在屋里看从根据地送过来的文件、报纸，忽然听到房东大嫂大声喊了一句：“一家人都在外面打场，屋里哪还有人啊！”母亲这才发现，几个鬼子带了一小队伪军到了大门外，有两个端着枪的伪军已经进了院子。原来那天鬼子伪军有行动，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再收拾已经来不及了，母

亲只得拿出手枪，躲在门后，静观事变。伪军看了几个房间没人，就端着枪朝母亲住的房间走过来。这时房东大嫂一把拽住伪军的胳膊，死死地拉住，说：“这你都看了，屋里没人，这么大热的天，还是到外边喝茶凉快凉快去吧。”伪军忙了大半天，的确又渴又累，看着屋里也不像有人的样子，就被大嫂连拉带拽地出了门，走了。

有了几次这样的教训，母亲就把活动尽量安排在晚上，白天就撑起船到湖里去。一个夏天，在微山湖的芦苇荡里、荷花丛中，母亲她们召开党的会议，转接关系、传递情报，接应铁道游击队、微山湖大队的同志们。

五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历任山东省妇联秘书长、主席，省民政厅副厅长，济宁地委书记处书记兼济宁市委第一书记，吉林省纪委副书记等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母亲任省委委员、省妇联主席，是山东省职务最高、唯一行政10级的女干部。文革中造反派对她批斗、甚至武斗。母亲说：“你们打过鬼子吗，打过老蒋吗，有本事去造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啊！”回到家母亲还说：“这帮造反派什么东西，当年老娘拉队伍打鬼子的时候，他们还不知在哪里穿开裆裤呢？”母亲十分看重自己的革命经历，不管造反派怎样批斗，从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三反分子。

六

母亲一生在事业上无疑是成功的，在恋爱婚姻家庭方面也堪称轰轰烈烈、感天动地。

在党校工作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夫人史秀云、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等同志多次给母亲介绍对象。

可我母亲讨厌这种介绍式婚姻，她想要找就找自己熟悉的、了解的、真正有感情的。于是，母亲有空就下到班组参加学习讨论，一方面是为了多学点知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开那些热心的大姐们。

在党校工作期间，母亲与时任党校主任的父亲穆林建立了感情。父亲当时职务较低，但母亲不在乎，她珍视的是与父亲这份没有任何人为因素、完全是在共同的工作中自然生发的感情。父亲不到规定的结婚年龄，聪明的母亲就写了一份恋爱报告送到鲁南区党委书记赵罇同志那里。赵罇看了，笑笑，掏出钢笔就在报告上写了“我同意”三个字。有人给赵罇提意见，说还有那么多年龄大些的同志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穆林太年轻了，应该靠后站站。赵罇说：“我们没有规定不到结婚年龄就不准谈恋爱吧，人家写的是恋爱报告不是结婚报告，我能不同意吗？”

1941年秋，组织上批准父母结婚。母亲风尘仆仆一天赶了近百里山路，天擦黑时到了江苏省东海县父亲的驻地，父亲此时任滨海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进了村，母亲发现军分区的部队以及当地县区武装和民兵已经集合完毕整装待发。一问，原来当晚有行动，要去袭击陇海铁路，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母亲二话没说，行李都没放下，就和父亲一道奔赴战场。

夜幕下，在苏北广袤的田野上，新婚之夜的父母，还没进洞房，就并肩奔向战场。母亲说，当时的心情真是又激动，又幸福。任务完成的差不多时，敌人发现了，机关枪小钢炮一阵紧似一阵地打过来，“咚咚”“啪啪”地响个不停。战友们风趣地对父母说：看，你们的婚礼多热闹啊，又是放鞭炮，又是放礼花。

在婚假期间，母亲两次参加破袭陇海铁路的战斗。

母亲休婚假离开区党委机关后，由于叛徒出卖，区党委机关遭到敌人袭击。在突围



中，很多人牺牲，区委书记赵鏊同志等被俘，赵鏊被敌人活埋，壮烈牺牲。史称“银厂惨案”。

1943年春，母亲到敌占区工作。当时国民党嫡系92军正大举向我鲁南抗日根据地进犯，妄图一口吞掉我根据地，鲁南地区形势骤然恶化。父亲此时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的费滕峰中心县首当其冲，而这时父亲又有腿伤，行动不便，行军时还需坐担架。父母结婚后虽然聚少离多，但像这样的分别还是第一次。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一别何时能再见面、能不能见面都是很难预料的。在根据地最边沿的一个小村，父亲送母亲到村头。天黑了，两人相对而立，谁也没有说话，就这样，他们在黑暗中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最后父亲挥了一下手，母亲转身就跟交通员上路了。

半年后，母亲奉调回区党委机关，进了根据地，路过父亲工作的县委驻地。父亲和县委的同志们正在开会，母亲一下子闯进门。看惯了母亲穿军装样子的同志们一下怔住了，待看清眼前这位穿便衣、像是当地小媳妇的人是我母亲时，父亲和同志们禁不住一下哄笑起来。在这笑声里，母亲听到了胜利的喜悦。在母亲离开山区根据地的半年时间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带领当地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彻底打垮了直接进犯他们那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此时母亲发现，父亲的腿伤也全好了。

战争年代，母亲有三个孩子都是生下来不久就交给群众抚养。由于叛徒出卖，交群众抚养的哥哥年仅一岁时有同村十几名党员民兵被还乡团抓获。敌人先把抓到的党员民兵逐一杀害，又准备杀我哥哥。群众趁混乱把我哥哥藏了起来，后来又藏到山洞里，终于保护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长期担任省里的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兄弟姐妹成人后相继入了党、提了干，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这一切，都与母亲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

母亲曾说她一生中有很多遗憾，比如说作为一个女同志年轻时没有穿过一件花衣裳，作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穿了十几年军装却没有留下一张穿军装的照片，有三个孩子生下来就送给群众抚养，没能像普通母亲那样与自己的孩子朝夕相处，给他们缝补浆洗喂水喂饭，亲眼看着他们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由于战争自己没能多上几年学多读几年书，没能实现少年时代的理想当一名桃李满天下的教师……

但母亲感到更多的还是幸运和欣慰：作为幸存者她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作为长寿老人她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而这一切正是她一生魂牵梦绕、不惜牺牲一切为之奋斗的。

后记：张恺于2015年1月2日在济南因病逝世，享年98岁。



金代状元张行简

在大地上



张行简，字敬甫，日照西关太平里人。生年已不可考，卒于金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秋。张行简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张莘卿，是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做过国史馆编修、翰林应奉文字。补镇西军节度副使，朝散大夫。他的父亲张曄，是正隆五年（1160年）进士。做过太常博士，山东东路转运使，御史大夫，武安军节度使。张行简聪明好学，幼年时经常听父亲讲授经史，长大后更是博通经史，才华出众。史上称他“颖悟力学，淹贯经史”。大定九年（1179年）考中状元。一开始任应奉翰林文字。后丁母忧服丧一年。居家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写出不少好文章。服除又上任，金章宗完颜景即位后，他转而任修撰，进读陈言文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任太常博士。西夏国派遣使者陈慰，想要致祭大行灵殿。张行简上奏说：“那陈慰不是专祭，不可以廷议。”太傅徒单克宁很认同他的话，非常器重他，把他转为翰林修撰，升为礼部郎中。

张行简对天文历法也有所研究。司天监刘道用改进新历，金章宗下诏由学士院更订历名。张行简上奏说：“请复校测验，等将来月蚀没有差错，然后再赐名。”章宗下诏由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复校。党怀英等人校订新历，发现错误很多，月蚀时刻不同，验证了刘道用的新历不可用。后来张行简担任提点司天台直学士时，对新历进行精细校正，定名“太一新历”，颁布实施。

张行简关心民间疾苦。明昌三年，他上书奏道：往年饥民抛弃孩子或乞求送人，孩子的父母衣食稍微充裕点，就要把孩子认回来，官府就会断给他们。从那以后，饥荒年灾民流离飘荡，人家都不肯收留，就饿死在沟中。最近的御灾诏书都说：孩子送出以后不得再要回来。现在希望按照这个规定施行。章宗认为他说得对，便下诏中书省按此施行。后来他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同修国史。

张行简精通礼学，熟悉历代礼仪。他上书按唐制定礼仪，对当时所行的不妥的礼仪，加以改进。并提出在太常博士以下，设置检阅官二名。通礼学但资历浅的，使他们积累资历再升迁为博士。又上书道：“现在虽然有国朝集礼，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没有写成书，一定要写出来，来表示礼无穷尽。”承安五年，他升为侍讲学士，同修国史，提点司天台等职位还和原来一样。

张行简做事谨慎周密，人所共知。泰和二年，他任宋主生日副使。章宗诏告生日使完颜瑋，告诫他说：“你过界后不要饮酒，凡事要听行简的。”对张行简说：“宋人行礼，好注重细枝末节。如果有是非，都要更正。旧例所有的，不可不做到。”并说，“听说以前的奉使者，过淮海时到了中流，就因分界的事和渡船的人争执，非常无礼。你要自己避免和舟人起冲突。”并对宋使说：“两国和好很久了，不应该争小事伤了大体。叮咛告诫他们，是使他们明白这个意思。”金章宗对张行简很信任，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章宗下诏说：“在奏事的时候，必须让张行简常在左右。”

泰和五年，群臣又请为章宗上尊号，章宗没答应。诏命张行简批答。于是问大宋的范祖禹作唐楷，论尊号的事。行简回答说：“司马光也曾经进谏过尊号事。不如范祖禹的言词深透，说是臣子活着就以君父定谥号，好像很惨切。”章宗曰：

“卿用范祖禹的意思回答他们，文字深刻典雅，非常符合代言之体。”这一年，张行简改做顺天军节度使。章宗说：“卿未经历治民。现在到保州，民情不真，终究难以猜测，该怎么治理？”行简回答说：“臣奉命行使法令，不敢违反和失误。案件诉讼的事，就按实情调查。约束公吏，管制豪强奸徒。把安定当作首要事务。一定万分小心。”章宗说：“你在任半年或一年，把所知道的好坏情况都上报来。”行简到了保州，上书说：“这里划田给军队，是成定规的了。有人请求要田做别的用，也就听从他们的请求，至今没停止。各地的官田，实际是拿了百姓的。夺了那个的给这个，只会起争端。臣所管的地方，已经拨了深泽县的三百多顷地，又上告说水占的或沙碱地，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全听从他们的，什么时候才可安定下来？要匡正这事应当限定时间，不许再请求。并命令保州各级官吏，全部得听从。实际勘察河滩沙碱田，拨给军队用。”

泰和六年，张行简被召为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泰和七年，章宗以御札赐行简说：“朕念及镐郑二王，误干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历年所。朕非常悼念。欲追复他们以前的爵位，备礼改葬。卿可以仔细查阅唐贞观追赠隐巢，并前代故事，封闭以闻。此事已经施行，按理必须降诏。卿草诏文大意一就，封进。”张行简就详细把汉淮南厉王、长楚英王、唐隐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等旧事为奏，并进草诏，于是就施行了。张行简后又多次升迁为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尚书，还是像过去那样编修史书。

贞佑初年，张行简转为太子太傅，授银青荣禄大夫。上书论述议和的事。大致是这样：“东海郡侯曾经遣使约好议和，计较过细的缘故，拖延很久没有决定。现在都城危急，怎么可以拒绝。臣愿意更留圣虑，包荒含垢，以拯救生灵。挑选忠实善辩思维敏捷的一个人，去探明议和。要是能成功，可以避免祸患。”章宗又升他为翰林学士（是二品），很信任张行简。

贞佑三年七月，朝廷备防秋兵军械，拟定当时朝内朝外官员，从丁忧到做官的，都要缴纳弓箭。张行简上书说：“弓箭并非通常能有之物。那些清贫之家以及中下等官员，丁忧的和做官的，哪有所谓的军器。现在规定了期限，只能修补了破的坏的，以应上级的命令，这与仓促制造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在随州郡及猛克、谋克人户，选择那些好的买来。不足的话就命令各按官职交上所买的价钱。就不会扰

乱人心，事情就可以办好。”

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秋，行简在任上去世。章宗追赠他为金紫荣禄大夫，谥号文正。

张行简，端恣慎密，为人主所知。从一开始做翰林到太常礼部典贡，终身为缙绅而荣耀。和弟弟张行信（字信甫，大定28年进士）居住在一起数年，没有一点嫌隙。

史家赞曰：“张行简父子，世为礼官，世习礼学，其为礼也。行于家庭。讲于朝廷。施于邻国，无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学有专门，金诸儒臣，唯有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

张行简著述很多。有《敬甫文集》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褹裕》《丧葬》诸礼记录若干卷，自著《清台记》《皇华记》《戒严记》《为善记》《自公记》各一卷。

张行简另有著作《人伦大统赋》一书。据传是为太子太保时所撰，是术数书。此书先后收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民国初年，有梁吉生先生于北京手抄全函藏于家中。民国二十四年，太平桥张氏族人，向梁氏求得此书，将此书由张氏宗祠正始堂，手书石印三百部以传世。现巨峰镇车沟村张守来先生（笔者的伯父）存有一部。

《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在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校书提要中说：“行简世为礼官，于天文术数之学，皆所究心……其书专言相法，词义颇为明简。”薛延年为之做序做注。薛延年，字寿之。他在元皇庆二年（1313年）为《人伦大统赋》注释后的序言中说：“若精是术，必究是书。是书蔓延于世甚夥。苟不抉择而欲遍览，犹入海算沙，成功几日。善乎，金尚书张行简《人伦大统赋》与芟诸家之冗繁，撮百世之机要，提纲挈领，不下三千言，囊括相术殆尽。条目舒畅而有节，文辞华丽而中理，其心亦勤矣。”梁先生的抄本，是依据陆心源校订，吴兴陆氏十万卷楼光绪三年重雕版本。

如果论张行简在日照所做最为有影响的，莫过于他修建的“魁文书院”，俗称张状元书院。书院约建于金承安年间（1196—1200）。

（根据太平桥张氏族谱有关文字材料）



琅玕名士·竹林贤人·吝啬小人

——王戎的人生轨迹

含莹咀花



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中国的历史是颇奇怪的，越是大混乱的时期，文化成就越高，思想越繁荣。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三国争霸，五胡乱华，五代十六国，这个时期产生的思想却是超越时代的，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七贤之中，阮籍、嵇康是颇为大众熟知的，与剩下的几贤相比，王戎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倒不是因为他的高风亮节，文思才华，而恰是其人性中的吝啬。王戎的吝啬在当时是很有名的，而王戎的充满矛盾与争议的一生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王戎生活的时代背景

首先谈一下王戎生活的时代——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混乱时期，一个政治黑暗、统治残暴、民不聊生的时代。由于东汉末年接连几代都是娃娃皇帝，使得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权利争夺中统治一片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董卓叛乱，群雄并起，于是出现了魏、蜀、吴三国并立的局面，而王戎正是处在司马氏代魏的尴尬环境下。为了名正言顺地代替魏，司马氏用尽了手段，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激烈的政争，更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许多文人惨遭杀害。

然而很难想象，在那个国家分裂，政局动荡，看似思想禁锢的时代竟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时代。西晋是逼魏禅让而建立的，他

以名教立国，而整个晋朝，除了孝尚未泯灭外，名教的其他内容忠、义、礼等都名存实亡了，没有了一个统一的，实在的思想凝聚力，士人的觉醒也就成为一种集体的文化现象，他们从大一统的政权中脱离出来。从“愚忠”和“盲从”中挣脱出来，他们的视野回归自我，突出对个性价值的重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家族的兴衰，转向自身的利益，转向利禄地位的争夺而弃国家利益于不顾，于是，西晋名士便转向了任自然而纵欲。他们的生活信条，便是求潇洒风流以自适，依阿无心以自全，机心入士以为己。他们崇尚富贵奢靡，追求风流的美名，醉心于俊美秀丽的风姿，把高雅与庸俗融为一体。他们口谈玄虚，而实入世甚深，玄学和崇尚自然的旨趣，在西晋士人的生活里，以纵欲为己的方式实现。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王戎的思想很多样，表现也让人难以理解。

王戎的人生经历

王戎生活的时代司马氏已经基本完成了“禅让”的准备工作，很快江山易主，由魏入晋，正因为如此，虽列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却很少受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影响。关于王戎的出身，在房玄龄编纂的《晋书·王戎传》中是这样介绍的：“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竹林七贤之中，王戎的出身可谓最高的了。显赫的家族背景，使王戎很容易就接触到当时的“社会精英”，王戎15岁便与父亲的好友阮籍成为忘年之交，阮籍携其入竹林之游，与嵇康、刘伶、山涛、向秀、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其父病逝后，他袭父爵，成为西晋大臣，历任吏部黄门侍郎、河东太守、吏部尚书、官至尚书令，封安丰县侯。

说起来，王戎与另一位竹林名士——山涛的入仕的生活道路颇为相似，都是投靠司马氏仕途显赫的人物，共同成为竹林群体的分化标志。南朝颜延之赞颂竹林七贤自由精神的《五君咏》所忽略的二贤正包括王戎。王戎仕晋，官途通显，官任中书令、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直至司徒，与山涛同样位至三公。不过，王戎任官居事、应对处置显示出的品行境界实在不如山涛。

说起王戎的从政能力，可以说并不是很高明，《晋书·王戎传》评价“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然而，他的从政经历确实颇为精彩的，甚至可以说，王戎的一生，实在波谲多变的官场中摸爬滚打的一生，八王之乱中王戎的官场遭遇中，可见一斑。

太熙元年（290年）武帝驾崩，惠帝即位，把持朝政的杨骏即任命王戎为太子太傅。永平元年（291年）三月，杨骏一族被诛，贾后执政，王戎因得罪于东安公司马繇而转中书令，加光禄大夫，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

任吏部时，王戎创制了甲午制，凡选官先行试用，考其政绩后再予以征用或辞退。这个创举本身可以说是很好的，但是他非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被司隶傅咸弹劾说是：“今内外群官，居职末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但由于王戎与后族贾氏及郭氏是姻亲，并没有被免官，还在元康七年九月迁司徒。

永康元年（300年）四月，赵王司马伦起事，囚禁贾后并诛杀了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侍中贾谧等。裴頠是王戎的女婿，于是王戎受牵连遭免官。赵王伦于永宁元年（301年）正月篡皇帝位。三月，齐王司马冏在许昌起兵。赵王伦之子想任命王戎作为军司。博士王繇谏曰：“浚冲谲诈多端，安肯为少年用？”就是说王戎诡诈多变，不可能听你这个小孩子的命令，赵王之子于是作罢。

四月，齐王冏以晋惠帝为傀儡，拥立反正，并任命王戎为尚书令。太安元年（302年）五月迁司徒。十二月，河间王司马颙联合成都王司马颖等讨伐齐王冏。齐王冏向王戎讨问

对策。王戎建议齐王冏应该主动撤回自己的封国，这样才可以保住王位。齐王冏的谋臣葛旗怒斥道：“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群臣惊惧，王戎假装服食五十散药力发作，跌倒在厕所中，才免去一死。

齐王冏、长沙王司马乂败后，东海王司马越把持朝政。永安元年（304年）七月，东海王越奉惠帝北征成都王颖，王戎等百官随行。结果在荡阴大败。惠帝伤及面颊，身中三箭，而侍中嵇绍（嵇康的儿子）为救惠帝身亡。王戎随惠帝及群臣被成都王颖掳至邕。东海王越逃回封国东海。八月，成都王颖在于安北将军王浚交战中大败，王戎又随惠帝被成都王颖挟往洛阳。攻入洛阳的河间王颙部将张方劫持惠帝及成都王颖西入长安。王戎出奔郑县。此后终日以宴饮为乐。永兴二年（305年），王戎薨于郑县，年七十二，谥曰元。

作为竹林名士的王戎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是以受到阮籍赏识而成名的。阮籍曾给与王戎很高的评价，说他“清尚”。《晋书·王戎传》中载：“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后出，谓浑曰：‘潜冲清尚，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能得到阮籍这样高的评价，可见，幼时的王戎的确异于常人。所谓“清尚”，也就是《晋书》中所说的“清明晓悟”说他神情清朗，或者就其明亮的眼神而言的。《晋书·王戎传》中说他“神采秀彻，视日不眩”，《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眼睛炯炯有神，所以显得神情清朗，而且聪明有悟性。

史书中关于他聪明的记载也不少，著名的有两则。《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李，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又载：魏明帝于玄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乘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了房玄龄编纂的《晋书·王戎传》中。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识和胆量，难怪阮籍对他欣赏有加。

王戎还是一个重感情而不拘于俗礼的人，他性至孝，居母丧期间虽不备礼，却哀毁骨立，刘毅成他是“死孝”，裴楷也说：“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潜冲不免灭性之讥。”这一点与阮籍是一样的。《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阮籍的做法是真性情的表现，也是对所谓礼法的蔑视，而与他为忘年之交的王戎的所为，不能不说是或多或少的受他的影响。

王戎还曾因拒收亲故的馈赠而名显当时。《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世说新语·雅量》：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笏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晋书·王戎传》中说他“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武帝为王戎开脱道：“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

和嵇康、阮籍一起“预竹林之游”的王戎，不可避免地受到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影响。居母丧期间，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就是一个例子。在《世说新语》中，还有不少关于王戎任自然的记载：陈留阮咸、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七人年龄相差20余岁，却可以齐聚竹林，肆意酣畅，美女沽酒，戎与阮籍却常从妇饮酒；早晨去女儿家，不经通报，直进卧室，宾客相对而坐，一点都不尴尬；三人在坐两人喝酒，三人言谈仍无异；妇人卿婿虽不备礼，但亲之爱之，仍旧听之。王戎的这些行为于礼法所不容，但那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率性自然的表现，既如此，那么似乎也可以说，王戎的简吝却不受贿赂，不贪外财是出于自然的表现，是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信仰使然。

王戎也是颇具人伦见识的，且任率放达。王戎“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说阮文业“清伦有见识”，称其族弟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侯戎，辄脱疾不见，敦后果为逆乱。而且王戎还凭借其识人之能使家族避过一场灾难。据晋书载：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吏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虽然看似王戎没有什么气节可言，为了活命委曲求全，但是身处乱世，能凭其识人只能得以保全性命，足见其不同于常人之识。

吝啬小人王戎

王戎即是一个才智超群，性情真旷的雅士，他的至情至孝在以孝治国的晋朝是世人的楷模，他的放任不拘，潇洒自然是别人眼中的名士，然而令人失望的，则是他后来的行为完全变成了一个为财是念、贪财恋利的庸俗之徒。

王戎的个人生活极少有如同时期的石崇那般铺张豪奢，纵欲享乐的记载，他的生活是相当怪吝的，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晋书·王戎传》中说：“戎性至俭吝，不自奉养。”又引《晋诸公赞》曰：“戎性简要，不治仪望，自遇甚薄。”原来，王戎并不只是故意苛刻子女，他对自己也是一样的怪吝。问题在于，如果家境没落，这种行为可称为勤俭持家安贫乐道，或是朴素俭守淡泊自持，偏偏王戎其实高官厚禄家财万贯。



竹林七贤《高逸图》残卷，右一为山涛、右二为王戎、右三为刘伶、右四为阮籍（唐·孙位）

《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坐遣吏修园宅，应免官，昭以赎论。”为了省几个园宅修理费就违法乱纪，未免有点太要财不要命了吧。另外，王戎还因南郡太守刘肇行贿事件为司隶校尉刘毅弹劾而声名受损，然而王戎从此为清议所鄙。不收就对了，干嘛“厚报其书”，与拒收馈赠时的王戎相比，此时的他未免太差劲了。

此后随着世禄上升，王戎便越来越视财如命了。徐广《晋纪》中载：“王戎殖财货，家僮数百万，计算金帛有如不足，以此获讥于时。”房玄龄《晋书·王戎传》：“性好兴利，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积时聚钱，不知纪及，每自执牙筹，书夜算计，恒若不足。”敛钱聚财，可见一斑。更让人意想不通的是，石崇、王恺敛钱聚财是为了挥霍享乐，比财斗富，而王戎呢？《晋书·王戎传》载：子万，有美名，少而肥大，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让自己的亲儿子吃糠，不知王戎怎么可以想得到和做得出，不知儿子死后他痛哭说“情之所中，正是我辈”时是怎么想的。另外，《世说新语·俭吝》共有九则，其中关于王戎俭吝的记载就有四则：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司徒王戎既富且贵，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

既富且贵，侄子结婚时作为礼物送出的单衣都可以再要回来，竹林名士，位至三公的王戎是不是真的为了钱财弃颜面于不顾了，自己的女儿借点钱，没有及时还就给人家脸色看，还了钱就释然，简直就是一个“变色龙”嘛？至于钻核卖李，恐怕更是王戎的首吧。幼年曾因“道旁苦李”而名显当时，最后又因“钻核卖李”而获讥于世，可谓“成也李树，败也李树”，这对王戎这也许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吧。

可是仔细研究一下王戎的行为，又很奇怪，王戎的敛钱聚财，贪婪吝啬似乎是颇有原则的，向从子要回单衣，向女儿索债，虽有点不通情理，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东西是自己的，不想给了就要回来；钱是自己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至于钻核卖李，月下数钱这似乎就更无所谓了，钱多了自然要数。月下数怎么了，天天数又与别人何干，这都是自己的。

而对于外财王戎相当谨慎，关于王戎贪污受贿、霸田占地、搜刮百姓的事，史书并没有记载，王戎还曾因拒收馈赠数百万而受到好评。这方面唯一的一个污点就是南郡太守刘肇行贿事件，虽受颇多非议，但事实证明王戎并没有接受，只不过写了一封感谢信而已，别人送了东西不接受却感谢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对受贿这件事本身就有问题了，这些王戎不可能不知道，但王戎还是做了，王戎的这些行为虽不值得表扬，但比起那些贪污受贿、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王戎还是要可爱多了。

从一个才智超群，性情真旷的雅士到一个为清流鄙议，世人所讥的吝啬小人，缘何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

东晋孙盛在《晋阳秋》中给了一个解释：“戎多殖财货，常若不足，或谓，戎故此以自晦也”。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认为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孙盛、戴逵认为王戎的俭吝敛财时自污，以求乱世中自保。也难怪，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混乱时期，战事连绵，政治多变，或许与王戎生活相去不远的孙盛、戴逵能够体会王戎那种在乱世中为求自保而不得已的心理，同样作为名士，或许他们也能体会高洁之士动辄被杀而不得已自污以自保的心理吧。

近代国学大师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认为王戎的怪吝是出于天性。“观诸书及世说所言，戎之鄙吝，盖出于天性。戴逵之言，名士相为叹息，阿私所好，非公论也。”不知道 余老 先生从何推断出王戎的怪吝是出于天性，我却并不认为如此。



首先，王戎出身高门，琅琊王氏是西晋的名门大户，且戎祖雄父浑皆官至刺史，可以说王戎是纯正的贵族血统，怪吝的遗传性不大。再者，王戎年轻的时候是颇具名士风范的，他的怪吝主要表现在后期，总不能说他是先天具备，后天发作吧。

另外，从王戎结交的朋友来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王戎怪吝出于天性，单是阮籍这一关就过不了，阮籍的交友是十分苛刻的，只会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往。史载：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曾以白眼对待过于自己志向不同的嵇喜，而以青眼对待和自己志趣相同的嵇喜的弟弟嵇康。阮籍与王戎的父亲是好朋友，王戎也是阮籍一手提携起来的，且在其引荐下使王戎“预竹林之游”，名显于时。如果王戎天性怪吝，试问，阮籍怎么会和他结交呢？

可见王戎并不是天生的吝啬鬼，而仔细分析《世说新语》不难发现，书中所记都是家中小事，月夜秉烛散筹数钱，向从子索要单衣，女儿借债急索，这都是家中琐事，外人无从得知，除非他自己说出来，总不至于他的侄子、女儿到处宣扬吧，这样看来，倒似乎真像孙盛、戴逵所言“晦默于危乱”力求自污以避祸了。

关于王戎的俭吝，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从整个士人群体的角度也做了解释，他指出王戎的吝啬是当时士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如王戎者还有和峤、庾愷等，而且无论王戎等的爱财聚敛而守财吝啬，还是如王恺、石崇般的爱财聚敛而挥霍纵欲，都毫不掩饰的表现一种坦然心态，这是士人利己主义的一个侧面，是利欲高涨的社会风气的产物。“嵇康被杀，向秀失图”更是十分生动的说明了用个人欲望的自我节制来使自我回归一种宁静、自然的人生，实际上是无法做到。

嵇康、阮籍的道路全都走不通，这就给了士人社会一个明白无误的讯息：自我节制的欲望，既行不通，也无意义。现实本身已经给了这个自东汉末季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个性解放思潮以明白无误的价值导向，消除尽老庄的超然物外、忘情物我的思想痕迹，把它引向唯我是念、个人欲望不受节制的追求。晋以后，找不到嵇康式的人物，虽仍有隐逸之士，那只是避世，企图以节欲来入世。而不受礼法约束生活的名士，则再也找不到了，因为整个社会思潮已经转变为任自然，已经发展到情欲、物欲恶性膨胀的程度。

从这一点上，我们便可以理解西晋名士何以嗜财如命而坦然无忌，何以把斗富作为一种光荣，何以吝啬到不尽人情的地步却可以自然地 and 潇洒风流统一到一个人身上。这样看来，王戎的吝啬似乎就不难理解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使然。

到了晚年，王戎的行为越来越极端，为人所不齿，他自己也产生了困惑。《世说新语·伤逝》中载：“王浚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此时的王戎变的连自己都不认识了，“邈若山河”，何曾不是一种自嘲呢！谢安的侄子谢朗问谢安这件事的真伪时，谢安曾认为这件事是假的，不过是谣传而已，但既然有记载，也许并非空穴来风的，想当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名士风流士人仰慕，看现在，身居高位，权倾朝野，别人表面奉承，却虎视眈眈，动辄全家性命不保，而且自己吝啬小气已经沦为世人笑柄，物是人非，由不得他不感慨。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存于史册的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千秋功过后人评说，其实，后人又怎能说得清呢？王戎，竹林名士，怪吝小人，官场老手，性情中人，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王戎，或许只有他自己清楚，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而我们，只有猜测。

中共一一五师教二旅 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奖章

高昂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成立于1940年10月，由独立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苏鲁支队编成。下辖四团、五团、六团。旅长曾国华，旅政治委员符竹庭，副旅长张仁初、参谋长何以祥，政治部主任王麓水。教二旅成立不久，因鲁南山区贫穷困苦、地区狭小、财粮困难，即决定留下五团坚持鲁南地区，曾国华率四、六团转向滨海地区。教导第二旅成立后先后参加了青口、甲子山、沿海反蚕食、郯城等著名的战役战斗，是滨海、鲁南的抗战主力。1943年2月28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教导第二旅与滨海军区合并，成立了滨海军区，教导第二旅番号撤销。

“中共一一五师教二旅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奖章”，圆形，直径3.2厘米，正面中间是“奖”字，外面是“中共一一五师教二旅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奖章”19个铭文环绕，背面铸有“1941.5”数字符号，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沂蒙山区铁血抗战的见证，也是珍贵的红色文物。

原八路军侦察员王儒秀在其回忆录中《负有特殊使命的采购员》中详细介绍了这枚纪念章制作的过程。

1941年农历五月，八路军一一五师驻在临沭蛟龙湾，筹备“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教二旅的领导想借这次部队集中的机会，召开一次党代会。为了鼓励和表彰代表，旅党组织研究决定定做一批银质纪念章。其时正处在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根据地内条件受限，只有到敌占区去做。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锄奸科长刘伟先后动员王儒秀去完成这项任务。王儒秀欣然受命，领了300块银元，骑着自行车赶到了日寇盘踞的新浦，找到三泰客栈老板李复生，请他联系银匠赶做纪念章300枚，限期十天交货。带回纪念章，需要穿过日寇的哨卡，为了安全起见，王儒秀花五块银元找到一个挑大粪的，将纪念章包好放在粪桶底下，装满大粪混出了戒备森严的新浦西跳口。

当日下午，王儒秀赶回蛟龙湾教二旅旅部，首长们热情地接待了他，打开包裹一看纪念章，不禁吃惊不小，纪念章漏掉了一个“代”字，刘科长问：“老王这是怎么回事？”王儒秀一看也愣了，后经过对底稿才明白，原是缮写的同志不细心抄漏了一个“代”字。

王儒秀二话没说，再次请命，将纪念章装入袋子束在身上，罩上外衣又返回了新浦，这次他现场监督制作，一枚枚检查，只用四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出哨卡时，王儒秀手持花30块银元买来的良民证，头戴洋草帽，鼻尖上架着副墨镜，大摇大摆闯过了哨卡。首长们对他的出色表现给予了褒奖，让他出席了教二旅第一次党代会，会上还奖给他金鼠牌手枪一支。





1968：临沂城亲历欢迎济南知青

王宗富

1968年秋天，我在临沂参加了为期4天的全区宣传工作会议，记得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在地区第一招待所吃过午饭后，主持会议的军代表便告诉我们，下午2时，我们要全体集合，到临沂城区北侧一条主要道路的两边，欢迎从济南市来临沂地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参加会议的莒南县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这些知识青年不是在临沂县插队，而是要到莒南县的厉家寨去，只是途经临沂。厉家寨那时知名度很高，“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毛主席的批示肯定了厉家寨战胜穷山恶水、建设山区、发展山区的成功经验，厉家寨从而成为沂蒙大地的一面亮丽的旗帜。因而知识青年当时能到厉家寨去插队落户，那是荣耀，那是骄傲。

3时左右，6辆绿色的敞棚大卡车从西关方向缓缓驶来，5辆车上载着学生，1辆车上载着行李。顿时，锣鼓齐鸣，欢迎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有的路段，还有中小学校组织的秧歌队，绸带飘飞，载歌载舞。十





字路口处，那时还没有红绿灯，但其他车辆一律主动停了下来，礼让这些来自泉城的知青。知青们此时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振臂高呼：“向临沂地区人民学习，向临沂地区人民致敬！”“向临沂革命造反派学习，向临沂革命造反派致敬！”他们胸前都戴着大红花，身着用黄色布料仿解放军军装做的衣服，而脸上荡漾着动人的喜悦。那时从济南到临沂的公路全是沙土路，他们一路颠簸，身上罩满了尘土，但他们朝气蓬勃，丝毫没有倦意，有的车上在呼口号，有的车上在唱革命歌曲，有的车上在向路旁的人群挥手致意……车开得很慢，有的路段还停上那么几分钟，因为有的单位的人往车上递装在袋子里的热馒头，有的往车上扔五颜六色的糖块，有的往车上送煮熟的鸡蛋……知青们显然受了感动，有的哭了，有的直擦眼睛，有的举双手表示决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沂蒙大地！”“热爱临沂，热爱第二故乡！”有几位头戴军帽，扎着两个短辫的姑娘，还站在车上，手拉手，唱起了《沂蒙山区好地方》《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此时车上车下已汇成激情的海洋，欢腾的海洋，沂蒙人民用淳朴的真挚的感情，欢迎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

4时左右，车终于向东驶出了临沂城，驶上了沂河大桥。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背负着自己的理想，要把自己融入沂蒙大地，融入莒南山水，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

以后，因为行政区划，我们那个地方从临沭县划入江苏县东海县，我也同时调入东海县工作，远离了临沂。2014年春天，为编写《东海县志》人物篇，我有幸重返沂蒙山区，到莒南县城去访问一位曾在东海工作过的老领导。办完事之后，他陪我专程到我从未去过但又一直十分向往的厉家寨去了一趟。

厉家寨早就没有了知青，但当年知青们在厉家寨的印迹却处处可见，岁月的风尘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他们当年的风采。

听一位原厉家寨乡的老领导谈，1968年后又有好几批泉城毕业的学生来这儿插队。他们把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山区。老领导还说，那时厉家寨的知青，是沂蒙山区的亮点，是莒南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力军，是莒南大地上最美的画图！

从1968年至今，已经46年了，如风如雨的岁月冲刷掉了我的好多记忆，但在临沂城欢迎济南知青赴厉家寨插队的一幕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头。



俺村的地名轶事

邵明武

俺村叫管泉村，原名管泉庄，属沂南县大庄镇，由邵家、张家、卢家、靳家4个自然村组成。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元帅曾经率领部队路过俺村。俺村的地名内涵丰富，从俺村的地名，可以推知全国农村的众多小地名的由来。

上个世纪70年代前，俺村4个自然村有的地方连在一起，有的地方互不相连。如邵家管泉和张家管泉连为一体，和卢家管泉隔着几十米的空间地带。邵家、张家和卢家3个庄相距较近，合称大管泉。靳家管泉位于大管泉以南300多米的地方，人口较少，故名小管泉。上世纪60年代初，4个管泉设为4个大队，因为小管泉人口太少，便将张家管泉一分为二，一部分设为张家管泉大队，另一部分和小管泉合并设立靳家管泉大队。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后，“大队”改为“村”，管泉庄随之改称管泉村。

根据4个自然村的所在位置，相互之间各有称呼：“小管泉”一名一直沿用；因为张家管泉和划归靳家管泉的农户所在的位置在南，邵家管泉在北，所以，前者称邵家管泉为“后庄”，邵家管泉称前者为“前庄”。卢家管泉地处丘陵，邵家管泉地处丘陵以东地势平展的地方，所以，邵家管泉称卢家管泉为“西岭”或“上庄”，卢家管泉则称邵家管泉为“下庄”。如今，邵家管泉的



汤河河岸及西边的西长万地

不少村民迁到岭上居住，“西岭”“上庄”“下庄”等村名便自然弃用了，互相之间直呼“邵家”“卢家”；但是，“前庄”“后庄”两个名称仍在使用。

下面重点谈谈我们邵家管泉村的地名。

我们邵家管泉村有800多口人，1400亩耕地。村内因为有前、后两条沟，所以有前沟崖、后沟崖（沟崖上）等地名。从后沟崖又派生出沟南崖、沟北崖。“沟南崖”“沟北崖”的狭义是后沟的南岸和北岸。如说“谁家住在沟南崖”，是说住在后沟的南岸。从广义上说，“沟南崖”“沟北崖”分别指全村的南半部和北半部。如说“沟南崖三个队，沟北崖三个队”，指的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全村有6个生产队，以后沟为界，南部、北部各3个生产队。前沟崖西端有几眼泉子，附近称为泉子崖。泉子崖以南建有庙宇，庙宇前面称庙子前，后面叫庙子后。村中的两条东西大街，分别叫前街、后街。后街地处后沟的北岸。村内胡同较多。村子正中，后沟以南、前街以北的南北胡同称为“深胡同”，东边与其垂直且有一个拐弯儿的东西胡同称为“东胡同”，深胡同西边与之平行的胡同称为“西胡同”，前街以南，与深胡同在一条直线上的胡同称为“筒子胡同”。村的四周，分别称为家东、家西、家前、家后；村内四角，分别被称为东南角子、西南角子、东北角子、西北角子。村东的住户，向东能看见宽广的平原，被称为“瞭哨子”。有户人家住在村西南部，过去以种菜卖菜为生，他家所在的位置被称为“西菜园”。有几户生活较为殷实的人家，为了防止盗贼和土匪，联合在胡同以外安装了哨门，人们便称这几家为“哨门里”。后来有些村民在村北建房居住，形成的居民区被戏称为“新村”。又过了20多年，很多村民迁到村西北的丘陵上居住，人们便将丘陵上的居民区称为“岭上”。村西饮水井附近，称为“井崖上”。村中有几盘碾，其周围都被称为“碾场子”。

我村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和我国的地形相似，按高度变化，自西向东可分为三个阶梯：丘陵、半坡、平原。丘陵在村西北，统称“西北岭”，简称“岭上”。到丘陵劳动，称为“上岭干活”。半坡为高度介于丘陵和平原之间的土地。平原在村东、村北和村东北，统称“东湖”，简称“湖里”。到平原劳动，称为“下湖干活”。

我们村民风淳朴，村民勤劳、善良，过去多以务农为业，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块块田地，任凭村民耕耘、播种、管理、收获。吃穿住用之物，多取之于土地。有些虽并非出于自产，也靠变卖农产品去购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村民一是因为热爱家园，二是为了便于寻找地块下地干活，便给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取了很多地名。有些地名经久不变，有些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名。

我村只有1400亩耕地，却有好几十个地名。这些地名各有由来：

丘陵上的地名有老林后、马趟子、大荒、官地、连汪崖、小柳树、老牛坟子、大桥、瓜茬、上骑路子、下骑路子、薄阜汪子、长长阜、王家墩子、王家墩子东、王家墩子西、白菜岭子、张家林、水沟地、大井（旧）、大井（新）、北岭、北涝泉、沟圈、鳖盖子（如今不属邵家管泉村，属杨家坡村）、官庄下、石塘、红泥头、水家泉子、小菜园儿、官路等。老林后因位于邵氏家族的祖茔——老林的北边而得名。马趟子，地名由来已久。明清两朝以迄民国，沂水县南乡有两家大户，分别是高家店子高家、刘家店子刘家。清朝早中期，时间约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邵家管泉邵家达到鼎盛时期，人称“出了沂水往南看，高、刘两大家不赶管泉邵家。”当时，邵家在地亩册子上，需向朝廷交税的土地就有48顷，加上黑地则更多。因为富有，所以，邵家多养马，或用于农业生产，或用于游玩散心，或用于



水家泉子

赶集上店，或用于到沂水县城办事。养的马多，早晨需要遛马，便在村西北的岭上腾出一片土地，专门用于遛马，人们骑着马或走或跑，好不热闹。从此，这个场合便被称为“马趟子”。瓜茬因过去曾经栽培过瓜而得名。我们村到岭上去的路是东南—西北走向。来到岭上，因为地块为东西方向，地块被路面分为东西两段，地被人格化，这一片土地便被称为“骑路子”，其中西北部地势高的地块称为“上骑路子”，东南部地势低的地块称为“下骑路子”。我们村地跨沂河流域和沭河流域，白菜岭子的积水西流，经东沂庄地面，注入玉交沟，而后流入沂河。除白菜岭子以外，其他地块的积水全部流入沭河的支流——汤河。沟圈，因四周被水沟所包围，故名。鳖盖子，因其地形像一个鳖盖，故名。官庄下：相传古时候，在今杨家坡村和管泉村之间，曾经有一个村子，名曰“官庄”，传说该村村民犯了王法，被户灭九族。后来，该村的土地归我村所有，我村的人便将北涝泉东面的地块称为“官庄下”。水家泉子在村子北边，该泉水是矿泉水，只是泉水太少。此泉有很多叫法，人们通常叫“水家泉子”，另有说叫“史家泉子”的，也有说叫“石家泉子”的。3种叫法都认为此泉以姓氏命名。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村根本没有水、史、石姓人家，以姓氏命名不符合实际。据我分析，水、史、石谐音，由此可知，3种叫法出自同一来源，应该说是因误读讹传而出现3种叫法。实际上，这个泉子位于一块大岩石的端头之上。大岩石的端头，我们可以称之为“石角”。在石角上的泉子，当然应该叫“石角泉子”了。沂南方言中，“角”与“家”读音相同，如“牛角”读如“牛家”，“羊角”读如“羊家”，方言读音为我的观点助了一臂之力。

半坡上的地名有大路东、大路西、小桥子、大堑、大坟子、大杨树等。“堑”是山东方言，意为在水中用土筑起的挡水的土堤。大堑修得较高，东西向，能将西面、北面的积水拦截在大堑北边的水沟，让其东流，注入汤河。

平原上的地名有水沟崖、石界地、三角荒、蛙（沂南方言读wa í）子汪、小坊子、烟梨汪子、东长万地、西长万地、南长万地、北长万地、稻汪子、薛家地、卢家地、彭家地、土汪崖、十二亩地、十八亩地（如今上述两块地不属邵家管泉，划归卢家管泉）、窑上、窑间、河沟子崖、新河沿、盐路子、南盐路子（如今不属邵家管泉，属张家管泉和靳家管泉）等。沂南方言将青蛙说成“蛙子”，可想而知，“蛙子汪”这块地过去肯定是一片池塘。“烟梨”，方言词，草名，地名“烟梨汪子”由草名而得。“万”，方言词，意为“段；块”。大家都不知道其正确写法，

只得借用同音字“万”来代替。所谓“长万地”，是指长度很大的地块。薛家地、卢家地、彭家地等地块，说明过去曾是外姓人家的地。十二亩地、十八亩地之类的地名，由面积而得，真是简单明了。窑上、窑间这两个地名，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中期，我们村在村东建了一座窑厂，烧制青砖、脊瓦。村民称窑厂为“窑”。

“文革”开始后，窑厂停产。后来，窑屋倒塌，此地又变成耕地，人们便将原来窑厂的地块称为“窑上”，将窑厂附近的地块称为“窑间”。这里的“间”，是沂南方言词，意为“附近；周围”。至于“河沟子崖”“新河沿”两个地名，只要阅读下文有关河流的一段文字，就可知道其由来。从“盐路子”“南盐路子”字面来看，便可知是过去人们到日照、赣榆等地推盐的路。附近的地块，与路同名。

桥有五孔桥、龟腰子桥、大桥等。其中的大桥，是指1965年开挖从跋山水库而来的引水渠道时，在渠道和骑路子交会处修建的一座桥，因其规模大于我村的其他桥梁，故称大桥。

河流有河沟子、汤河、老河沟子、新河沟子、前沟、后沟等名称。过去，汤河俗称河沟子。1977年，在地区、县两级水利部门的指导下，河阳公社党委组织54个大队的社员，万人上阵，开发杨家坡、李家坡、管泉、西太阳、坊南庄几个村之间的平原，将汤河裁弯取直。此后，原汤河被称为老河沟子，新开挖的河道被称为汤河，也有称“新河沟子”的。

池塘有红泥汪、东南大汪、后土汪、后土汪子、老婆脚汪、鬼汪子、三角汪、大井（旧）、大井（新）、西池子、石塘等。池塘多以“汪”取名。人工开挖的以“井”命名。真正以“池”“塘”命名的，只有西池子、石塘。东南大汪原名莲花汪。民谣说：“先有莲花汪，后有管泉庄。”足见这个汪的历史悠久。土汪因取土而成，故名。古代，妇女因裹脚导致双脚畸形而且极小，老婆脚汪便因其面积小而得名。村民为了灌溉，在上骑路子西北挖了一个池塘，称为“大井”，其周边的地块也被称为“大井”。后来，在大桥以北、杨家坡至巩头公路西侧，又开挖了一个大池塘，亦名“大井”。为了便于区分，分别冠以“新”“旧”二字，称为老大井、新大井。西池子位于村西，是后沟上的一个水潭。其西岸和南岸沟崖陡峭，西南方向的后沟狭窄曲折，水道有高有低，流水步步跌落，像是一个个微型瀑布，然后流入西池子。在儿童时期的我看来，西池子一带像是微缩的集峡谷、瀑布、深潭、悬崖峭壁于一体的景点，是我村最好的景致，因此，当时每当雨后水流变小时我最喜欢在此玩耍。石塘，是村民为了取石材盖房子而开挖的坑，雨后积水，成为池塘，取名“石塘”。

诸位，在你阅读了本文之后，或许会联想到你村的小地名，从而勾起对家乡深深的怀念。



荆山与荆山寺

陈永杰

荆山，位于沂源县南麻镇西五里的傅家庄西北。位于鲁山之阳、沂河之滨的荆山，巨石突兀，峭壁高耸，林深树茂，甘泉流溢，素有沂源花果山之称。这里不但环境优美，而且文物古迹众多。

位于荆山之南坳里的荆山寺，三面环山，寺因山得名，山依寺而增望。荆山寺曾是一座蜚声四方的千年古刹。上饶进士、沂水知县游荆山寺后，曾作《游荆山寺》一诗，描绘荆山寺景色之美及佛事之盛：“闻说荆山胜，荆山此日游。灵泉通地脉，怪石出林头。老衲和云卧，昙花入液浮。谁能解心相，我亦学藏修。”据清康熙十一年修《沂水县志》“舆地山川”载：“（沂水县西北）一百五十里为荆山，上有寺，古浮图、梵宇甚状，亦胜地也。”卷二，“建置寺观”记载：“荆山寺，县西北百七十里，敕建于元，梵宇之盛甲一方，今皆废圯，有敕建碑二，苔纹磨灭难辨。八棱碑一，尚极光润。砖塔十二层，上有铭记，今将倾圯，无敢攀跻者。东麓为老师庵，当年之尼姑院也，今惟茅庵尚在。”清道光《沂水县志》卷之一“舆地山川”记：“县西北百七十里为荆山，山有元代梵宇遗址，螳螂水经其东麓。”

荆山寺原名“无相寺”，金大定三年（1163年）金主又颁诏敕建，改称“普安禅院”。据查考，荆山寺建庙历史悠久，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广于唐、宋，极盛于元、明，延于清，多次重修扩建，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天王殿、千佛阁、八棱碑、十二层砖塔等。

据有人考察了解，荆山寺庙原址即现在果园场部，庙门在荆山银杏树的



东边，大门是走廊式三间，两边各塑“四大天王”像，也叫天王殿，意即“四大天王镇守山门”。进内五大间横列为千佛殿，继而是观音殿，再进内是大雄宝殿，中间为释迦牟尼像，十八罗汉分列两旁，本院两侧是东西厢房，作仓储用，大雄宝殿的后面有十多间僧舍禅房。庙门西侧有古银杏，再西为荆泉溪流，过溪之西山梁为墓地，原有经幢墓塔十多座；庙门南有敕建碑、八棱碑，大小碑碣林立两侧。庙门东侧有塔一座，整个庙舍布局，错落有序，以山势而叠增，恰当得体，所有建筑石刻雕凿细致精湛，雕梁画栋，彩焕斗拱，高脊矗立，飞檐凌空，其规模宏伟壮观。

该寺庙地处沂州西北，蜚声四方，旧时鲁中东南部的僧、道、尼俗赴泰岱进香者莫于此驻足，或挂禅或奉香，因而四时香火鼎盛，极盛时有庙地五十多亩，分佃于傅家庄、西台、栗行等四邻村民，有僧人百余。至清朝中叶，荆山寺渐衰。民国时，古建筑因年久失修，大部圯毁。1950年前后，所剩僧人相继还俗，佛事活动泯灭。1952年辟为国营荆山园艺场，古建筑全部拆除。现在荆山寺面目全非，所留胜迹不多，今仅存金主完颜雍敕建碑、八棱碑和古银杏树。

关于二块“敕建碑”，其中一碑曾立于银杏树南边，或毁于“文革”期间，另一碑尚存，碑文有：“荆山寺自大隋十年立，名为无相寺，因国朝敏宗生太子，为庆贺，天下普度僧尼，大建寺庙，故重修，改名普安禅院……荆山有玉者未识也，其塔似岫，号曰荆岫，谓有泉流呼为荆溪，此三名也；庙院八面，众峰围绕，由中一掌平田，终日迎阳，春华早发，秋深晚寒，冬生暖气，夏有凉风；东望临朐，南观沂水，西去新泰莱芜，北有淄川，缙素到时无不忻羨，故梵宇盛甲一方。”该碑建于至元大定九年，即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

荆山三宝之岫，址在银杏树正东边的岭下，塔30多米，为密檐式砖木结构，内有木制旋梯，于1950年被拆，与杀伐的部分柏树建了小礼堂（在南麻老街西头路北），但塔基地宫尚保留地下。据记载，山东的古塔多建于宋元，少数建于隋唐，从塔的塔式及旧《沂水县志》等文献印证，很可能建于大定年间。据了解，在鲁中山区，古青沂之地寺观中建塔者不多，由此足见昔日梵宇之盛。

据清道光《沂水县志》“舆地山川”载：“荆山泉，县百七十里，出荆山寺西南。”泉出自古银杏以西的石拱桥底（旧时无桥），由石隙间喷涌如注，旱涝不改，近年已改建修葺，引为潜流。泉是看不见了，但靠近时仍可听见暗池内泉水淙淙。泉池水通过暗渠流入不远的一处长方形井中，水泵自此抽水传输，井中水即为荆泉泉水，晶莹清澈。

八棱碑原址未动，后因改土造田，埋于银杏树南边的地堰中，1982年曾雇人破堰发掘，至碑身两米仍未见底，只得作罢，惟见上部碑文：“重修佛阁施财姓名，所建白衣观音阁为泰山老母行宫……”，立碑为：“大明万历七年（1579）二月初四日吉立。”今已全碑起出，于原址重立，成为景观之一。

古银杏树，胸径1.69米，胸围4米，高26米，其中干高7米，树冠覆盖800多平方米，按一般习惯建庙植树，估计该树已达1400多年，如今依然生机盎然。尤为奇者，在树的主柯间生有藤科植物一株，粗如鸡卵，攀援而上，枝叶繁茂，为一时奇观。

古银杏树西为荆泉溪流，溪上建有石拱桥，远山近岫环抱，古树、溪流、小桥、古寺映衬，景致绝佳。2002年被辟为公园，列入县城生态旅游区。2004年重建大雄宝殿、天王殿、千佛阁等。

老师庵在寺东，越一岭，里许，地处幽谷，可谓“曲径通幽处，禅堂花木深”，是一处参禅悟道的绝佳仙境，后来仅剩破败的茅庵三间，倒坐观音庙一间，庵内西侧有残碑一幢，碑文有：“主持道士李全寿募次重修记文”，明朝时立。如今附近重修泰山奶奶庙一座，殿内敬尊泰山奶奶。据重修碑文记载，泰山奶奶庙始建于隋，盛于唐宋，到明清时期，原址占地亩余，有大殿三间及院落。据原庙碑文记载，奶奶庙原名泰山圣母行宫，女



神名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主宰孕育万物，受玉帝之命，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遍察人间善恶，赋予护国佑民之职责，而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山岳之神。泰山奶奶庙背依卧龙山，俯瞰田庄水库，为荆山寺古建筑群名胜之一。

荆山南侧悬崖上的摩崖造像，也是荆山有名的文化遗存。

自银杏树往北，穿过一条两边翠松高耸的林荫道，即到荆山公墓，经过公墓，沿杂草丛生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山，大约二十分钟，即到罗汉崖摩崖处。如果无当地人指点，是无法找到的。

据有关资料介绍，造像共有十八尊，皆浅浮雕，分为两组。第一组十六尊，雕刻在峭壁下端的长方形石龛之中，石龛长约6米，高约0.7米，进深0.4米。十六尊造像一字并排，皆坐式，像高0.4米左右，身披通肩袈裟，内著僧祇支，姿势不同，形态各异，有的双手叠放于腹前闭目诵经，有的手持各种器物交头接耳，也有的东张西望。由于日晒雨淋及人为的损坏，面部残损严重，几乎无法辨清。

石龛上方约1.5米处的崖壁上十分规则地横排着十六个长方形石孔，石孔上方有一条波浪形石槽，似为安插木椽和覆瓦之用，说明造像前曾有过类似殿堂的建筑物，以保护造像不受雨水冲刷。石龛右上角有一长方形凹面，平整光滑，上面应有题记之类，因风雨剥蚀，字迹已不可辨。据资料记载，由此往西行百米之外另有两尊造像，造型与十六尊相同。从此处造像艺术特点及荆山寺敕建碑推断，当为隋唐时代的作品，现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十八尊造像被当地人附会为十八罗汉。传说十八罗汉原来是住在一起的，有一天一时兴起，便去附近的鲁村赶集，赊吃了店铺的烧饼，却将欠款记在荆山脚下普安寺和尚的账上。年底店主讨债，普安寺方丈查遍全寺和尚皆无此事。方丈疑罗汉所为，便率众僧登山，果见罗汉像前的荆丛中有烧饼残渣，众僧恼怒，责打罗汉，其中有两尊罗汉见势不妙仓皇西逃，至今未敢回到原处。

沿悬崖中间的小径往西走了不止百米，未见另两尊造像，或许是自己一时粗心没看见，就往回找。到了第一组雕像处，仍未发现，不甘心，折身再次往西找，这次找得更仔细，走得也更远，仍然未找到。在返回途中，碰到五六个游客，其中一老者告诉我，十六尊雕像两端的两个，各怀抱一个小罗汉，加起来，恰为十八尊。没想到十八尊罗汉竟有两个版本。

百战将门

——五代名将符存审、符彦卿父子

高雷



符存审画像

“国步将泰，必有忠杰。家声将作，必有孝节，烈烈符氏，世生才哲。（《符璘碑》）”琅琊符氏以忠义起家，以军功盖世。疾风识劲草，板荡见忠臣。每到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在前线，在战场，均能看到符氏子弟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着历史，用生命构建着未来。弃末求本，杀身成仁；去表就里，舍生取义。

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韬略之机，存乎心中，符氏子孙汲取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光大的是不灭的民族精神。唐太宗重修《氏族志》，符氏以琅琊为渊源，终唐一朝，不负名望，符令奇、符璘父子同登忠义榜，《旧唐书》如此评价：“烈士殉义，见危致命；国有忠臣，亡而复存。”

家风醇厚，英烈辈出，至残唐五代，符存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符存审（862—924年），原名存，字德祥，祖籍琅琊，出生于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五代名将。“予本寒家，少小携一剑而违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屯危患难，履锋冒刃，入万死而无一生，身方及此，前后中矢仅百余。（《旧五代史·唐书》）”

符存审父亲符楚是陈州牙将，他自小在军旅长大，少年时性格豪迈，重



侠义精神，而且机智多谋，喜欢谈论兵法战事。唐僖宗乾符年末，河南兵乱匪起，符存审召集率领豪门大户及门人，庇护一方平安。后投奔晋王李克用，得到重用，为精锐部队“义儿军”的头领，赐姓李，名存审。是十三太保之一。

符存审谨言慎微，临战识机知变、治军法令严明，运筹决策，从来没有预判或战略失误，深受晋王信任，自此以后李克用出征，存审经常跟随，所以能够杀敌立功。征讨赫连铎，“冒刃死战，血流盈袖”，李克用亲自为他治疗伤势并早晚问候。唐昭宗乾宁初，符存审出任先锋迎战李匡俦，一举攻下居庸关。第二年攻打邠州，邠州主力聚集龙泉寨，凭靠地势险要负隅顽抗，符存审不畏艰险攻城夺寨，回师之后被授予“检校左仆射”。后又协助李嗣昭攻打汾州，生擒汾州主帅李瑋，因功升职“左右厢步军都指挥使”。天祐三年（906年）升任“蕃汉马步副指挥使”，与李嗣昭出征潞州，与李嗣昭合兵上党，降服丁会。被委任为忻州刺史兼“蕃汉马步都指挥使”。天祐七年（910年），出任“蕃汉副总管”，领兵镇守太原。天祐九年（912年）后梁太祖朱温50万大军进攻李克用的势力范围镇州、定州等地，自己则亲率贺德伦等人围攻蓟县（今河北景县）。正在附近赵州驻扎的符存审率部下史建瑭、李嗣肱等800人救援。兵不厌诈，他用乔装改扮的600骑兵突袭梁军大营，遍地举火，出奇制胜。后梁军损兵折将，阵势大乱，拔寨后连夜遁逃，朱温扶病返回洛阳后不久便被儿子所杀。符存审因功遥领邢、洺、磁团练使。

天祐十二年（915年）李克用死后，河北魏博天雄军归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李存勖派遣符存审率先头部队进驻临清，“以俟进取”。六月，符存审遭遇后梁军刘鄩，一日数战，互不相让。十三年二月，刘鄩率全军奔袭魏州，符存审率军断其退路，迫使双方在元城决战，后梁军大败。符存审乘胜收复了洺、卫、磁、洺等州。李存勖以收服五州之功，授予符存审安国军节度使，兼任邢洺磁等州观察使。十月，戴思远得知符存审兵临沧州立刻闻风而逃，城将毛璋则开城投降。庄宗大喜，加授符存审检校太傅、横海节度使，兼职“魏博马步军都指挥使”。第二年加官晋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天祐十四年（917年），契丹30万大军围困李存勖属地幽州（今北京），由于主力正与梁军对峙，李存勖非常苦恼该如何是好。欲援救幽州，手上兵力不足；如果不派兵援助，幽州则面临危险。他征求帐下诸将的意见，只有符存审认为幽州不可不救，更自愿请缨说：“借我五千骑兵就足够了！”李存勖批准了符存审的请求，发兵七万前往幽州。符存审不负所托，先用鹿角阵大败契丹的骑兵前锋。入冬后两军主力开战，符存审采用“棉里裹针”之计杀破敌将安彦之，一举击溃契丹军；契丹主军受重创，残军仓皇向北山方向逃窜，余下辎重粮饷遍野。晋军又再追击，俘获敌军上万人，遂解幽州之围。

天祐十五年（918年）符存审率军攻克杨刘城，部队进驻麻家渡。面对后梁军的挑衅，李存勖年轻气盛、勇于应战，经常不顾安危，轻骑而出，其中四次陷入险境。符存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迎上前去劝阻：“大王，您肩负着光复唐室社稷的大任，应该为天下的臣民爱惜自己。斩将夺旗，是将军的职责，不会增加您的威望，还请交给我们效力。古人遇上盗贼时，尚且不会由上司和父亲去抵抗，而今我虽无将帅之才，但不敢不为大王您分忧”。庄宗通常也从善如流，及时返回驻地。

同年，李存勖晋军与后梁军在胡柳陂（今河南濮城西）交战，战况异常激烈。辰巳时份晋军大将周德威战死，晋军全军失措，后梁军自四方八面蜂涌而至。将李存勖层层包围，符存审与三儿符彦图率所部银枪效节军拼死血战，突入重围与李存勖会合，午后，晋军经调整后重新发起进攻，后梁军败退。

天祐十六年（919年）春，顶替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于德胜口分别建筑南北两座城池据守，时人称之为“夹寨”。七月，后梁王瓚从黎阳渡过黄河进行挑衅，符存审拒守不出，王瓚退到杨村渡口，控制了上游，从此天天交锋，经过一年的对垒，大小凡百余战，符存审未曾败过。到这时候，李克用的晋军将领只有符存审依然健在。

天祐十七年（920年）后梁刘鄩引重兵进逼同州，晋王李存勖委派符存审与李嗣昭前赴救援。九月，符存审与李嗣昭取道河东进驻河中。河中一带本来兵少且弱，平常不为后梁军所重视，更料不到符存审用兵神速，隐蔽抵达。符存审略施小计，在自己的队伍中挑选了200名精锐骑兵，混杂于当地部队之中主动出击，然后采取佯败的战术，诱敌深入，反戈一击，俘获后梁骑兵五十名，达到了初战告捷的目的，造成了后梁军的惊恐。由于河中一带长期处于后梁的统治之下，民众对晋军的到来采取了冷漠的态度，等到大军云集，粮食、马料价格暴涨，李嗣昭提议速战速决。过了几天，后梁军向晋军逼近。有懂天相的人说，西南方的黑云如斗鸡之状，当有战祸发生，符存审回应说：“我方正想与敌决一死战，天人感应，岂不是如有天助吗！”用此鼓励士气，当晚检阅了部队，第二天天亮开始进攻，后梁军反击败回，被斩杀2000余人，从此后梁军退守堡垒不再露头。符存审见状对李嗣昭说：“我当初最担忧的是被刘鄩占据渭河地利。现在他的侧翼已经溃败，如果撤退，最害怕我们断绝了他的后路；狗急了跳墙，不可忽视。不妨放开一个缺口，等他撤退时，在运动中消灭它。”于是命令部下在沙苑中牧马，刘鄩发觉了这件事，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夜间逃跑。被符存审追至渭河，几乎全军覆没，同州解围。

天祐十八年（921年），张文礼据镇州叛乱，李嗣昭、李存进先后征讨却相继阵亡。次年，符存审率王师包围叛军于镇州城中。半夜登城，擒获张文礼之子张处球等人，与捷报一齐奉献朝廷，镇州平定后，符存审因功加封侍中。

天祐二十年（923年）正月，符存审还师魏州，晋王李存勖亲自出城迎接慰问，并设宴于符存审家中庆贺。不久，契丹又进犯燕蓟一带，庄宗心腹郭崇韬上奏：“后梁尚未平定，契丹就背叛了我们，而捍卫北方的防御重任，离不开符存审。”李存勖便遣中使传达让符存审出征的命令。此时，符存审因为作战经年而积劳成疾，卧床不起，回奏说：“臣愿意前往效命，不敢托辞推诿，只是重病缠身，不能担当作战任务了。”李存勖诏封其兼领幽州卢龙节度使予以安慰。

公元923年，李存勖消灭后梁称帝，国号后唐，迁都洛阳。加封符存审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食邑千户，赐号忠烈扶天启运功臣。此时，符存审却因身为大将受病拖累，未能参与最后围歼后梁而郁郁不欢，病况日下。只得要求前往京城，朝见皇帝，寻医看病，并请求大臣郭崇韬协助，但郭崇韬一向自负，而且不愤功绩和声望皆在符存审之下，因而符存审每有奏章要求都暗中予以阻止。符存审的妻子郭氏哭着痛斥郭崇韬说：“我夫君为国家效命，驰骋疆场，两家又是乡亲故旧，难道你忍心让他死在荒凉的北方，为什么无情无义到了这种地步！”崇韬恼羞成怒。

同光二年（924年）春天，符存审病情加剧，恳切表奏，要求生前再见后唐庄宗李存勖一次，不被批准。他趴在枕头上叹息说：“老夫我侍奉经历了两代君主，至今已经四十余年，有幸看到今天天下复归一统，四方蛮夷都可以入朝觐见；那些降兵败将，谁不在朝廷中高举着酒杯祝福皇上，但是独独我却被排除在外，岂不是命运弄人！”病危之时，李存勖批准了符存审入京的请求。同光二年四月，朝廷本来已经拟定好授予符存审宣武节度使、诸道蕃汉马步军总管，可惜诏书未到，符存审于五月十五就病死在幽州官舍，时年63岁，遗嘱要求葬到太原。

符存审死后，后唐庄宗李存勖看到了符存审最后时刻写给自己的奏章，其中陈述不获圣上面觐，言词凄凉悲伤，庄宗心灵震撼，久久不能平静，废朝三日，又追赠符存审尚书令，谥号同忠烈扶天启运功臣，天成年间配飨庄宗庙廷，追封秦王。符存审有子嗣九人，其中一位藩王，六位节度使。

符彦卿（898—975年），字冠侯。五代北宋时名将，符存审的第四个儿子。年龄13岁时，就能够骑马射箭。受到后唐庄宗李存勖赏识，留在身边，因为他谨慎厚道，允许他出入庄宗的卧室。庄宗消灭了后梁，任命他为散员指挥使。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郭从



符彦卿画像

谦发动兵变，庄宗的近卫都逃跑了，只有符彦卿拼死抵抗，射死十几个人后，因庄宗被乱箭射中死去，于是放声痛哭离开。天成三年，在吉州刺史的位置上讨伐王都于定州，在嘉山痛击契丹军队。第二年攻克定州城，晋升耀州团练使。后唐末帝清泰年间，改任易州刺史，兼管北方骑兵，被皇帝赐以盔甲、战马。他曾经在遂城盐台淀狩猎，一天之内猎获獐子、野猪、狼、狐狸、兔子四十二只，“观者神之”。后晋天福初年，升任同州节度使。后晋出帝石重贵与符彦卿同为发小，继承皇位后，委以符彦卿镇守河阳三城的重任。契丹军队南侵，出帝命令符彦卿率所部在澶州阻击。契丹骑兵几万人包围了后晋大将高行周在铁丘，众将领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前去解围，惟有符彦卿率领数百骑兵赴汤蹈火，用气势逼迫契丹军队撤退，高行周得以幸免。符彦卿因此晋封祁国公。

后晋开运二年，符彦卿与杜重威、李守贞一起在北部戍边。契丹国王率领兵将十余万人围困阳城，晋军里面严重缺水，打井遭遇塌方，士兵争相用衣服包裹着烂泥绞出水滴舔吮，人马多渴死，即将开战，晋军逆风布阵，弓箭都无法使用。许多将领对必胜失去了信心，符彦卿振臂高呼：“与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战，然未必死。”将领们听从了符彦卿的召唤。于是带领主力秘密绕到敌人背后，顺风攻击，契丹军队大败而逃，缴获的器械、盔甲、旗帜数以万计。后晋出帝嘉奖了符彦卿，改任武宁军节度使、加封同平章事。

公元944年，契丹灭掉后晋，符彦卿被辽国（契丹灭晋后改称）俘获。辽国皇帝拿阳城的失败说事，痛责符彦卿，彦卿回答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置生死于度外，事到如今，听天由命罢了。”辽国皇帝被符彦卿的人格所折服，他笑着释放了符彦卿。

不久徐州一带失控，盗匪遍地，辽国皇帝随即派遣符彦卿回徐州镇守。路宿甬桥，遭遇李仁恕聚集散兵游勇几万人攻打徐州。符彦卿缒城而出，高声训斥说：“男子汉大丈夫应该为国讨贼，为什么自甘堕落，协助土匪攻击我？我父子几人，翻脸无情，如果不要命了，谁也不能前进一步。”那些人既畏惧又羞愧地跪倒在符彦卿面前，要求免罪，彦卿与他们约法三章，徐州解围。

后汉高祖刘知远立国，符彦卿以徐州之地积极拥戴，改任兖州节度使，授予侍中称

号。乾祐年间，领銜中书令，晋封魏国公。

周太祖郭威称帝，封淮阳王。周世宗时符彦卿官拜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守太尉。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加封符彦卿为太师。建隆四年春，入京朝拜，被赐袞衣、玉带。然而通过非正常手段黄袍加身赵匡胤，对将领们不敢掉以轻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杯酒释兵权后，作为三朝元老的符彦卿的位置就显得更加突出了。《邵氏闻见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王晋公祐，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之妇翁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祐往别太宗于晋邸，太宗却左右，欲与之言。祐径趋出。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能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祐曰：“臣与符彦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谓辅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别有清节，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祐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贵，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谓之三槐王氏。

宋太祖开宝二年六月，符彦卿被交流任职凤翔节度使，因病重用担架抬着赴任，走到洛阳，打报告请求停留医治，皇帝允许。假满一百天，要求续假，违背制度，被人弹劾，宋太祖虚心假意以姻亲故旧的名义免于追究，但罢免了他的节度使。开宝八年六月，符彦卿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符彦卿是符存审的第四个儿子，军中谓之“符第四”。性不饮酒，谦恭待士，对宾客清谈终日，不及世务，不伐战功。勇略有谋，善用兵。“前后赏赐钜万，悉分给帐下，故士卒乐为效死。辽人自阳城之败，尤畏彦卿，或马病不饮，必唾而咒曰：“此中岂有符王邪？晋少主既陷契丹，德光之母问左右曰：‘彦卿安在？’或对曰：‘闻其已遣归徐州矣。’德光母曰：‘留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其威名如此。（《宋史》）”

周世宗宣懿皇后、宣慈皇后，宋太宗懿德皇后，都是符彦卿的女儿。自后周恭帝到宋太祖两朝，赐诏书不名。有儿子昭信、昭愿、昭寿等。



上博简《内礼》与 《大戴礼记·曾子》

梁 涛



今人讨论曾子的思想，往往仅根据《论语》中的材料，然而据一些史书记载，还曾有《曾子》一书。如《汉书·艺文志》说有“《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隋书·经籍志》说有“《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著录“《曾子》二卷”。按照古书体例，这部名为《曾子》的著作，应该是曾子及其门人言论的记录，它同样是了解曾子思想的重要文献。但据学者考证，十八篇的《曾子》唐代时可能已散佚、失传，后来流传的二卷本《曾子》似另有来源。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今此书（注：指《曾子》）亦二卷，凡十

篇，盖唐本也。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可见晁氏所见《曾子》已是二卷十篇，他认为“盖唐本也”，说明唐代情况亦是如此。今本《大戴礼记》中有篇名标有“曾子”的文章十篇，分别为《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所以唐宋以来流传的十篇本《曾子》可能是从《大戴礼记》中辑出的。钟肇鹏先生曾检索历史上引用“曾子”的情况，发现唐代以前所引，或见于这十篇之中，或不见于十篇，前者如董仲舒引用曾子二则（见《春秋繁露·竹林》和《天人对策》），分见于《曾子制言》和《曾子疾病》；后者如汉刘向《说苑》引曾子数则（见《说丛》《杂言》），徐幹《中论》引曾子二则（见《修本》《贵验》），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上》引曾子二则，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引曾子一则，却不见于这十篇，而唐代书籍《群书治要》及马总《意林》所引，均见于此十篇之中。这说明《曾子》一书经历了散佚、失传和重新辑佚的过程，今天所见《曾子》主要是依靠《大戴礼记》保存下来的。

由于《曾子》一书的复杂性，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如，宋朱熹说：“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记》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象，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黄震也说：“《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并提出非曾子所作的四点证据：一是皆世俗委曲之言；二是若乐正子下堂伤足之事；三是所言“良贾深藏如虚”，近于老子之学，不类曾子弘毅气象；四是特以天圆地方之说为非。明方孝孺说：“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近代梁启超也认为：“《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曾子》一书不伪，它形成于战国中期以前，反映的是曾子学派的思想。那么，《曾子》一书的情况究竟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一，《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是否来自《艺文志》中的《曾子》十八篇？二，《曾子》是否形成于战国时期？其中，前一点又涉及到《礼记》的成书问题。

我们知道，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收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据《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可知《礼记》往往又称《记》，《汉书·艺文志》就有“《记》百三十一篇”，它主要来自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而大戴、小戴则是对其传人的称呼。又，汉人所说《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有些本来是经不是记，如《小戴礼记》的《奔丧》《投壶》等，有一些则是将子书的单篇收入其中，如，小戴中的《缙衣》《表記》《坊记》《中庸》四篇出自《子思子》，《月令》出自《吕氏春秋》，《乐记》出自《艺文志》的《乐记》二十三篇，《三年问》出自《荀子·礼论篇》等等。《大戴礼记》的情况亦是如此，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今《大戴礼》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闲》七篇。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是也。”这是大戴抄入它书的明确记载，此外如《礼三本篇》出《荀子·礼论篇》；《劝学篇》取《荀子》首篇，同时附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哀公问五义》即《荀子·哀公篇》的首段；《礼察》（部分）、《保傅》见贾谊《新书》等等，所以大戴收入《曾子》十篇是完全可能



的。至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近些年出土的简帛中，也多见子书的单篇，一般是持有者根据需要进行抄写，而较少将整书抄入的，这在郭店简中尤为明显，李先生所论可谓有见。同时由于当时流行的书籍单篇多是阐发儒家理论尤其是礼的思想，与礼存在一定的联系，故往往被编入《礼记》，并被归于其中的“通论”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说：“《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书入于杂记之中，识之以别于他篇也。”阮元认为十篇中的“曾子”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而非篇名，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古书体例，篇名往往取篇中文字或根据文意而定，而很少再加以人名的，所以《曾子立事》的篇名应该是“立事”，取文中多谈为人处事之意；《曾子本孝》的篇名应该是“本孝”，源于文中“忠者，其孝之本与”一句；《曾子立孝》的篇名应该是“立孝”，取文中首句“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的“立孝”二字。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应是《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等等。这也说明，《曾子立事》等十篇确实是来自《曾子》一书。

二

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多与《曾子立孝》等篇有关，为我们利用“二重证据法”探讨《曾子》的成书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材料。其首段云：

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故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1简）其君者；故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与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故为人父者，言人之（2简）父之不能畜子者，不与言人之子之不孝者；故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与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3简）。故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与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故为人弟者，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4简）者，不与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故曰：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使君。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慈弟（5简）；与弟言，言承兄。反此乱也。（第1~6简）

此段又见于《曾子立孝》而文词略有异，除了第一句《曾子立孝》作“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爱”写作“忠”；及最后一句作“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多出“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几字外，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曾子立孝》略去了“故为人君者……”、“故为人父者……”、“故为人兄者……”等内容。竹简整理者李朝远先生说：《曾子立孝》“仅记‘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者，简文中的‘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句，文献失载，且君臣、父子、兄弟的顺序也不同于现存文献。简文更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的思想。”廖名春认为，“简文‘为人君者’与‘为人臣者’、‘为人父者’与‘为人子者’、‘为人兄者’与‘为人弟者’是相对待的关系：讲‘为人君者’没有离开‘为人臣者’，讲‘为人臣者’也没有离开‘为人君者’；……它讲‘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既要求‘为人君者’，又要求‘为人臣者’；……说明这里的‘爱’就不是下对上（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子与父、弟与兄、臣与君）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爱’；这里的‘礼’也不是下对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子对父、弟对兄、臣对君）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子与父、弟与兄、臣与君）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礼’。”《曾子立孝》略去有关君、父、兄的内容，实际是将竹简中君臣、父子、兄弟间双向的、相互对待的“爱”和义务关系，转变为臣、子、弟下对上片面的职责，“颇有‘为尊者讳’的意涵。”不过，由于《曾子立孝》保留了“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兄言，言顺弟；……与君言，言使臣……”一段文字，仍依稀可以看到前面曾有讨论君、父、兄职责和义务的内容。所以《曾子立孝》“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应是在后来流传中被删除了，而被删除的原因可能与后来儒家君臣父子关系被绝对化，竹简要求君臣父子互“爱”、互“礼”的观点显得大逆不道、难以被接受有关。

《内礼》下文又说：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不力，行不颂（容），不卒立，不庶语。

这段文字则多与《曾子事父母》有关。其中，竹简“君子事父母”一段也见于《曾子事父母》，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少“无私忧”三字，以前清代学者曾怀疑这三字为阙文，惜无直接的证据，现在有了竹简，这一问题便清楚了。竹简主张对父母“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曾子事父母》则说：“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二者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不过从《内礼》与《曾子》的相关文字看，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更是对某种相同观念和思想的记录和叙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早期儒家学者没有著书立说的习惯，其言论往往由弟子记录、流传下来，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固定的传本，《内礼》与《曾子》是当时流传的不同传本。或者当时虽已有固定传本，但学者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摘录，《内礼》即是其摘录本，其中也包括了《曾子》的言论。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内礼》与《曾子》存在一定的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据整理者的介绍，该篇“第一简背有篇题‘内豊（礼）’。‘内礼’一词，

文献中未见。《礼记》中有《内则》，篇题郑玄注云：‘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内礼》或与《内则》有关”。不过，从《内则》的内容来看，《内则》的“内”应是“门内之治”的“内”，指家族之内，“内则”即“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而“内礼”的“内”则似是指内心而言。《曾子事父母》说：“兄之行若中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养之内，不养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王聘珍注：“‘养’读若‘中心养养’，忧念也。内谓心，外谓貌。……内外养之，谓忧诚于中，形于外，冀感悟之也。”故“养之内”，是指从内心忧念之，而“养之外”，则是从容貌礼节上忧念之。《曾子事父母》主张“君子内外养之也”，实际也是“内礼”一词所要表达的含义。故“内礼”是说孝既要有内心的忠爱之情，还要有外在的礼节形式，它实际是对该篇首句“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的概括和总结。

随着《内礼》的发现，前人关于《曾子》的种种怀疑已不能成立，《曾子》至少在战国时已经成书。至于其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子思、孟子、荀子等都曾引用其言论，其中有些是明引，有些是暗引，这说明《曾子》当成书于《子思子》、《孟子》之前。此外，《曾子》为记言体，体例类似《论语》，文字质朴简短，一些概念如“忠”是指人内心的真诚状态，而不仅仅指忠君，这些都是其成书较早的证据。钟肇鹏先生说：“曾子卒后，他的第二、三代弟子结集《曾子》书，亦如孔子卒后，其二、三传弟子结集《论语》。《曾子》的结集，盖略晚于《论语》，其时代当在战国早期。”王铁先生具体推定为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由于《曾子》中载有乐正子春与弟子的问答，故《曾子》的结集可能完成于乐正子春弟子之手。

王小古年谱 (下)

刘瑞轩

1954年 甲午 40岁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宪法的颁布，带领学生绘制大型宣传画，组织各种文艺活动。

临沂一中高中学生许庆山（济宁人）爱好美术，前来请教，小古给与指导，并当场示范。

1955年 乙未 41岁

参加“肃反运动”，画漫画进行宣传。

为学生作工笔没骨《牡丹》一幅，作为范画。

偕老友刘子云登泰山。写诗纪游：“久谋岱岳看奇峰，今得偕登兴倍浓。古寺买茶听急瀑，山亭属稿写苍松……”

是年秋，学校开运动会。小古在大门东侧，画大幅水粉宣传画（2米×1.5米），画的是一位投掷标枪的男运动员，引起全校师生的关注。

1956年 丙申 42岁

从本年起专教美术课。小古教学不照本宣科，而是讲自己的画法，并且自编自印讲义，发给学生。除课堂教学外，课外还组织美术兴趣小组，对有美术特长者特意加以培养。参加美术小组的有孟祥善、马学龄、袁堂忠、崔培鲁、魏金铭等。学生除学习素描、水彩、水粉画外，也帮助老师搞宣传画。

为美术科上课，进行短期岗前培训。

给李伯芳老师（擅长书法、音乐）作花鸟画一幅，引起师生们兴趣。自此，校内师生和社会各界人物纷纷前来索画。

是年夏，送省参加青年美展的草图在临沂城展出，让群众观摩。其中有小古画的樱花、泥豆、丝瓜等作品，引起观众的赞赏。从莒县来观摩画的马世治，从此认识了小古，并拜他为师。

是年8月，为宝玮同学作《月季草虫》，画有蝴蝶、蜻蜓、叫蝈、蚱蜢、螳螂、蜜蜂六种草虫。8月，作诗《欲回苏北留别张寿民》：“此日扬帆去，丹青悲负吾……”初冬，作《白鸡菊花》并题诗：“碧玉耳环黄脚爪，大红冠子素罗衣……”





国庆节，张宝珍偕许庆山一起到小古家。宝珍出示自己的水彩画多幅，请求指教。小古带二人到沂河边，画了一幅水彩《晚霞》，给学生示范。临别时，小古又送宝珍一幅八开图画纸的水彩画《菊花》。

作品工笔《樱花》参加山东省青年美展，获二等奖，《白鸡》获三等奖，《樱花》参加全国美展获三等奖，得铜牌一枚，作品发表在《中国青年》封底上。

是年为一中老师李志清画《猫》，并题诗：“风定柳丝直，日长猫睡多……”被省文联吸收为山东省美协会会员。上报的代表作为《双鸡图》。

1957年 丁酉 43岁

2月和张寿民校长一起去济南，参加省委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听省委书记舒同作的动员鸣放的报告。

春，为宝玮同学作《荷花》斗方、《野菊》斗方。作《芭蕉图》，并题诗：“种得芭蕉树，专为学草书……”

为××作《花鸟四条屏》，包括：丁香戴胜、芍药蝴蝶、佛手绶带、青松白鹤。

7月，为三级毕业生徐惠民作《紫藤》等二幅画。

8月，王汝涛老师与周女士结婚。小古作《牡丹海棠双鸟图》贺喜，并题诗：“得意春风彻玉箫，牡丹端丽海棠娇……”

作品参加全国美展，获文化部奖章。

赴曲阜，游孔府、孔庙，并留诗：“借宿先师府，黄昏步广庭。扪碑评字体，考古议棣星……”

长子开微考入临沂师范。

1958年 戊戌 44岁

经领导同意，小古到临沂文化馆为农业展览作画。事毕，为小古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作品有牡丹、月季、桃子等几十幅。这是小古首次在临沂搞个展，受到一致好评。

会后，为国务院谷牧副总理作画一幅。谷牧在回信中，十分赞赏其画。

是年春，北京部分画家到菏泽参加牡丹花会。省里调小古去做接待工作。小古一生八下菏泽，这是首次。在花会上小古为外地画家作画多幅，给北京画家娄师白作《竹笋图》，并题诗：“竹高六尺六，笋高三尺三。要想赶上去，实现也不难。”

5月，临沂地委派整风领导小组进驻临沂师范，动员教职工鸣放，帮助党整风。小古善意地给校领导提几条意见。领导小组将这些材料整理上纲，填好“右派分子呈批表”，给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欲将小古打成右派。因材料不足，未获批准。

父亲王映人病故。

1959年 己亥 45岁

4月，作《白鸡立高石》中堂。

5月，为袁疏愚老师作速写画像，为伟朴同学画像。

7月，为香美作《石榴》轴、《牵牛白鸡》轴。

7月，为五级艺体班（为适应大跃进师资需要，自1958年分专业班）上国画课。教牡丹、月季等常见花卉的画法。毕业前夕，凡是拿宣纸的，每人给作画一张。班内共有10多人得到画。给学生姜某画《牡丹》《水仙》《蟹芋图》等四幅。为学生美容画《牵牛雏鸡》。



8月，为伟朴同学作《菖蒲》《紫藤》为陈素萍老师光腚婴儿画像。

9月，收江苏邳县学生冯梦白信，附寄习作《牵牛花》请求指导，10月11日，小古复信对冯习作加以评点，并附写意《牵牛花》一幅作范画。

暑假，与钱廉女士结婚。

12月2日，奉调到济南，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作画。乘飞机赴济。这次作画任务由副省长李予昂、省美协主席于希宁领导，参加的画家有11人：于希宁、关友声、王天池、黑伯龙、王小古、赫保真、弭菊田、徐培基、陈维信、张彦青、岳祥书。作画地点在大明湖李公祠（即现在的辛稼轩纪念馆）。

12月6日—16日，由李予昂带领于希宁、王小古等六位画家赴京，为山东厅的绘画装饰做先期准备工作。期间，多次到故宫博物院，徐悲鸿美术馆等处参观，开扩了心胸，提高了画技。

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写意《公鸡枇杷》，很快抢购一空。

1960年 庚子 46岁

1月，回临沂过春节，又去灌南探亲。

上半年，于济南为人民大会堂作画。主要作品有《万亩玫芳》（2米平方）、《蝴蝶屏》（六幅，140种蝶）、《菊花屏》（六幅，100种菊花）、《四季花卉屏》、《粮棉烟麻屏》（四幅）、《蔬果图》、《墨荷》等，共41件。其中《万亩玫芳》被收入《山东省国画选》。

4月，收山东人民出版社美术科信，向小古约画稿，并赠《山东民间木板年画》一套。

工笔《月月红》作为山东省《群众艺术》刊物封面画发表。

6月，从各地调集的画家先后回原单位。只留下张彦青、陈维信和王小古。任务是搞到亚非国家的展览设计，创作为建党40周年献礼作品，还有为装饰南郊宾馆的绘画任务。

10月，于大明湖画《玫瑰图》大中堂。为梦白作《红月季》中堂。

11月，接到出国展览的8幅工笔花卉屏的任务，日夜赶制。

本年，为聘卿作《月季》小斗方。为健民作《壮志凌云》（鹰）一幅，为学生作《蛱蝶野花》一幅。

在京期间，结识李可染、王雪涛、俞致贞、叶浅予、华君武等著名画家。陈毅元帅等中央领导人赏识小古的画，陈毅并将写兰花的书法赠予小古。

长子开微在师范毕业，分配到郯城五中任教。

1961年 辛丑 47岁

2月，临沂艺校成立，调小古去任美术老师。学生有赵庆元、蒋怀宗、葛常德、贾志远等。小古兼任师范、艺校两校美术课，每周27节，每夜凌晨一点方能休息。因饥饿缺乏营养，患水肿病，面部浮肿。

3月，创作水彩画《齐白石老人像》，并题长款。

为学生作线描范画《儿童团员》，并题字说明线描特点和方法。

6月，创作国画《学生冯梦白像》《学生赵庆元像》。

在艺校，曾举办《古代书画展览》和《学生美术习作展览》。

8月，艺校撤销，仍回师范任教。既要忙范画，又要应酬校内外人们索画，十分忙碌。

12月，收到冯梦白山水画稿及小幅花卉。复信对山水画《郯城水稻赶江





南》提出详细修改意见。

作山水《大明湖》大中堂。

创作作品参加庆祝建党40周年山东省大型书画展。

母亲于氏去世。

1962年 壬寅 48岁

1月，创作《月季》轴。

2月，作水彩画《朱志舞像》。

4月，去济南参加文联工作会议，听余修副省长报告。报告说：画家画自然，不必硬塞进政治内容。使小古思想获得解放。

5月，创作工笔《花鸟四幅屏》，包括：《肥城春色》《平阴玫瑰》《历下风光》《曹州花瑞》。此画于1963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为庆鹤作《白荷》。

7月，作《两鸡相斗图》。

夏，途经瓦窑去郯城杨集小学冯梦白处，共住三天。应约为老师们作画10多幅：为袁济民作《墨荷》，为刘福一作《雄鸡高唱》《葡萄小鸡》，为梦白作《墨荷》。

又去学生徐惠民家为其兄弟作画。

8月，宋继美、朱志舞（均为新海中学学生）结婚。小古亲自下厨，操办喜筵。并赠《蔬果四幅屏》（包括葡萄、石榴、香蕉、枇杷等水果）祝贺。

8月6日，山东省政府邀请全国部分国画家聚会青岛，举办消夏笔会，共商国画的提高创新问题。小古应邀参加，结识了北京、上海、江苏的著名画家李苦禅、俞剑华、钱松喦、王个簃、江寒汀、王雪涛、田世光、崔子范、郭味蕖、亚明、陈大羽、张文俊、肖平、吴镜汀、颜地、李燕等。并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国画新作展和在济南举办的汇报展览。

冬，为朱志舞作中堂《金鸡报晓》。

12月，书魏碑体唐诗一首《朝发白帝城》。

同月，为朱利和书行书“为吟五个字，捻断数根须”。

为侄婿孟祥善作写意《十足春风》（牡丹）。

作写意《荷花》《葡萄熟了的时候》。

为三子开端作水彩画像。

小女出生。

1976年 丙辰 62岁

春节，作《牡丹雏鸡》。为建章作《海棠》中堂。携女儿回灌南。为亲友作画多幅。作写意《荷花》轴。

春，为临沂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从义作写意四条屏：《金鸡报晓》《孔雀开屏》《菊花锦鸡》《松龄鹤寿》及《月季》轴、《葡萄》轴、《雏鸡相争》轴，工笔《鸟语花香》。为从义书魏碑鲁迅《自嘲》诗一首。

第二次去菏泽画牡丹。同去的有马世治等十个学生。期间，去美术公司讲课一天，又被山东艺术学院请去为学员讲课一天。

4月，作工笔《美人蕉》。作工笔《风华正茂》轴（牡丹）。

5月，作写意《荷花》，为龙宽作《天竺葵》。

为学生作没骨工笔《芍药》轴。为天楼作没骨《牡丹》轴。作《芙蓉图》。



同月，为明山作山水《锦绣河山图》中堂。为瑞轩作没骨花卉《芍药三种》。作写意《桃花》。

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帛画出土。与高天祥、张鹤云（济南）一起临摹复制帛画。原件存临沂文管会，复制品送故宫博物院。此画后发表于《文物》杂志1977年11月号。

夏，为学生商开栋写印稿“银雀山下”。

7月，为顾林作写意《月季》轴。为伯立作《柳荫得趣》（双猫捕蜻蜓）。

作写意《鸡上树》轴。作写意《大鸡紫藤》轴。

作《芙蓉鸳鸯》，题诗：“芙蓉红灼灼，鸳鸯影双双。……”

8月，为立振作《葡萄》轴。书行草《牡丹八大色》作《双猫图》。为文物组刘心健复制帛画局部《纺织图》。

10月，作写意《老梅》，并题诗：“老干新枝世世红，不争春风报春风。……”

作《雄鸡图》，参加山东省美术展览。

11月，作山水《自古华山第一峰》。

12月，夫人钱廉病故。

12月9日，为感谢给钱廉治病的医生，小古在家设宴招待县医院宋景云，146医院李贤、张宏等大夫。瑞轩作陪。饭后，小古给每人作写意花鸟各一幅。

冬，为星光作《葡萄》轴。

为朝俊作《虞美人》轴，《芳春花灼灼》（桃花）轴。

为××弟作《大桃如斗》轴。

为书法家陈允升作《墨牡丹》二幅，《墨菊》一幅，并书对联：“荆山奇异人珍爱，铁砚功夫自不知。”

岁末，携女儿回灌南。住老友卜星光单位（县广播站），为卜星光和亲友作画百余幅。其中，为卜星光作《葡萄》，题诗：“今日重相见，回忆三十年。……”为卜坤扬作4尺中堂5幅：《葡萄小鸡》《莺歌燕舞》《牡丹猫蝶》《大鸡梅花》《年年月月开不败》（月季）

本年，通过画家宋式云，为莒县城阳书画社及莒县工艺美术厂作工笔《牡丹》《月季》《杜鹃》《樱花》等多批次，共约几十张。通过青岛口岸，出口到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

本年作品还有：

为方田作工笔《白鸡菊花》中堂。为振国作《白牡丹》轴。为庚成作《小猫捕蝉》。为难友张占文作《牡丹》等画多幅。为葛长德作《菊花蝥蛸》轴。

为坤扬作《葡萄双鸡》中堂，并书一联：“宝剑锋从磨练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为飞尘作《葡萄大鸡》中堂，《小猫捕雀》轴。作山水《药农》中堂。作写意《墨梅》中堂。为学生做写意《三猫捕雀》轴。作《白鸡图》中堂。作写意《紫藤雏鸡》轴。为天楼作《葡萄》轴。作写意《老干新枝世世红》（梅花）。

（未完待续）





英勇善战的沂蒙民兵

刘洪连 李西安



翻开沂蒙革命斗争史册，追寻民兵经历的峥嵘岁月，用“英勇善战”来形容沂蒙民兵，那是当之无愧的。

沂蒙民兵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斗争中建立并在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的。他们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活跃在蒙山沂水，既单独作战，又随同主力部队作战。民兵配合部队作战，主要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中，民兵根据其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的特点，遵循“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走、打、散、躲”等战术原则，运用破袭战、地雷战、车轮战、推磨战、联防战、围困战等多种战法，积极有效地打击敌人。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民兵同人民解放军一起，与进攻山东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广大民兵配合解放军英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配合部队肃清残匪，直至最后全部消灭境内之敌。

据莒南、莒县、日照、沂水、苍山、郯城、平邑、临沭、费县等县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沂蒙民兵独立作战与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共2.4万余次，毙伤俘敌3.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炮火器9660余件，子弹、炮弹29万余发。在区内进行的较大战役，都有民兵参加配合，解放战争时期还随部队到周边地区作战，甚至远征到长江以南。广大民兵创造的各种战法，神出鬼没地四处出击，常使敌人闻风丧胆。

破袭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据着大中城市，交通运输线是其调兵遣将、军需供应的主要依托，并以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切割、包围。因此，破坏日军交通、通信线路的破袭战，成为广大民兵配合八路军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的一种作战形式。1940年9月，鲁南2000余民兵，为配合“百团大战”、反击日军对鲁中“扫荡”，将平邑至泗水的公路完全破坏，毁1华里长木桥1座、石桥6座。10月16日，又先后将汤头至葛沟、青驼至徐公店的百余里公路破坏，毁大桥5座，收电线1000余斤，拆毁碉堡50个、围墙14处。1941年冬，在反击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中，沂蒙民兵和群众开展持续数月的交通大破袭，在沂（水）蒙（阴）公路东



自垛铺西至旧寨80余里的地段内，挖大沟（深4尺，宽6尺）100余处，小沟（深2尺，宽3尺）300余处，筑石墙200余处，破桥10余座；在临（沂）蒙（阴）公路东起上店西至桃墟60里地段内，挖大沟15处，小沟20处，筑石墙16座；沂（水）临（沂）公路北起辛集南至房泉20余里内的电线全部被割断；在泰（安）石（臼所）公路东起崔家峪西至坦埠之间，筑宽6尺、高10尺阻路墙5座，使上述4条公路全程不能通车，粉碎了日军企图打通台（儿庄）潍（县）、临（沂）蒙（阴）公路，分割解放区的计划，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反“扫荡”。

1943年1月，滨海区民兵和群众为策应沂蒙反“扫荡”，在北起九曲店南至重沟，西自沙墩东至郭家湾，绵延200里的临（沂）诸（城）公路上，展开连续4天万人大破袭。他们在县区乡破路委员会的领导下，拿起铁锹、镐头、剪刀，把公路、桥梁、围墙、电线等敌交通封锁线全部破坏。1944年6月25日、26日两天，莒中民兵万余人，将台（儿庄）潍（县）公路莒县至夏庄段24公里路全部毁坏，挫败日军企图打通台潍公路的计划，保卫了革命根据地。

地雷战 地雷战是广大民兵创造的一种常用战法。由于民兵地雷战的普遍开展，使得敌人到处挨炸，防不胜防。埋设地雷的方法达20余种，开始用地雷进行防御，后来发展到用地雷进攻，将地雷埋设到敌据点附近，以至敌办公室、活动场所等。1944年3月，沂临边民兵英雄高运成、高培志等19人，根据驻汤头日伪军每天早晨去温泉池洗澡的规律，2日夜间摸进温泉池，在池门里面埋上地雷，雷弦挂在门上。3日凌晨，几个日军照例去洗澡，刚一推门，地雷爆炸，炸死3人，伤2人。北沂蒙反“扫荡”时，驻王家庄日军经常到农民菜园里偷白菜，民兵就在一棵大白菜底下埋上地雷，弦挂在白菜根上。第二天，日军又去偷白菜，被炸死7人。青驼民兵在垛庄据点至青驼公路几次埋雷，均炸死炸伤日伪哨兵。黄庄民兵时常在重要路口埋雷，吓得日伪军躲在据点轻易不敢出扰。1945年5月，沂南县民兵在反“扫荡”中歼日伪军231人，其中被地雷炸死炸伤97人。

1946年6月底，八路军鲁中军区抽调沂南县124名民兵，组成“高金飞行爆炸神枪射击大队”（高即高运成，是爆炸大王；金即金维三，是神枪手）。8月3日，高金大队奉命到达博山前线。博山东面的西河区，驻扎着国民党军1个团，经常到解放区烧杀掳掠。西河区附近的一个小岭，是国民党军过河到解放区抢劫的必经之路。8月19日深夜1点钟，大队摸到小岭上，在警备第6团第3营掩护下，迅速布好地雷隐蔽。第二天，过河抢掠的国民党军刚踏上小路，就遭到地雷轰炸，第3营一齐开火，给国民党军重大杀伤。黑山是博山的前哨，国民党军一个营在此驻守，常到黄家大洼操场出操。9月18日黑夜，大队20名民兵摸到操场，很快将飞雷、群雷、连环雷在操场四周布好。第二天，国民党军两个连刚走进操场就踏响了地雷，被炸得无处藏身，尸横遍地。10月间，山东军区命令高金大队从博山调到鲁南前线开展地雷战，任命高运成为大队长兼政委，金维三为副大队长兼副政委。31日，大队到达洪山南面的千里沟，正值国民党军一个团进攻八路军独立营。高金大队将30名民兵分成3个爆炸小组，在山岭下洼地迅速埋雷，并组织20名射手到前沿阵地替换下部队2个班。这2个班边打边撤佯败。当国民党军距射击位置只有100米时，20支枪一齐开火，20个敌人应声倒下。山头掩护的部队一齐打响，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山头猛扑，当拥到山前洼地时，连环雷一阵轰响，炸得国民党军焦头烂额，大败而回。12月12日，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从峄县向临沂进犯。高金大队奉命坚守卞庄东面东沭河上一座大桥，保证解放军安全通过大桥，同时堵住国民党军不让更多过河。高金大队在卞庄东南塔子山布满地雷，又在东西桥头各放80包炸药，埋上地雷，备足棉麻、汽油、麦秸、秫秸等物，以便通过爆炸引起燃烧。民兵坚守桥头六昼夜，解放军全部撤到河东。第7天上午10点多钟，国民党军坦克一到卞庄，即派部队控制塔子山，未到山顶就踏响了地雷。山下敌坦克部队认为山上有解放军阻击，便集中向山上开炮，炮弹炸响了地雷，地雷带动飞雷，密集弹片落

向国民党军阵地。这时，国民党军转过头来朝桥头猛扑，刚到河边便遭到地雷和炸药的轰炸，接着引起燃烧，浓烟滚滚。爆破组的民兵立即将桥炸掉。坦克面对断桥束手无策，步兵妄图涉水过河，又遭到金维三射击组的火力封锁，最后只好收拾残局，败回老巢。高金大队即星夜插到了卞庄西南，一夜之间炸掉了大小桥梁33座，切断国民党军第26师等部的退路。鲁南战役胜利后，山东军区给高金大队记特等功1次，并奖“八一”奖旗1面；大队长高运成记特等功1次，副大队长金维三、队长王继尧各记一等功1次。

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临沂后，滨海区各县均组织起20至40人的民兵爆炸队，开展游击爆炸战，一年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在2月15日解放军主动撤出临沂城时，临沂爆炸队在城内布雷3天2夜，埋雷400余枚。国民党军进城后，地雷接连不断响了2天，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在县府驻地，国民党军1个连碰响了连环雷，被炸得血肉横飞，连长未及下马，就被炸掉一条腿。国民党军侵占临沂城后，临沂爆炸队分成河东、河西、河北三部分，配合武工队进行飞行爆炸。1个月内埋雷420余枚，毙伤国民党军约40人。高广珍爆炸大队除留一部配合东海地方武装及县爆炸队坚持边沿斗争外，大部开往临郯前线，在郯城南北及沭河两岸马陵山区，开展游击爆炸战。大队长高广珍苦心钻研爆炸技术，先后创造了竹筒雷、钉子雷、钢丝雷、水雷、飞雷等6种主要爆破器材。他们实行敌进我进、边炸边退的战术，50余天转战临郯数百里，埋设地雷400余枚，炸伤国民党军官兵250人。马帮才爆炸大队于2月中旬开赴郯城前线，担负马头方向、沂河东岸及临郯公路的爆炸任务。他们采取“炸而复打、打而复炸”的战术，有效地阻击了国民党军前进。仅黄金店子一战，即炸死炸伤国民党军20余人。该队朱充有组，一次埋雷即炸死炸伤国民党军13人，乘敌人仓皇混乱之际，又配合解放军某部猛力扫射，毙伤国民党军200多人，迫使对方败退。次日，国民党军大股重返追击，当进至拉犁山山口处时，吴福森组预埋的13枚地雷全部炸响，又炸死炸伤国民党军多人。3月中旬，国民党军侵入临沭境内后，县人武部精选岌山、苍山、钟山、玉山四区优秀爆炸手及特等射手充实马帮才爆炸队，人员达40余名。他们坚持沭河边沿斗争，深入河西开展飞行爆炸。有一次，他们在曹庄附近埋设的4处地雷全部爆炸，炸死国民党军10余名，迟滞了敌大队行动。一个月中，共埋地雷120余枚，毙伤国民党军60余人。莒南县十字路爆炸队，善于插入敌后开展“飞行爆炸”。12月1日至7日，十字路爆炸队创造了埋地雷253窝、杀伤国民党军营长以下260多人、自己无一人伤亡的战绩。华东军区和滨海军分区分别通令嘉奖莒南县十字路镇爆炸队，赞誉该队“创滨海爆炸战空前范例”。给该队记集体特等功1次，赠“八一”军旗1面，授予“模范爆炸队”称号。

联防战 联防战是抗日根据地边沿地区民兵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一种战法。根据地形和作战需要，将附近若干村组成民兵联防区。一村有事，各村支援；一村打响，各村接应。抗战初期，鲁中、鲁南就有联防形式。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联防规模逐步扩大，由村与村联防发展到区与区、县与县联防。1941年，临沂、郯城、费县、峄县4县边区，曾组织自卫团联防总指挥部，在5月收复抱犊崮根据地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43年，鲁南郯马地区为粉碎日伪“蚕食”，沂河沿岸40余村庄民兵组成50里长的联防线，封锁日伪据点，打击出扰之敌。在5至6月的1个月中，战斗18次，毙伤日伪军40余名，活捉伪警长1名，查获奸细6名。仅夏收一季，就抗交日伪征粮182万斤、征款3336万余元。1943年，莒中县民兵与各区武工队密切配合，开展村村联防、庄庄相助的大联防运动，多次成功击退了妄图“蚕食”根据地的日伪军，挫败了日伪军在凤凰山、石家屯、皇姑墩等地安设据点的计划，在长达80余公里的沭河沿岸筑起人民联防“铜壁铁墙”，被群众誉为“沭河大戒严”。

围困战 结合破袭战进行围困战，是民兵以蚕食对付敌人“蚕食”的战法。敌人“蚕食”推进时，民兵就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白天占据点、修碉堡，民兵就在夜间去破坏；对敌人兵力薄弱的据点，就在部队支持下进行围攻，



把敌人挤走；对那些威胁大而又一时不能拔掉的据点，就以围困战同敌人斗争，断绝其交通联络和水源补给，造成敌人供应上的极大困难，并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对鲁中区日伪垛庄据点的围困战，就是一个典型战例。1942年10月，日伪军在垛庄安据点，驻日军百余人、伪军300余人。垛庄、界牌两区民兵在区中队带领下，于据点周围埋地雷，打麻雀战，捕捉特务，破坏交通，截击日伪军运输队，打击敌人的抢劫活动。围困垛庄据点12个月，作战272次，毙伤日伪军180余名，迫敌于1943年10月19日撤退。

村自为战 沂蒙民兵不仅能采用各种战法，灵活机动地与敌人进行游击战，而且能同仇敌忾，坚持村自为战、人自为战。1941年9月29日，日伪军数百人包围了临沭县西山前村，全村民兵、群众在自卫团团长张作洪率领下，用土枪土炮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50余人。张作洪等38名民兵、群众壮烈牺牲。滨海专署命名西山前村为“抗日模范村”，追认张作洪为“抗日民族英雄”。1941年12月20日，日伪军1000余人向沭水县（今属莒南县）渊子崖村进犯，全村民兵、群众在村长林凡义率领下，以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英勇抗击，激战竟日，歼灭日伪军100余名，全村147人壮烈牺牲。滨海专署授予该村“抗日楷模村”光荣称号。博莱县南岩村（今属沂源县）1943年夏成立民兵队。同年11月23日，伪军吴化文部600余人分两路进攻南岩村，该村60余名民兵和群众奋力抵抗，打退吴伪多次进攻，毙伤伪团副以下50余人，民兵仅亡2人，伤5人。次日，日军250余人、伪军900余人出动报复，将南岩村烧成一片废墟，南岩村民兵继续顽强奋战。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半年时间对日伪军作战14次，攻克据点3处、碉堡15座，毙伤日伪军133人，俘伪军105人，缴获掷弹筒2具、轻机枪2挺、步枪62支。1944年3月21日《大众日报》发表了题为《向南岩同胞和民兵英雄们致敬》的社论。山东军区授予南岩民兵队为“英雄民兵队”，并奖锦旗1面，称他们是山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模范。像上述民兵坚持村自为战的，还有苍山县的萧姬庄村、郯城县徐圩子村等等。

参加攻势作战 1942年以后，民兵配合部队进行攻势作战增加。1942年甲子山反顽战役期间，莒南县1036名民兵参加战斗，警戒山头13个，俘虏顽军15人，缴获步枪15支、电台1部、子弹500余发。在1943年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费县民兵参战249次，毙伤俘日伪军206名，缴获轻机枪3挺、手炮3门、步枪110支、短枪6支。莒南县大店区民兵彭自学，在配合主力攻占赵家岭战斗中，1人就俘虏敌人19名。1943年12月第二次讨吴（化文）战役时，鲁中区武委会下达动员令后，方圆150里以内的民兵在36小时内集结参战，完成了部队赋予的第二线警戒和侧翼作战任务。1944年春至1945年，八路军对日伪军发起一系列进攻战役，民兵积极配合部队反攻作战。1944年3月第三次讨吴（化文）战役，参战民兵达4500多人。沂临边县民兵1个中队配合1个团攻击郑王庄吴伪总部；沂南县民兵1个中队

随第2团攻击小张庄；沂北县民兵1个中队监视3个据点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在1944年8月滨海反“扫荡”战役中，临沭县民兵沿河抗击由临沂城东进的日伪军，同时对驻姜屯一带之敌实施连续袭扰。莒南县十字路、筵宾两区民兵，在县武委会统一领导下，同友邻区民兵一起追击东进之敌，配合八路军机动部队将敌包围在葫芦沟。据不完全统计，在滨海区10天反“扫荡”中，民兵作战201次，打死日军小队长以下39名，伤9名，俘3名；毙伤俘伪连长以下59名，查获抓捕奸细88名，缴获军用品一宗。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民兵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还击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1月鲁南战役期间，鲁南区10余万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取得了歼敌7个半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月底，蒋介石调动48个旅的兵力，以陇海路东段、胶济路西段向山东解放区腹地进犯，南北夹击，妄图迫使解放军在沂蒙地区进行决战。鲁中区发动10万余名民兵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破袭战、地雷战，迫使国民党军日行不到20里，为人民解放军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不完全统计，莱芜战役前40天（1月中旬至2月下旬），鲁中区民兵作战225次，毙伤俘敌2191名，缴获小炮12门、长短枪470支。莱芜战役中，60万民兵民工在前线服务，仅鲁中区，就组织了40多个子弟兵团、400多个连队参战，保证了莱芜战役的胜利。1947年4月，为粉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实行运动作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民兵和地方武装担负起坚持边沿地区和开展敌后斗争的任务，开展了游击战争。当国民党军大兵团齐头并进，向鲁中进犯时，鲁中区15万民兵，配合解放军进行正面阻击和敌后钳制敌人作战，使国民党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代价。据沂源、沂水、临朐等县的统计，仅7月1个月民兵爆炸队就作战200余次，毙伤俘国民党军500余名。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沂蒙民兵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反攻，对国民党军进行袭击、伏击、截击作战。在人民解放军作战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鼓舞下，各地民兵配合部队向国民党军开展强大政治攻势，瓦解国民党军，收到显著效果。1948年9月济南战役期间，鲁中南区的民兵，配合部队阻击援敌，破坏交通，切断电线，断敌联系，扰敌后方；日夜守护境内重要公路、桥梁、通信线路、仓库等目标，保证部队后方交通运输安全和通信联络畅通。在淮海、渡江、淞沪战役中，临沂组织了常备民兵子弟兵团随军作战，担负火线抢救伤员、铁路沿线警戒、押运物资、看押俘虏、守护仓库以及剿匪等项任务。滨海子弟兵团1481人随军南下，参加渡江作战后，紧接着参加了淞沪战役，完成了押送15000名俘虏的任务并随军转入福建，完成了从厦门到上饶的押送战俘任务及征粮运输任务。随军征战一年，全团80人立二等功，224人立三等功，711人立四等功。

剿匪肃特 沂蒙民兵在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武装部的领导下，配合人民军队，积极参与剿匪反特。1942年5月，滨海区民兵配合八路军某部，围剿马陵山一带土匪，捣毁匪巢莫瞳、陈家埠，击溃了许兰笙的第八大队、宋善六部和陈永立、高继真等匪部，使20个村庄消除了匪患。1948年5月1日，老匪特庄文江等29人，隐蔽在蒙山朱满区的江岭子庄，该村群众迅速报告了附近王家庄子民兵。王家庄子村团部指导员王建生、农会会长王建福率领民兵，迅速向江岭子庄扑去。匪特发现民兵后，窜向红山进行抵抗。附近村庄的民兵听到枪响后，主动赶去增援。匪特又逃到牛皮岭上，企图坚持到黄昏突围。各村民兵密切配合，强行攻击，击毙庄文江以下4人，活捉25人，将匪特一网打尽。1949年初，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分子潜入解放区，勾结地主恶霸、道会门，组织策化暴动，扰乱社会治安。5月下旬，各地民兵配合鲁中南军区部队，先后对郯城以南地区，临沭县沂东区，临沂县册山、艾山区，日照县丝山、奎山区及其他地区的残匪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清剿，消灭了一批散匪、特务。

沂蒙民兵英勇善战，功绩卓著，是蒙山沂水的忠诚卫士，是沂蒙人民的骄傲。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所进行的光辉斗争，永远记住他们的历史功绩！

巾幗铁流 (二)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辛锐和陈明在沂蒙山区

辛锐（1918—1941），山东章丘人，出生于山东济南市。父亲辛葭舟是银行家，其家庭是八路军的地下联络点。受其父亲的影响，1938年和妹妹一道赴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从事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同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姊妹剧团成立后，她被任命为剧团团长。3月8日，和时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明结为革命伴侣。同年底，日伪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时，辛锐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山洞隐蔽养伤中被日军发现，咬开手榴弹盖拉断弦，壮烈牺牲。



1944年，刘瑞龙和夫人江彤在淮安

江彤（1919—1999），原名姜希兰，山东蓬莱人。清华大学毕业，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山东淄博特委妇女部长，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派与杨纯等南下发展苏皖，任苏北特委妇女部长。后在中共皖东北特支的基础上，组成中共皖东北特别委员会，任皖东北区党委妇委组织委员、华中局黄河大队工作组组长等职。江彤在皖东北与刘瑞龙相识，1942年，两人在淮北张塘村结婚。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妇联执委、纺织部劳动人事处处长、上海纺织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经理等职。



史秀云（1917—1948），陕西安定人。又名史秀芸，谢子长的夫人，在谢子长病逝以后改嫁郭洪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9月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1937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1938年3月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副主任。5月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到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鲁中区委组织部部长，5月至10月任中共（山东）第一（大鲁南）区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部长，10月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8月至1945年10月任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会长。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东北。



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合影（后排左四为史秀云）



1943年冬，（右起）刘震、金明、张彦、杨纯在泗沭崞张口合影

杨纯（1917—2005），原名万国瑞，四川峨嵋人。“一二九”运动武汉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她先后任八路军山东抗日第四游击支队队长，山东淄博特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起，先后任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苏北盐阜地委书记。1949年4月起任苏南松江地委副书记、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杨树浦工业区委书记，华东纺织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55年2月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1966年任中央对外文委副主任。

阮若珊（1921—2001），河北怀安人。1936年2月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10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冬随抗大一分校校部从太行山东迁至沂蒙山区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此后7年一直战斗在沂蒙山区，在山东分局及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领导下从事抗战文艺宣传工作。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在蒙山望海楼山下费县白石屋村，她和文工团的另一位成员李林同志共同创作了《沂蒙山小调》。1945年抗战胜利后，阮若珊离开沂蒙山区，1954年调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任团长。1958年从部队转业至中央戏剧学院，历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



阮若珊（中）在沂蒙山区

居摄两坟坛

徐森玉



“祝其卿坟坛居摄二年二月造”

“上谷府卿坟坛居摄二年二月造”

这是我国最早发现的两块西汉石刻文字，首先记载于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中，以后迭经著录。相传刻石原在孔子墓前，清雍正十年移置孔庙，现在曲阜孔庙。原石损泐极甚，近拓本很多字已不能辨识。

“祝其”是县名，《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都有祝其县。清方朔《枕经堂题跋》：“鲁相谒孔庙残碑有云东海祝其基人五字，则东海为郡，祝其基为县又可知矣。历来载此刻者皆云祝其，余就此拓审视，明明水帝，继阅冯晏海中翰所摹旧本，与余鉴同。”是说“祝其”应作“祝基”，可备一说，以待续考。

“上谷”是郡名。《汉书·地理志》载，上谷郡有“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县十五。”《续汉书·地理志》亦载幽州有上谷郡：“八城，户万三百五十二，口五万一千二百四。”但此刻不作上谷郡而作上谷府。虽然“州府”的记载很早就有了，但比较普遍的概念“府”是唐代的制度，大州曰府，隶属于道。上谷府卿坟坛的发现，告诉我们在汉代“郡”和“府”已可通称了。

关于“卿”的解释，宋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说：“不知所谓府卿与县卿为何官，盖自王莽居摄，官名日易，故史家不能尽纪也。”宋洪适认为“卿”和“丞”是相通的，其主要依据有三：一、“汉志属国置者尉一人、丞一人。又注引应劭云，大县有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小县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二、“隶刻有武开明碑终于吴郡府丞，其子荣碑中书为吴郡府卿。”三“沈子琚碑有云县丞犍为王卿讳某字季河。”（见《隶释》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促曾造桥碑跋）洪适这个见解是正确的。清朱彝尊跋汉丹水丞陈宣碑，记述碑文：“……仕郡历方簿督邮，除项都卿，补临县。永寿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亩荒芜，……卿单骑经营……”这亦说明了“卿”和“丞”在汉代是通用的。祝其卿和上谷府卿也就是祝其丞和上谷府丞的意思。

至于“坟坛”的解释，《金石录》：“坟坛者古未有土木像，故为坛以祀之，两汉时皆如此。”其实讲得简单些，“坛”也就是举行祭祀时的祭拜对象。《礼记·祭法》：“……设庙桃坛墠而祭之。”庙坛这一名词一向为人所熟知。《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汉郑国碑也有：“大男孟于、配食斯坛。”武梁碑有：“前列旦（即坛）墠、后设祠堂。”这些都足以证明庙坛、禅坛、坟坛是对象不同的同一性质的祭拜对象而已。

居摄二年为公元七年。

注：祝其：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临沭、莒南南部一带，属东海郡。



姓氏百家漫谈——吴姓 (中)

赵丹峰

秦末，吴广以反抗秦二世胡亥暴政的惊天壮举而名留青史。吴广，字叔，阳夏（今湖南太康）人。公元前209年，胡亥下令，征发一批徭役屯戍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陈胜和吴广便是其中的被征者。时遇连绵大雨，行路颇艰。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时，因前面道路被洪水冲毁，队伍无法前行。按照严苛的秦法，耽误时限不达目的地者，一律当斩无赦。危急时刻，陈胜和吴广毅然杀死两个带队的将尉，以为公子扶苏（秦始皇长子）和楚国大将项燕（项羽祖父）复仇的名义，发动了起义。因起义者多系楚人，为顺军心，二人打出了“大楚”的旗号，确立了“伐无道，诛暴秦”的斗争目标。因各地民众（包括原六国的一些旧贵族）受秦苛政之害日久，故义军所到之处，民众纷纷响应，他们“起阡陌，杖棘矜，应时而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大泽乡举义的星火遂成燎原之势。起义军进入陈城（今河南淮阳）后，陈胜见势力已经强大，便自立为“楚王”，同时封吴广为“假王”。由于义军多系由农民组成，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日后在与秦军的交锋中多遭重创。在义军将领周文奉陈胜之命西进咸阳兵败自杀后，由吴广镇守的荥阳就完全失去了前卫屏障。危急关



大泽乡起义

头，吴广被其部下田臧杀害。不久，陈胜在弃陈城退守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后，亦被其最信任的车夫庄贾杀害。陈胜、吴广死后，项羽和刘邦继续进行抗秦斗争，最终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历史并不仅以成败论英雄。陈胜和吴广的结局虽属悲壮，但他们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在抗秦斗争中起到了先导者和播火人的重要作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已为后世所铭记。

东汉时期，吴汉作为一代开国名将，为光武帝刘秀恢复汉室，实现中华民族又一次大一统局面，立下了赫赫战功。吴汉系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籍贯与刘秀同属一郡。新莽末，因宾客犯法，吴汉亡命渔阳（今北京密云），以贩马为业。后归刘秀，为偏将军。吴汉质厚少文，果敢勇猛而富智谋，为刘秀所倚重。昆阳之战后，刘秀奉更始帝刘玄（绿林起义军建立临时政权后推举出的一个皇帝）之命招冀州一带各派武装，以统定河北地区。待刘秀灭掉河北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王郎后，心胸狭窄的刘玄怕刘秀拥兵坐大，遂一面暗中命在邯郸手握兵权的尚书令谢躬偷袭刘秀，一面又委苗曾、韦顺、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掌控幽州地区的兵力。此时，吴汉正奉刘秀之命在幽州各地征调兵员，而身为幽州牧的苗曾非但不予配合，反下令所属各郡不得响应征召。面对困局，吴汉装出若无其事之状，只带二十骑人马去见苗曾。苗曾见吴汉随从甚少，便放下戒心，以常礼迎接吴汉。不料二人刚一见面，吴汉即令部下迅速拿下苗曾并将其斩首，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幽州军权。吴汉的出奇制胜之举，使刘秀很快掌握了幽州十郡，极大地增强了刘秀的实力，为日后平定天下创造了有利条件。吴汉作战勇猛异常。刘秀登基称帝后的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军将割据势力刘永的部将苏茂围困于广乐（今河南虞城北），刘永闻讯后急率十万大军星驰援救，吴汉率领轻骑迎战时不慎坠马伤膝，一时汉军皆惧。危急之际，只见吴汉裹伤而起，继续奋战，汉军将士深受鼓舞，士气大振，一举将敌击溃。随即，刘汉又一鼓作气，率军攻下睢阳，刘永在突围时被部将杀害。建武五年六月，刘秀御驾亲征，讨伐占据东海郡（今山东临沂市郯城）的割据势力董宪，董弃郯而逃至朐（今江苏连云港南部）。翌年，吴汉率军将其击杀。在各地割据势力被逐一平定后，最后只剩下占据巴蜀的公孙述这一最为强大的割据劲敌（其在公元25年于成都称帝）。建武十一年，刘秀命吴汉、大将岑彭和来歙分路进伐公孙述。在来歙、岑彭接连为公孙述派人暗杀后，吴汉接任汉军统帅。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吴汉率军兵临成都近郊。公孙述拼死一搏，率大军十万将汉军包围。吴汉临危不乱，根据军情变幻及时调整部署，汉军在吴汉鼓舞下众志成城，人自为战，经浴血奋战，吴汉所部八战八捷，打败敌军，公孙述身负重伤，不治而亡。至此，刘秀最终荡尽割据群雄，实现了天下统一。追随刘秀征战二十春秋的吴汉，因战功显赫，相继任大将军、大司马，封广平侯。永平三年（公元60年），在吴汉病逝16年后，明帝刘庄根据光武帝的遗愿，下旨将吴汉与其他二十七位开国元勋一起（位列前三）图画于南宫云台，以供世代追思缅怀，时称“云台二十八将”。因这些骁将正好应对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故民间有《东汉二十八宿全图》年画广为刊行，世代张挂。

盛唐是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吴道子作为此期最有成就的杰出画家不仅名震当时，而且为后世所师法。吴道子系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少孤贫。为了生计，便向民间雕匠学习画技，因聪颖善研，未及弱冠，即穷丹青之妙。他曾在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做过县尉，后漫游洛阳，专工壁画，一时名噪两京。唐玄宗闻其名声后，即召其入宫，任为内教博士，改名道玄，遂成宫廷专职画师。吴道子擅画佛道人物，作为壁画大师，他在长安、洛阳大寺庙先后作宗教壁画三百余间，“奇迹异壮，无一同者”。如他于长安兴善寺画中门内神时，不用尺度，在绘神像顶上之圆光时，但见其“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一时间观者如堵，喝彩声惊坊震邑。吴道子早年曾学书法于张旭，二人交谊甚笃。张旭有一特点，喜饮酒后作书，道子亦有此习惯，每于作画前必先畅饮。

张旭因观公孙大娘舞剑而书法长进，道子观将军裴旻舞剑而画若有神。开元中，道子与张旭、裴旻相逢于洛阳，裴旻请道子作画，道子则请裴旻舞剑，自云“观其壮气，可助挥毫”。俄顷画成，果然神气凛冽。随后，张旭又题字于壁，洛阳人遂称赞道：“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吴道子作画，用状如兰叶或状似莼菜条的笔法来表现衣褶，具有“天衣飞动，满壁生风”的效果，被誉之为“吴带当风”。用焦墨勾线，略加淡彩设色，又称为“吴装”。所作人物，不仅比例准确，而且神采飞逸，颇富立体感。宋苏轼为此评价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亦画山水，曾在大同殿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图一日即毕。张彦远评曰：“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由于吴道子技法精湛传神，对中国画的艺术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故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画圣”，民间画工更将其崇为“祖师爷”供祀。今存《送子天王图》为宋摹本，现藏于日本大阪美术馆。

南宋乃多事之秋。金兵南侵，金瓯残缺，作为一代抗金名将的吴玠、吴玠兄弟二人，壮怀激烈，英勇杀敌，以显赫战功而名昭青史。吴玠善骑射，喜读史，将凡可师法的往事皆录记于纸，作为座右铭，以励心志。自北宋末年从军后，多立战功。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侵陕，他执戈迎战，屡胜劲敌。四年，率军收复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任权永兴军经略使。同年，富平之战失利后，时任都统制的吴玠与弟吴玠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金大将完颜宗弼（兀朮）率大军进攻和尚原。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吴玠和吴玠毫无惧色，亲选劲兵强弩向来犯之敌进行轮番射击。连战三日，重创金军，俘敌以千计。兀朮本人亦被流矢射伤，只好率军逃回燕山。此役系金军南侵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大败仗，其侵占陕川的计划遂告失败。绍兴三年，金将完颜杲绕道攻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吴玠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金军抵达位于川陕边界的金牛镇后，不见宋军踪影，疑有埋伏，遂退兵兴元，从斜谷后撤。吴玠抓住战机，追袭金军，杀敌千余人。宋军相继又收复兴元、泽州、金州等失地。绍兴四年二月，兀朮又率十万大军从宝鸡入侵仙人关。吴玠率万余将士在杀金坪御敌。吴玠闻讯后领兵自七方关驰援，转战七昼夜，方与兄长合兵一处。三月，金兵身披重铠，用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攻关。吴玠督军血战，箭如雨下，使金兵堆尸如山。金兵改用火攻，又被宋军扑灭。吴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吴玠行军图

玠指挥杨政、田晟率军出击，一时战鼓声和呐喊声震撼山岳。翌日夜，吴玠又派员杀入金营，金军大溃，退守凤翔。吴玠、吴玠兄弟二人打败十万金兵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绍兴九年，金人请和，吴玠以殊勋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不久，病逝于仙人关。谥武安，淳熙年间被追赠为涪王，川民为其建庙供祀。吴玠死后，吴玠代为领兵。绍兴十一年，收复秦州（今甘肃天水）及陕右诸郡。由于高宗和秦桧主和，吴玠被迫班师。绍兴三十一年，金帝完颜亮又举兵攻宋，时任四川宣抚使的吴玠抱病督战，痛击金军。在吴玠指挥下，宋军相继收复了十六州郡，声势大振。两年后，又因朝廷议和而被迫放弃了所收失地。吴玠至汉中，率军民修复古堰，使数千顷良田得以灌溉，受到当地吏民称颂。病危时上书高宗赵构“毋弃四川，毋轻出兵”，却一字不言及家事。一片爱国之心，令人感佩。吴玠官至太傅，被封为新安郡王。

南宋、金、元时期，吴文英和吴激以词作出众而驰名文坛。吴文英的词风格丽密，作品以莺啼燕啭、缠绵悱恻的词章为主。《风入松》词即颇具代表性。在这首以写爱情为主题的词作中，作者吟出了以下脍炙人口的抒情名句：“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吴激系米芾婿，奉命出使金国被羁留，在不得以的情势下被迫仕金，任翰林制侍。在一次酒筵之上，听到一位宋宣和殿的小宫姬的演唱后，不由感慨万千，遂写下了《人月圆·宴张侍御家有感》词：“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此词抒发了作者怀念故国、思挂家山的悲寥情怀，令不少人读后喟然神伤，故被广为传诵。

吴镇系元代著名绘画大师。一生清贫，曾在钱塘一带靠教书、卖卜维持生计。擅长水墨山水，在师法董源、巨然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特点鲜明的画风。善以湿墨表现山林景色，笔力雄劲，墨气温润而沉厚。喜作渔父图，还工诗文，画墨竹，时称“三绝”。他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四人推陈出新，将中国山水画合力推向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地，给明、清画坛以巨大影响。



一个人和一个叫“神经”的系统

——散记车峰远

惠东波

神经，由神经纤维构成。有人通过高倍视野的显微镜观察神经的形状、走向、脉络的形成规律，绘出其主体图算出：神经总长度可绕地球四圈半！

——题记

40岁刚出头的车峰远，不知不觉已和“神经系统”打了20多年交道。以至于在职业称号和兼职选择上，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临沂市人民医院本部医疗区副院长、神经内科副主任、神经内四科主任、神经病学实验室主任；山东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医师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临沂市医学会神经肌病和电生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临沂市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审稿专家；主任医师；青岛大学医学院、泰山医学院、潍坊医学院、滨州医学院等多所院校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研究生合作导师，目前培养研究生九人……



有时候他会短暂地陷入沉思默想，和这个神秘秘，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浩瀚无比无边无际的神经系统，自己何止是打交道，其实就是一种彻底的融入，这个多数人不了解、更绝少涉足的世界，已被他装入心中，同时又成为他生命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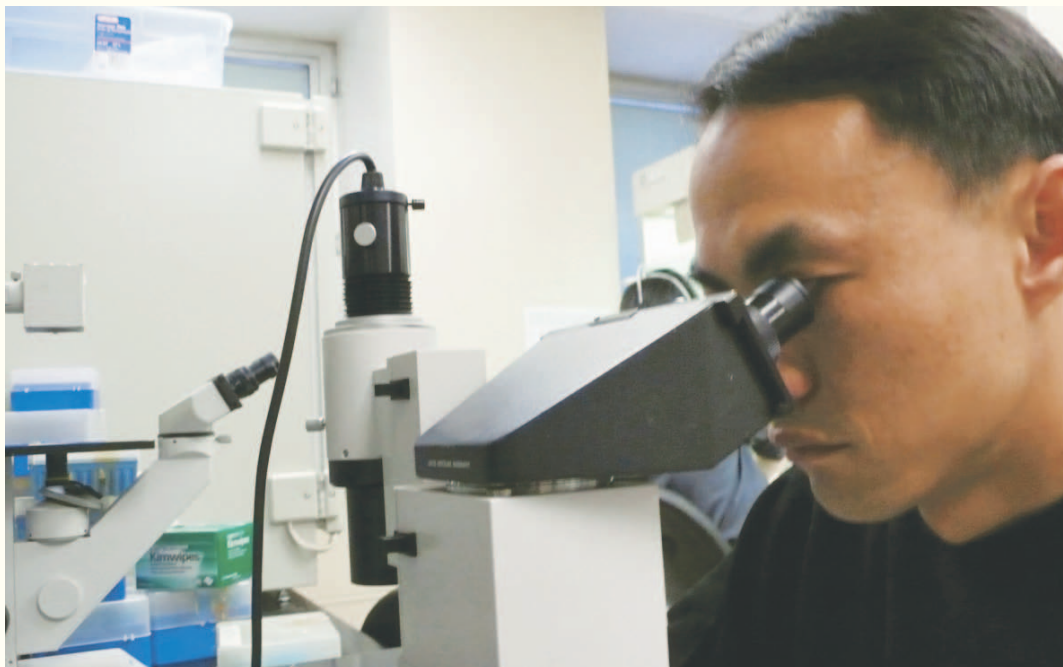
这一切，当然取决于最初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似乎带有偶然性甚至宿命色彩。父母都不从医，但却朴素地期望家族中能出现一个医生，他便于1989年考入了当时的青岛医学院；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见习期间的去向有很大空间，却去了青医附院神经科。就此，事业的大幕徐徐拉开，他被所看到的震惊，产生了按捺不住的冲动，决意成为这个舞台上最光彩炫目的舞者。

神经系统在生命中的地位，成为吸引力最强大的元素。这个系统是人体内起主导作用的功能调节系统，通过其直接或间接的调节控制使体内各器官、系统的功能和各种生理过程互相联系、相互影响、密切配合，从而保证人体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实现和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体各部位无所不在的神经系统，担负着人体多系统的协调、调度、控制的重任，掌控着生存大局，确保着秩序井然，它的健康运行便是生命的健康运行，保护它的健康运行的重要，自不待言，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每每想到这些入门时就了解的最浅显的道理，车峰远总有一种自豪感和责任心油然而生。

神经系统的隐秘和病变时的诡异所带来的挑战性，是其吸引力的又一个元素。这个系统分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两部分，中枢神经像决策机关，周围神经便是执行机关了。就周围神经而言，既负责“执行指令”，又负责“下情上达”，责任分明，严谨细致，不允许任何差错。一旦出现差错，即所谓“病变”。

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犹如一只恶魔逃出铁笼，开始对人体的危害。然而这只恶魔又是极具特色的，隐秘、诡异、顽固，很难降服。

车峰远开始接触一个个神经系统病例，心灵受到一次次冲击。一位退休的公务员李先生身体一向很好，一段时间却发现脚趾及脚底有一种麻麻刺刺的感觉，日益严重，渐至影响到睡眠。有医生告诉他可能是“血路不通”，拿了些据说可以“通血路”的成药来吃，一个月后不仅没有改善症状，反而更加厉害：走路反复跌倒，拖鞋不知不觉滑落，上下楼梯常常脚下拌蒜。经查，这是典型的周围神经病变。这种病变范围很大，属于掌管感觉的神经时，会出现麻木、刺痛等现象；属于掌管肌肉运动的神经时，肌肉会无力以至萎缩；属于掌管自主神经系统的神经时，会出现大小便机能失调等现象……等等，病人终生所受



的折磨可想而知。

一位建筑工人吴师傅，突然在几天内感到肢体无力，上梯子腿软，抹墙体手软，便以为患了感冒，买了一些感冒药来吃，然而行动却愈发困难，几天内起身下床都需人帮助。经过检查，他患了“急性脱髓鞘性神经炎”，这种病九成的病人在四周内达到最严重的程度，除肌肉无力外，会出现心律不整、血压过高或过低、心跳太快或太慢等问题，以至于威胁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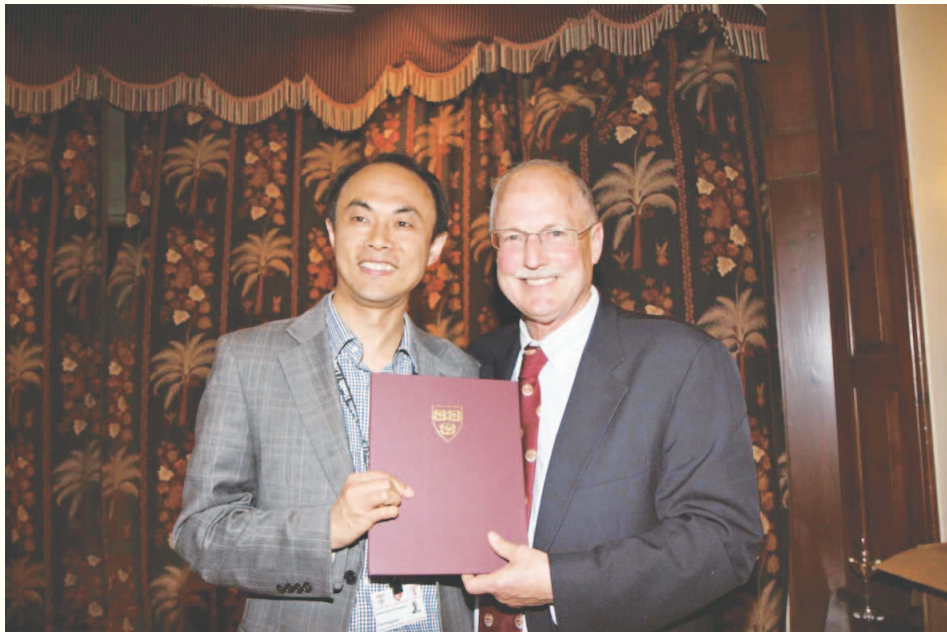
尤为甚者，这些病人在发病初期往往意识不到，感觉明显，但往往形成误判，四处求医，举家奔波，最后无功而返。其实，神经系统疾病即便确诊，也只有少数能通过治疗痊愈，一些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目前医学尚无能为力。2007年，车峰远为一个8岁的男孩王正豪诊断确诊为神经遗传病。面对孩子一双天真美丽的大眼睛，他浑身颤抖，他不得不承认那个残酷的现实并告知其家人：孩子的肢体会越来越瘦，呼吸会越来越困难，属于他的时光已经十分短暂。坚强的孩子和大义的父母回家了。当年12月4日晚9点，正豪在家中永远地闭上了他对这个世界留恋的眼睛。按照孩子及父母的愿望，次日凌晨1时10分，小正豪的眼角膜被成功取出；当日上午9时至12时，两名受捐者手术成功。消息传来，车峰远心碎了，他知道，病人原本灿烂的天空一片黑暗尚不至于让人绝望，令人绝望的是无法无药可治；他知道，每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旁边，都是其家人心的哭泣，为即将面对的可以预期的死亡和永别，他甚至自责自己的“无能”，诅咒医学科学的“滞后”，他捶胸顿足，泪如雨下。

他说，从此我知道我该如何去做。

二

车峰远感到很欣慰的是，在漫长的神经系统医学科学之路的跋涉中，不断得益于自己的老师。早在青岛医学院学习时，他有幸遇到国内最著名的研究重症肌无力的专家丛志强教授。丛教授是典型的传统型学者，在专业内学富五车，而且治学非常严谨，大到基础原理、学科前沿，小到遣词造句、标点符号，一丝不苟，毫不马虎。作为尚显青涩的大学生，车峰远对教授深感敬畏，时间长了，见他亲切和蔼，海人不倦，便大着胆子就一些现在看来有些稚嫩的问题向他请教，没想到这位国内知名的大专家非常热情，详细解说，深入浅出，不仅授业，而且传道，提出了许多与专业研究相关的建议和要求。前几年，丛教授因肺癌早早离开了人世，但在车峰远的脑海里，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车峰远的科研成果中，他提倡的治学精神也无处不在地体现。

2000年，根据医院发展的需要，市医院派车峰远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学习，师从中国电生理第一人汤晓芙教授。汤教授原籍广州花县，1958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学院，是个倔强、严厉的知识老太太。她1990年开始任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带出来的博士目前已经有好几位任北京几大医院神经科的主任或副主任。和车峰远一批的4人跟汤教授学习，他是唯一一个市级医院来的，是唯一一个硕士，其他3位都是省级大医院来的博士。做汤教授的学生，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稍有失误，便会兜头受到一番训斥。车峰远深知，严师出高徒，难得的学习机会、成长机会就在眼下，因此抓住所有时机如久旱的禾苗般如饥似渴吸吮着导师播下的甘露。很快，汤教授便把他看作自己最喜欢的学生，时常在背后悄悄评价：还是山东人实在，干事认真负责。同时，每天早晨检查签收实验报告时，对这个山东学生的报告都特别仔细，要求分外严格。半年过去了，车峰远在导师指导下，在《中华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成为他第一篇“中华级”论文。学习结束时，师徒一同去了趟九寨沟，汤教授一反常态，一路上谆谆告诫的，都是如何做人甚至如何做官的道理，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之后，汤教授把车峰远在协和院所做的课题选出来，在成



都全国会议上做大会主题发言，使许多同行误认为他是汤教授带出来的博士，这让他在心理上狠狠地满足了一把。

感到满足的可能不只是学位上的误读，更重要的是从良师那里学到的医术及贯穿其中的医德。

三

1994年，车峰远大学毕业来到临沂市人民医院工作，医院随之成立了全市第一个神经电生理实验室，工作人员从只有他一人逐步发展到5人。在神经内科，这个实验室相当重要，因为电生理检查是神经系统检查的延伸，在诊断及评估神经和肌肉病变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是康复评定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有了这个实验室，就有了一个神经系统疾病发现、确诊和医疗效果检验的平台。车峰远如鱼得水，专注地展开了工作。借助这个平台，他们每年都要对2000余例病人进行实验室检查，大大提高了周围神经疾病、肌病、遗传性疾病和肌张力障碍等疑难病的诊治水平。组建了癫痫中心，每年诊治癫痫病人600余人，至今已收集完整数据信息的癫痫病人共2700余例。还在神经遗传方面每年诊治近200例。优良的医术和先进的诊治手段，几年内声名远播，带动了科室快速发展，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神经内科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学科。

这期间，车峰远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病例，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悲喜，也得到了太多太多的感悟。沂南县曾来过一个病人，上肢活动都正常，只是下肢“不听使唤”，走剪刀步，工作生活都无法正常进行，一直被误诊为颈椎病，去走过很多医院都未确诊。经车峰远及同事们诊断，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称之为遗传性痉挛性截瘫。到其村一看，家族中竟有涉及四代、19个人患同一种病。目前，对这种病只能药物控制，无法治愈，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确诊后其家族即可作生育遗传咨询，避免新的病儿出生。同时，一旦确诊也避免了盲目投医、劳神耗钱，也不失为一件不幸中的幸事。在这个领域中，有很多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

也有令人高兴的事情。车峰远他们曾发现诊断过一种罕见的病人，他们似乎无病由，但浑身无力，最明显的是蹲下就起不来。经过诊断叫做脂质沉积病。根据最新医学进展，他试着从控制病情需要，让病人服用维生素B2等药物，想不到竟奇迹般好转并不再复发。

至今他们已诊断治愈了三例。在神经内科，这种例子毕竟太少，不尽如人意，但他们觉得欣喜。对多数病人而言，病情诊断清楚了，有所控制了，背后都有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尽心也尽力了。

面对许多尚难解释的问题，车峰远一刻也不敢停顿自己探索的脚步。2007年10月份，他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行腕管综合症的课题研究。在异国他乡，他一如在国内，心无二用地投入研究，每天早六点从公寓坐地铁去医院，晚上10点以后才能回去休息。然而，研究的各种条件都十分优越，唯独病例太少，最初的一个月就要过去了，仅仅收到三位病人，他感到了无助，心急如焚，有时在站台上等地铁，“真想跳下去”。但他却不敢退缩，想到了国内病人的期盼，想到了导师们的执着，决意迈开双腿，广泛联系，得到了若干家大医院的支持，为其提供病例，终于利用4个月完成了课题研究，通过了验收。期间，他没忘利用一切机会接收吸纳优秀成果，翻译出版了《肌电图学图谱》一书，成为国内同业教育的必读书目。

回国后，医院扩建了神经电生理实验室，一跃成为山东省最好的同类实验室。同时，建起了神经病学实验室，车峰远的事业得到了质的飞跃。他先后参与多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编写、出版医学著作2部，独译著作1部，发表中华级论文10篇，核心期刊论文7篇，sci论文8篇，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承担国家科技部课题《临沂地区神经系统遗传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1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赞助项目2项，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1项，发明专利1项，实用型专利1项。2007年获得临沂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9年获得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今年被推荐为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一个人和一个“系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肯定没完，值得大家期待。

补记：车峰远的工作是繁忙的，从其业绩中可以想见，但他没更多谈及所付出的代价，其中必有家庭的代价。偶翻其独译《肌电图学图谱》一书“译者前言”一段话，为两年前所写，转录于后，可见其心理轨迹：“走上医学的道路，注定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患者，所以很遗憾，结婚十几年，女儿转眼间就11岁了，我不知道有几个周末是陪妻子和女儿度过的，所以也感谢一直默默地支持和包容我的妻子司马亮，时常让我愧疚的女儿车林青，也感谢我的父母和岳父母，他们是我与我的妻女温暖的港湾。”此补。



著名环境化学家王文兴院士访谈

康香阁



上学是最好的出路

康香阁：王院士，您好！您从事科学研究已经56年了，您在大气环境化学、大气酸沉降、环境化学动力学和大气污染物来源与排放等多个学术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去年是您80岁华诞，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为您举办了庆祝盛会及学术研讨会，并出版《王文兴文集》。

今天，我想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和学术经历，每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有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对我们青年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老一辈科学家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可以从你们的经历中得到启发，站在你们的肩膀上克服困难，继续探索，不断前进。

王文兴：我今年81岁了，回顾我的经历，与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有很大的不同。我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内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和成长的过程。新中国成立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解放后50年代、60年代，也与80年代以后的经历有所不同。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我的经历非常不顺，我治学的道路也非常的崎岖。

我的祖籍是山东临沂，后来迁居萧县。解放前，萧县曾经隶属过山东、江苏；解放后，大概在50年代中期，萧县被划归安徽去了。

我们那个村子叫阎里村，是个大村，有很多这样的人家，都很穷，所以我读书很晚，也很艰难。

我的小学也只是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四年级上学期。当然，要按照我家的条件，我根本就不可能上学，但是，我喜欢念书，一心想学习。每年农闲时，就自己到本村天主教堂办的学堂去学习，学习认识点字，还学习一点算术课，农忙时回家干活。学堂什么都不要，不用交学费，还提供教材。



康香阁：这个学堂是外国人办的？

王文兴：是天主教会办的，但教师是中国人。就是一个小教堂，没有神职人员。教堂里面办了一个小学，所谓小学也就是十几个学生。我们从自己家里拿一个凳子，带一个小桌子，非常简易。这个学堂只教语文和算术两门课，别的科目都不教。

小学四年级还没有念完，到1938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家乡沦陷了。我们这个村子紧靠铁路，离车站非常近。日本人常来扫荡，我们只能读到小学四年级上学期。就不能上学了，在家里干一些农活。

困难的家庭生活对我后来影响极大，我后来能够坚持读中学、读大学，这一段对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记得孟子说过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我对这段话很有感触。

家乡沦陷，不能上学了，就一直呆在家里。农村的孩子就是夏天割草，冬季拾柴火，在家里一直呆了三年。三年以后。突然有一个机会，八路军游击队在萧县的游击区办了一个临时中学，开始招生。

我到哪里去考试，随到随考，去一个考一个。校长当场出题考试，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沦陷后的三年”，叫我写一篇文章，然后出了七道算术题，让我答。在什么地方考呢，就在一个案板上考，就是家里擀面用的案板。我就在案板上做题，我写好了以后给他，他看后说：“好了，你被录取了！”当天中午就管饭了，吃的什么饭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很差，特别是春天，家里没饭吃，就这么上的学。晚上住在老百姓的灶房里，白天在三王庙里上课。上了半年，这期间日本人不断地来扫荡，又待不住了，游击队县政府就把这部分学生送到了皖北的太和县。太和县是抗日后方，就是日本人没到的地方，学生谁愿意去就跟着去。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就没去，我毅然决然要跟着去，因为我跟着去学校，吃住什么都不用自己管，还能上学。从我们萧县走到太和县需要走四天，日夜兼程的走。就这样，萧县临时中学到了安徽太和县，就扩建成了一个叫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战时中学”。随着学校规模迅速扩大，不久就改为国立第二十一中学，直属教育部。学生主要来自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四个省，最多的时候学生达到2000多。

康香阁：您在太和县 of 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学习了多长时间？

王文兴：只有两年多时间，到了1944年10月份，日军包围皖北，打通了平汉线，学校在这里又待不住了。当时是国共合作期间，教育部命令西迁，就从安徽的太和县一直向西走，最后到了陕西的山阳县。

康香阁：日军没能打到那个地方？

王文兴：没有，那个地方特别偏僻，人都不容易进去。当时，全县城别说汽车，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就在这么偏僻的一个县，呆了半年。后来，我们学校又搬到了西安东南35公里的蓝田县，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能够找一个出路，上学是最好的出路。

1945年日本投降了，在陕西蓝田县呆了一年，到了1946年，全国二十三个国立中学停办，各校学生就奉命复员。所谓复员就是从哪个省来的学生还回到那个省去上学。我是从江苏萧县出来的，被分配到了江苏省立连云中学就读。后来，我考取了山东大学，我们那一批学生考取大学的都给公费，甲等助学金待遇，每一个人按一个月60斤小米的指标供应，除了吃饭，还能够剩一点，作零花用，所以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分钱都没有花家里的。

当时的艰苦生活条件，促使我们个个努力学习，这一段经历对我个人的思想和各方面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国家给我的供养，别说上大学，中学我也上不起，所以，我时刻都不

会忘记国家的养育之恩。多年的艰苦的集体生活，也培养了我的团结互助的精神。

我今年都八十多岁了，我现在除了在我们单位做一点工作以外，还在我的母校山东大学任职，我还用多年积累下来的40万元，设立了研究生环境科学奖学金，为学生从事环境科学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我当选工程院院士后，工程院要每个新当选的院士写一段话，并汇集出版。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一个人要是出生在富有的家庭，可能继承家产百万，如果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他继承的可能就是贫困，但是对于一个有志气进取的人，贫困可能是前进动力的源泉和一种永远用不完的财富，它能激励人勇往直前。

机遇只会降临在有准备的人的头上

康香阁：大学一毕业，您就进入科研领域了吗？

王文兴：不是的。对于做学问，每个人的道路都有不同。我是1952年大学毕业的，我们那个时候毕业和现在不一样，大学毕业生要政府统一分配，个人的意见只作参考。在学校公布分配方案前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哪里，更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我很想分在大学，我喜欢教育工作，同时也能做科研，但不能如愿。

解放初期，中央号召支援东北。山东大学当时是在青岛，我们从青岛坐火车，一车一车的学生往东北开，从沈阳开始下，到长春，最后到达哈尔滨。我当时就到了哈尔滨，被分配到一个中等技校里做团的工作。当时很多人都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不是按你的专业安排。

好在时间不长，1954年，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如何向科学进军呢？就是要大学生尽量做符合他的专业的工作。当时，我已调到沈阳工作，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做什么，我说我还是愿意研究化学，我学的是化学专业。正好重工业部在沈阳有一个化工研究所，我极为高兴。1954年春，我调到了化工研究所，总算是进了科研单位。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认准方向，只要有会，你就别放弃。

1955年单位派我到吉林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班进修物理化学两年。1958年单位又搬到北京，我到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那个时候已经成立化工部了。1959年组织又派我到苏联卡尔波夫物理化学研究所进修催化动力学。

治学要始终如一，不能三心二意

康香阁：人的一生，在治学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几次不同的研究方向的选择，对这种情况，如何把握？

王文兴：我的感受是：治学方向要始终如一，不能三心二意。在1966年之前有一个“四清运动”，高校和科研单位、基层单位都要进行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后都要提拔一批干部。那个时候是先批后提，看谁能经得住批。1966年提拔我叫我改行，我非常不甘心，提拔我干什么呢？化工部要在甘肃成立一个涂料工业研究所，提拔我到那里当技术副所长，还是军工涂料，保密的，不去还不行。我本来是做物理化学研究的，我很喜欢我的研究方向。在这之前，我到吉林大学进修，到苏联进修，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并且已经做出一定的成果了，我不想离开这个专业，但必须服从安排到甘肃去。

到了甘肃，从1966年做到1967年底，两年时间把房子都盖起来了。我一面好好地做工作，争取领导的同情，一面还要求有机会能做我的专业。我希望不管什么地方，并不是一定要回北京，只要能做我的物理化学研究就行。

康香阁：您什么时候到环境保护部门来了呢？



王文兴：我们这老一辈的人在治学方面都有自己的坎坷道路，我很喜欢物理化学，但是不行，需要你不断地转换工作岗位。1976年，天津市要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办公室，一定要调我过去。调我去干什么呢？调我去做天津市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

康香阁：到天津市环境保护办公室后，您在承担大量行政工作的同时，还是挤出时间，作出了很好的科研成果，比如说，你撰写的《工业催化》一书，就是一项重要成果。

王文兴：到了环境保护办公室以后，我就住在单位，每周回家一次。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办公室里面的墙上掉了很多东西。在这个期间，我完成了《工业催化》这本书，在当时是国内第一本，花了我很多时间，我白天有行政工作，晚上我不走，做了好几年才写了出来。

1980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早期的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的领导都是化工部的人，他们知道我。他们说王文兴不是在天津做环保工作吗？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要建一个环境科学研究院，叫他来筹建这个研究院吧。我说这可是有机会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是个综合性研究院，它有和我专业接近的大气化学专业，我现在做的就是气相化学研究。我有这个机会了，天津市说什么也不让我走，当时的天津市环保办公室已经变成天津市环保局了，我在那里前前后后也呆了好几年，准备让我做代理局长，后来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说是借调我，长期借调也不行，所以说借我领一个代表团去国外考察，撰写建院计划，这样才同意了。这一借就是三年，等到1983年，才把正式的关系调到北京来。

治学定位要实际，绝不能好高骛远

康香阁：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都希望作出成绩，他们都努力了，但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如何避免失败？

王文兴：我觉得在治学的道路上，绝不能好高骛远，要想想是否可能实现，要是达不到也不行。我在沈阳的时候，当时是个小组长，我的组里有一些是年轻人，其中有三个年轻人都是中专毕业，但这三个人的道路有所不同，一个是考到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了；第二个是考到南开大学他不上。他嫌南开不好。一定要上北大，后来他自己完全靠自学，还是在这个单位；第三个就不行了，他没有这么大的实力，他老是想读天文，南京大学有天文系，第一年没有考取，当时不让年年考，可他第二年还想考，单位不同意，要考必须辞职，他就辞职了。

我说这一段，就是说我们的理想要符合现实，结合实际，不要脱离太远。如果我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来，完全是重新开始，那还是很费力气的，我还是利用我原来的基础，我原来的基础完全能用上。我做的是催化，这些都是很专业的东西了，到这里我做的是气相催化，我的很多专业工作都能用上。建院初期我担任副院长，我一直都没有脱离我的专业，在这里是边建设边研究。1980年过来，在临时工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研究，到1984年我们就拿了一个国家二等奖。当时来的时候这个院子里一栋房子都没有，这里是农村，我在板房里住了一年多。冬天很冷。晚上都带着帽子睡觉，是很艰苦的，但是和我年轻上学的时候相比那就不知道好多少倍了。

总之，从治学上讲，我最重要的感受是，要认准一个方向，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要见异思迁。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有多项选择，可以朝几个方向发展。比方说我，我当时要是从政的话，应该也能发展，但是我不喜欢做这一类工作，我也不适应，我还是喜欢我的科学研究。人各有志，做科学研究的人只是一部分，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作。不管做什么工作，要想做得好，总得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临沂市年鉴编纂工作成果丰硕。

2014年12月，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公布了第五届全省优秀年鉴评奖结果，临沂市史志系统喜获佳绩，临沂市史志办报送的1部市级年鉴和7部县区年鉴全部获奖。其中，《临沂年鉴》2014卷获得综合奖项特等奖。《莒南年鉴》2014卷、《沂水年鉴》2012卷、《临沭年鉴》2013卷获综合奖项一等奖，

《沂南年鉴》2011—2012卷、《兰山年鉴》2012卷、《苍山年鉴》2007—2012卷、《蒙阴年鉴》2004—2008卷获综合奖项二等奖。此外，《莒南年鉴》2014卷获条目编写奖，《沂水年鉴》2012卷、《临沭年鉴》2013卷、《沂南年鉴》2011—2012卷获框架设计奖，《兰山年鉴》2012卷、《苍山年鉴》2007—2012卷、《蒙阴年鉴》2004—2008卷获装帧设计奖。

临沂市参加全省各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

1月22日，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临沂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交流了全省2014年史志工作，安排部署了2015年的工作任务。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在讲话中指出，2014年全省史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史志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中央领导、省委省政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高度评价并重视山东史志工作，全省史志工作者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上，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史志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不断开创史志事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临沂市参加全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宣传活动座谈会。

1月21日，省史志办召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宣传活动座谈会，省史志办副主任翟

世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市县基层志编纂指导处处长李刚主持。临沂市史志办副主任段洪作为临沂市联络员参加会议并交流发言。

会上，各市联络员汇报交流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宣传活动开展情况，并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探讨。《铭记历史 鉴古开来——山东抗战遗址和纪念设施名录》、《山东抗日将士传略》、抗战口述史料征集、抗战史料文物征集、《山东抗日根据地图志》等五个项目负责人分别就相关工作进行了解释说明。

临沂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召开。

1月30日，临沂市史志办召开各县区史志办主任座谈会。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史志办领导班子、各县区史志办主任及市史志办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传达全省史志办主任座谈会精神，各县区史志办主任进行交流发言，对下步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做了具体安排。

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在讲话中回顾了2014年临沂市史志系统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对2015年全市史志工作进行了部署。朱海涛指出，2014年，全市地方史志工作，坚持志、鉴、库、馆和开发利用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新的一年里，各县区史志办要坚持改革创新，依法修志，全力做好今年各项工作，不断加快二轮修志进度，进一步提升年鉴编纂质量，提升方志馆建设服务能力，全力做好抗战胜利70周年宣传活动，发挥好史志成果服务社会大众的积极作用。

朱海涛强调，市史志办及各县区史志办要适应史志工作新常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要紧紧抓住二轮修志这一工作重心不放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立足本职、

真抓实干，推动全市地方史志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临沭县志（1986—2007）》出版发行。

12月29日，《临沭县志（1986—2007）》出版发行座谈会在临沭县召开。

《临沭县志（1986—2007）》为《临沭县志》（1993年版）的续志，由临沭县史志编委会编纂，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沂水县志办为“第一书记”任职村搭建科技文化平台。

沂水县志办任职“第一书记”入村工作以来，针对任职村夏蔚镇南王家庄子村科技文化设施比较落后的情况，与新华书店联合投资5万余元，建成了拥有2000余册有关农业科技、政策法规、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等方面书籍的科技文化书屋，解决了村民“买书难、看书难、借书难”的问题。

莒南县史志办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近日，莒南县史志办有关人员到石莲子镇走访慰问部分贫困学生。先后为焕章希望小学、新庄小学以及石杭小学13名贫困生送去爱心慰问金1300元。